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试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女性解放的启示

——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

魏寒冰

(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 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经典著作之一, 其中蕴含着关于人的类本质、人的异化和人的发展等人学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探索了道路, 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类本质; 扬弃私有制; 扬弃异化; 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8)02-0001-06

女性解放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思潮, 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思想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女性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传统女性解放的论题, 成为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作为类存在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等重大哲学问题, 因此, 女性解放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哲学视角给予关注和探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经典著作, 虽然这本著作没有系统地对女性解放问题作出论述和阐发, 但是, 其中的人学思想却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启示和方法论指导。

一、人的类本质与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

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通过对类存在、对象化和主体意识关系的论述, 揭示了人的类本质, 并指出人的类本质获得是作为主体意识确立

的过程。首先, 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并把“类存在看作是自己的本质”^{[1](P57)}。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 人通过把自己看作为类存在物, 把自身当作是普遍的存在物来对待, 而人越是具有普遍性, 从而也就越脱离动物性, 而具有主体性意识。而自觉有意识的活动才是人的活动, 才是真正自由的活动。其次, 人作为类存在, 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为自己的意识的过程, 即实践过程。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 人改造自然界, 创造对象世界, 从而证明了人是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存在。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是人的活动是对象化的活动,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构造, 懂得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 从而按照人的尺度来改造世界, “并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18)}。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人成为并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

收稿日期: 2018-01-10

作者简介: 魏寒冰(1979—), 女, 包头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身;不仅获得了类意识,还具有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3]。

主体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劳动和实践过程中对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是在客体对象化过程中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和树立。人一旦具有了主体意识就从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为的存在。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内在动力和要求,只有女性自觉地意识到“我是主体”,她们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才能自觉、自为地参与社会活动,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解放首先是女性的自我解放,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从历史角度看,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逐渐丧失了主体意识,而成为社会中“第二性”的存在^[4]。如何使女性确立自我意识,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是近代以来女性运动一直在思考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源于女性对女性主体的不认同,或者是对男性主体意识的屈从。从历史上来看,特别是私有制的产生,使女性将自我的存在看成是为男性的存在,女性自身不再是自我存在的原因和目的,而成为男性存在的结果和手段。因此,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首先要实现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认可。要实现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认可,必须要使女性意识到自己作为类的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马克思指出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是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不仅把他物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而实现对象化,而且把自身的类作为对象,实现对象化。人越是把自身对象化,人就越是具有普遍性,就越是作为类的存在。作为类存在物不仅把其他物的类作为对象,而且也把自身的类作为对象,“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P57)}因此,女性在把自身的类作为对象的同时,也就把自身作为了对象,女人一旦把自身作为对象,并把自身对象化,也就具有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因为,“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

身”^{[1](P86)}。作为类存在物的女性,不仅具有了类的普遍性,而且在类中实现了自由,因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1](P57)}。当女性获得了对于自我的主体认可后,也就解除了对男性的主体意识的屈从,女性不再屈从于作为男性存在的结果和手段,而探寻成为自我存在的原因和目的。因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1](P91)}

当女性实现了对自我作为主体存在的认可,女性主体意识即被唤醒,但是,只有当女性以主体身份进行实践,并有意识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时,女性才从真正意义上获得并践行了主体意识。实践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的活动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区别,人的生命活动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女性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作为类的存在和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毕竟“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P16)}因此,女性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主体意识,并以主体的意识去支配和主导自己的现实生活。

二、私有制下人的存在与女性地位平等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和剥削,并提出只有扬弃私有制,才能使人从“奴役制”中解放出来。首先,私有制下生产的不平等。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生产不平等的根源。在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不再为劳动者所有,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不再是劳动产品,而是商品,并且生产的商品越多,工人本身就越廉价。因此“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边是辛苦劳动最后却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一边是不劳而获最后却占有一切的资本家,形成了私有制下劳动的不平等。劳动不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成为统治和奴役人的手段和工具。其次,私有制下分

配的不平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产品分配私有制,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也就成为了分配领域的支配者。资本家凭借资本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间接获得了对工人的占有和支配权力。工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就成为了工人“心甘情愿”被支配和剥削的原因。最后,私有制不仅带来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也是人的不平等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揭示了为了维护和增加私有财产,工人的需求被降低,甚至被忽视,“不仅没有了需要,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把工人变成了没有感觉和需要的存在物”^{[1](P123)}。人——工人——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积累源泉的创造者,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意味实现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者,则是一切,“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P51)},人在物的世界里不仅丧失了人的尊严,甚至丧失了“生活”的权利。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通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P61)}

私有制的产生是阶级社会的开始,也是女性沦为男性私有财产,成为“他者”的根源所在^{[5](P56)}。如果说女性获得主体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内在动力和要求的话,那么扬弃私有制则是女性解放的客观条件和制度保证。首先,扬弃私有制,获得生产权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私有制使女性沦为“生产”工具。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分工的结果,由于两性的分工使家庭内部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从而产生了所有制的最初的萌芽形式。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2](P28)}。一个是就人类的劳动而言,另一个是就人类的劳动产品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女性慢慢退出“公共生产”领域,而进入到更加隐蔽的“私人生产”领域——人的生产。一旦女性进入“私人生产”领域,不仅女性生产的产品包括女性自身都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女性也

就完全丧失了平等生产的权利,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只能是带来物质利益的生产。对于女性的“私人生产”的不认可和否定,一方面体现了私有财产的自私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重新回到“公共生产”领域,成为自觉自由、有意识的生产者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因为,生产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个人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P12)}。其次,扬弃私有制,获得分配权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必要保障。在私有制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权不仅仅意味着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和经济权利的获得,更意味着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被认可和政治权利的获得。虽然现代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公共生产”领域,但是作为工人的一部分,女性也同男性一样仍然处在资本的被剥削和压迫之下。甚至由于女性对经济独立的渴望,而导致其在现代资本生产中遭受比男性更为悲惨的境遇。一方面女性在分配领域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其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较之男性更为艰难;另一方面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同时,“心甘情愿”地遭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支配和剥削。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不仅要获得自由自觉生产的权力,还要获得产品分配的权力。只有拥有了产品的分配权,女性才会结束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状况,才会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尊严和自由^[6]。最后,扬弃私有制,实现女性作为人的平等——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男女平等问题。1843年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马克思认为如何对待女性,表现了人类文明的程度,男性把女性作为淫欲的对象或婢女来对待,是人类自身的退化^{[1](P80)}。男人与女人在生理上的差异是自然因素,而男人和女人地位的不平等则是社会因素。因此,马克思强调如何理解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然本质,而且也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因为男人与女性的关系体现了“人具有的需要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

物。”^{[1](P80)}在这里马克思把对女性的理解和认识上升到了对人的理解和认识上,而一旦实现了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就实现了女性作为人的平等。

三、扬弃异化与女性作为人的复归

异化理论是《1844年手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私有财产得以产生,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劳动者处在异化状态下,并指出只有扬弃异化,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复归。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劳动异化理论,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即劳动产品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劳动本来是主体对象化客体的过程,但是,异化劳动却使主体丧失了劳动对象,并被劳动对象所奴役,一旦成为劳动产品,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东西,因此,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统治自己的异己的对象就越多,就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P52)}。其次,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劳动者要想生存,首先是作为工人而存在,只有作为工人,劳动者才能保证自己作为肉体的人而生存,因此,劳动不再是人自在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而成为并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P54)},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的不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否定。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劳动者丧失了他自身。因此,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再次,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劳动,即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劳动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得以形成,作为类存在的人,劳动就是其类本质。人类的劳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区别,人的意识代替了人的本能,劳动代替了生命活动,而动物的意识还是本能意识,动物的活动还与其生命活动相统一。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分工细化,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不过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劳动已经不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与自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丧失

了作为人的类本质。最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如果不为劳动者占有,那就一定被其他人占有,而这个“其他人”不劳动,却获得并支配劳动成果,进而支配劳动的工人。因此,异化劳动不仅生产了劳动产品,还生产了在这种私人占有下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不仅生产了异化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了异化的劳动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1](P60)}。资本家不劳动,但是却占有劳动产品,并通过占有成为工人异己力量的产品而成为统治工人的存在,劳动对于工人是痛苦,但是对于“这个存在物”却是享受。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P61)}——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关系。至此,工人不仅生产了对自身对立的关系——自身关系的异化,还生产了对他人的对立的关系即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他人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异化入手不仅揭示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下人的异化,并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P78)},这为女性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女性作为类存在,不仅与男性一样在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扬弃道路上不断行进,同时由于女性特殊的社会历史地位,女性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又有其特殊性。作为类的存在,女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由于其参加了社会劳动,因此存在着作为劳动者的异化和作为女性的异化的双重异化现象。首先,女性作为劳动者的异化。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参加社会劳动,成为普通劳动者。这些作为劳动者而存在的女性与其他男性劳动者一样,都面临着私有制带来的自我异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女性自我异化的扬弃与整个人类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一条道路”,女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走的是一条道路”。其次,女性作为女性劳动者的异化。这里的女性劳动者是指所有承担家庭生产劳动的女性,包括那些

既承担社会劳动又承担家庭劳动的女性,更包括那些只承担家庭生产劳动的女性。女性劳动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作为人类生产的第一个方面——人的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生育下一代的过程中所承担的异化劳动;二是女性承担的维持家庭正常运行的家务劳动^[7]。女性劳动异化体现在无论是人类生产还是家务劳动一方面不能脱离私有制社会,反而是私有制得以维系和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女性在从事这些劳动时不是自觉自在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而是女性特别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谋生的手段。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8]。因此,女性劳动者的解放不仅要实现生育的解放,还要实现家务劳动的解放,这是女性解放的特殊性。

四、人类的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实现

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不仅论述了人类如何实现自由和解放,还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绘制了一副蓝图。马克思认为,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为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才能够完成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才能实现人向自身的合乎人性的复归。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1](P81)}对于异化的扬弃包括意识领域和现实生活领域两个方面,因为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对于如何扬弃私有制和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通过实践,因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并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P81)}。

人的全面解放包括人的自身解放和个性解放,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人自身的解放是感性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

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为人一旦获得了解放,“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其次,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真正人的感觉,使这种感觉与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相适应,必须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因为,人作为社会的恒久的现实,必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感觉,这种丰富而深刻的感觉是人作为人的创造性的来源和体现,也是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最后,人的自身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统一。在私有制社会,社会分工使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分裂,人的个性淹没在资本的工业化之中。在对私有制的扬弃过程中,人的感性的解放使人重新获得社会的感性,作为类的存在人是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在扬弃了私有财产后,人不仅是为自己的存在,也是为他人的存在,而他人的存在也是为我的存在。只要是作为人的活动,就是社会的活动,甚至作为人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社会在这里不是与个体对立起来的抽象,而是作为由个体组成的类,个体的生活就成了类的生活,个体存在就成为了社会的存在,个体的生活就成为了社会的生活^[9]。

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且是作为整体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换句话说,即只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才能得以实现^[10]。作为类存在的女性,不仅是作为生理意义的女人而存在,更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如何看待女性的问题,换言之是男性对女性的关系问题,也是最自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指出男性对女性的关系,“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1](P80)}。因此,男人对女人的关系问题反映了人作为类存在的文明进步程度,也体现了人在何种意义上把自身作为类来理解。因此,女性的解放首先是女性作为类的解放,即作为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11]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的异化的扬弃与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前提,也成为女性解放的出发点和推动力。一方面,女性解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女性从事社会劳动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经济地位的独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促进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女性解放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越是获得“平等”和“自由”,就越是作为类的存在而获得认可;女性越是作为类的存在而获得认可,就越是在私有制社会被异化和物化。因此,女性的解放只有在积极地扬弃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够得以实现。总之,女性作为类的存在不仅要获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也在获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过程中实现了类的自由和解放,并实现了女性作为人的复归^[12]。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 张定鑫. 重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问题[J]. 哲学动态,2014,(8):22-26.
-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0.
- [5]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6.
- [6] 温航亮,安春焕.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女性发展的理论审视及启示[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10):6-10.
- [7] 李岁月. 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本解读为依据[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4):9-14.
- [8] 戴雪红. 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47-51.
- [9] 郑争文. 回到人本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学思想的现象学解读[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6):53-58.
- [10] 秦美珠. 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D].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75.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 [12] 刘晓辉. 女性解放的困惑与出路——马克思思想的启示[J]. 妇女研究论丛,2008,(7):5-9.

Enlightenment of Marx's Humanism on Women's Liberation

——Humanism i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WEI Hanbing

(Baotou Medical College, Baotou 014040,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s one of the classics of Marx in his early years, which contains theories about the essence of man, man's exis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se thoughts not only explore the way for human's own development and liberation, but also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women's liberation and methodology guidance.

Key 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lass being; sublate private ownership; sublate alienation; women's liberation

(责任编辑 鲁玉玲)

平等概念与差异形成机制

——基于性别视角

王 驰¹, 张 波²

(1.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07; 2.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平等是人们一直追求的价值,性别平等也是其中一种。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权运动掀起了女性解放的高潮,使人们更加关注性别平等。正由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平等”的概念以及男女差异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两波女权运动的发展在带来平等主题变化的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需要对理念平等与社会现实不平等的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借助对平等差异化原理、平等与异质性的探讨来揭示现代社会系统及差异的形成机制,最终回归到从性别的视角看平等与差异,从而使人们对男女平等有新的认识。

关键词:平等概念;差异形成机制;性别视角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07-07

平等,是作为社会建构和政治形成的价值概念提出来的。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平等概念的文化性、社会性受到更多的关注。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使得有关性别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并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学界并没有对性别平等概念及其有效性的界限作出明确规定,而是将其作为不证自明的范畴直接使用。无可否认,这作为强调女性范畴的工具确实为人们的性别平等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并不代表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概念。尽管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以性别为中心的研究很多,但实际上研究主要聚焦

在女性作用问题上,而对性别平等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男女不平等现实的控诉上,未能对其深入挖掘。此外,性别平等问题与种族研究、残疾人研究等联系起来时,对性别平等的研究就有将其化约为简单的男女差别问题的倾向。因此,性别平等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于社会有怎样的意义也需要进一步探究。

“妇女解放进程的推进及对性别平等的深入思考使‘性别差异’由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一个显性问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彻底思考的问题。”^[1]为此,我们就需要对性别平等的概念进行探讨,并从性别的视角弄清平等对社会的意义。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对要求废除男女差

收稿日期:2018-01-15
基金项目: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项目“社会治理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项目编号:NC16C057);
西华师范大学德育研究会 2016 年度课题“心理认知视阈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培育研究”(项目编号:DY201603)
作者简介:王驰(1988—),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政治学研究;张波(1991—),男,
西华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别、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的平等价值观进行考察。女权主义的平等侧重于性别上的平等,而平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对性别平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产生了理论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性别平等的实质,也有利于妇女更好地实现自身解放。

一、女权运动与平等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学界从各个领域对女性问题的研究也迎来了春天。无论是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学,抑或是对人类社会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的社会学,还是研究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教育社会学都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置于其中,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然而,女权运动带来的影响不应仅停留在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扩展上,而是应围绕女权运动所提出的“平等”本身,对“平等”概念本身的变化进行当代审视。女权运动是近代产生的、体现个人自由与平等价值理念的运动,是近代化的产物。随着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向90年代推进,女权主义对“近代”的重新审视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将视线从女性的“近代”意义转向了“平等”这种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分析了平等与女性的关系,并描绘了男女平等的美好愿景。对于女权主义的平等诉求变化,我们可以通过第一波、第二波女权运动(学界有人认为实际上有第三波女权运动,但存在争议)来进行分析,从而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平等主题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女权运动的中心主题不言而喻始终是要要求男女平等,但现阶段的平等理念与近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相比,存在一定的区别。早期的第一波女权运动中,平等的中心主题是女性参政以及社会参与,即保障作为“迟到的近代人”的女性的自由和平等,实现的是女性的近代化,强调的是无视性别差异的平等;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中心主题则是对造成对女性差别对待的近代社会本身进行重新审视,要求在承认男女属性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在某种程度

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的焦点就是反近代社会;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女性问题不只限于女性解放和女性扩张,如何看待近代社会和这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到理论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中的社会观念问题;另一个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把握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与平等概念相关。前一个问题主要指人类自出现以来本应当保证的平等由于男性占据社会理论的制高点,从而建构起一套男尊女卑的话语体系,使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平等要求视而不见。“在男权社会中,由于女性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在平等权的讨论中缺少女性的声音,因而传统的平等观更多的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2]从一定意义上说,女性实际上已经被部分甩出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由于种族、性别、年龄的不同,人们对什么样的平等才是被认可的理解也是错综复杂。因此,平等的主题在属性的自然差异基础上,必须对“享有平等的人”这个范畴进行重新规定,并形成新的世俗惯性。后一个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不是指平等的内容问题,而是参与平等建构的资格问题。第二波女权运动并不是要求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和规范体系变为以女性为中心,而是主张将男女作为对称的社会范畴平等对待。各个研究领域对性别视点的引入不仅是对近代社会的批判,而且衍生出对平等和现代社会关系的重构契机。换言之,在男女关系的基础上,男女平等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女权运动,上升到全体社会平等的新高度。

二、理念的平等和社会现实的不平等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各个系统以及更下层的分支结构复合而成的阶层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社会中占有的资源、财富以及权力等参数都成为分配的基础,平等由此形成了复数的评价基准,从而造成现实的平等与平等的虚假印象相重叠,使平等的真正实质被掩盖。理念的平等作为一般意义上与不平等相对立的概念,尽管会根据社会形态的发展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在社会各组成部分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我

们现阶段需要认清的不是平等理念的“应然”,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不平等的“实然”以及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平等的概念与哲学有着同样的历史,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现在,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遍及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对于“现实的平等”和“实现的平等”的理解既是多元的,也是多义的。但总体来说,平等的设计应当“抛开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们既有的一切优势和劣势,从一种假设的“原初状态”出发。”^[3]我们既可以以法律平等、制度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来表示不同领域的平等,也可以将平等用于表示诸如“感觉平等”“应当平等”之类的描述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的场合。正是由于“平等”概念的复杂性,我们既要考察作为理念的平等在当代社会起着怎样的作用,又要对现实平等有清楚的认识。

事实上,理念上的平等概念与人权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人权,是指为了保障个人享有充分发展而赋予其的各种权利,是人在出生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这个定义中,实际上就表明人在出生时都具有平等权利的资格,“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4]。但事实上现代社会中充满了人的不平等现实,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使不平等正当化或者在允许的范围引发不平等事态。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宣扬的“人生而平等”的“平等”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它与社会各领域应当实现的平等有着很大的区别。就现阶段而言,平等和不平等就是表征不平等状态向预设的平等状态靠近或者远离的过程,平等问题不再是平等的有无问题,而是将不平等正当化使其成为所谓的“社会共识”问题,这是不平等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前面所述的两波女权运动中都提出了平等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参与社会各领域的平等和在社会体系中享有同等利益分配的平等。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男女参与的机会平等;后者

解决的是女性在财富、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生产、再生产中受到的限制问题。在一个希望实现“人生而平等”愿望的社会,怎样实现女性的机会平等是构建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社会的第一步,而实现女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事实平等是“平等”概念的真正归宿。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权运动所提出的要求侧重点不在于平等的概念问题,而是公民的权利问题。因为在整个社会以及各个分支结构中,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决定了平等的内涵边界。虽然人都有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用来表征每个人的单独存在性的,而是规定与他人关系性的存在的。“平等”这种“权利”如果不存在于客观的社会范围中,不反映人的社会关系,那么它就无法具体呈现出来。人通过一定的社会行为成为社会人,只要开展社会行为就不得不参与到社会的各个结构中,而将成为社会一部分的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的就是“权利”。就这个意义来说,“平等”既是保证个人在社会中全面发展的权利,也是为了保证个人支持社会体系发展的权利,而不是设定为只以社会贡献度和社会评价为标准来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

根据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整体达到的效果取决于部分所能实现的程度。在社会系统中,平等作为实现社会整合与保证社会稳定的要素,是不允许存在与其相异的事物即不平等的。因为现实的社会系统被赋予了相互行为的意义,其内部诸要素是相互作用的,而平等是保证社会诸要素实现最大融合的催化剂。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不是现实的社会,也不是想象的社会,而是能够使社会与个人双方在当下都满足的社会。然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各个组织、个人以及不同领域的社会结构在“权利”上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使社会系统分层化,更出现了分级化,从而导致平等也出现了分化。社会各子系统内平等的标准和状态也发生改变,不同群体参与这些社会子系统的资格也不再是一致的,而是有区别的,从而导致对平等实现状态的判断越来越难,现实的平等也就难以被人们认可。

在一个出现分化的社会,平等是由人们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决定的,而贡献本身就是一个暖

味不清的概念。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和再生产资源的分配主要依据的是效率和绩效。在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初期,绩效主义与平等主义具有相同的意思。根据绩效而不是属性来衡量人们的贡献被认为是从封建身份制社会向平等社会迈进的历史性进步。但是,由于社会对贡献的衡量标准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是有区别的,人与人之间也存在某些天然差异,绩效主义的标准将应当考虑的属性也完全排除在外,形成“一刀切”,构筑了平等外衣下的不平等。因为属性作为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制定贡献评价标准的重要参数,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不同属性的事物置于同一标准。例如现阶段我们采用的学历评价横跨了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两种不同属性的体系,并且都存在绩效的判定方式。我们很难明确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教育属性尺度或者从哪里开始使用经济绩效尺度。一般认为,学历是由教育属性来进行评价的,但实际上学历评价标准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获得学历后所能获得的经济绩效来衡量的,是被绩效尺度代替的属性尺度。正由于此,一方面,人们在界定平等时对整体社会及其各组成部分的贡献衡量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源、财富、权力和评价的分配基准也就变得不确定,平等精神无法得到贯彻;另一方面,平等标准的差异性使得人们对不平等现象的宣泄变得十分无力,从而共同造成了理念平等与现实平等的相去甚远。

三、现代社会系统及差异的形成机制

(一)平等的差异化原理

平等的理念是以承认自然差异为前提成立的,比如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这类天生就存在的区别。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两个原则中就有差别性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使得最少受惠者的获利能够最大化”^[5]。一方面,尽管有人认为罗尔斯的正义差别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但这都是左翼和保守政治学家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借口,他们把人完全设想为如同机器般的理性存在,人性的善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扭曲。但另一方面,即使承认自然差异,这个事实在现实中也很

容易被用来为人为差异作辩护,将世间一切事实不平等归结为自然状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差异”具备的性质、怎样被用来建构不平等进行考察。

一般来说,差异的形成有着不同的标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就某种事物以“是”与“非”的两项对立图式表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某事物与他事物有区别,那么就必然存在区分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找出与之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例如在“计算很快和计算不快”这个组合中,与“计算很快”相对应的是“计算很慢”,从而这个组合就成了“计算很快和计算很慢”。我们乍一看,似乎“计算不快”等同于“计算很慢”,两个组合表达了一个意思。实际上这就偷换了概念,“计算不快”并不代表“计算很慢”,因为这涉及比较标准的差异,前一个组合强调的是计算的速度,后一个组合则强调的是计算的状态。这里体现出的差异原理就在于:一是成为评价标准的价值在对某种事物进行评价时发生了一定的异变,二是自然差异本身在一定程度受到异变。

平等差异的出现也同上面的原理相同。我们知道不平等的出现是由于某事物在程序或结果上形成了对不同群体的差别标准。就社会而言,平等的标准主要由有利价值来衡量,而这种有利价值又是由社会上层自己设置的。社会上层向社会系统导入了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参数,规定了哪些是积极机能,哪些是消极要素。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平等所具备的对所有人均适用的本来价值变换成社会上层指定的价值,从而异化了平等的价值。此外,在这个过程中,别有用心的将基于自然属性形成的差异的内涵和外延按有利于自己需要的情况加以扩展,使得人为的差异(事实不平等)被认为是所谓的自然差异,从而使不平等正当化。如果我们将这种差异用前面所述的权利来进行说明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人们就不应在书面上探讨权利资格的有无问题,而应探讨事实上权利资格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具体呈现问题。如果以参与社会后的贡献来衡量每个人的平等范围,那么这种平等待遇的标准一旦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就可能将事

物的自然差异和属性差异两者混淆,从而形成更大的不平等。在这里,笔者通过对平等差异出现的原理的分析,帮助人们了解不平等出现的根源,以求使平等的基准统一化、规范化、合理化。

(二)平等与异质性

当自然差异作为参与的条件被直接使用时,我们很容易看出什么是不平等。例如,从高校制定的对申请理科专业男女入学人数来看,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比例,这显然限制了男女平等受理科教育的权利。然而,如果自然差异被纳入贡献的衡量标准,那么不平等事实就很容易被掩盖。如果给出同样的理科招生名额,但由于女生学理科不好就业从而使她们放弃理科,那么人们就很难认识到这这也是一个不平等问题。这实际上是隐藏在“平等”外表下的“不平等”。为了与绩效主义这种优势价值体系相对抗,我们必须弄清其利用了“差异”的什么构造来混淆视听,具体来说就是考察差异化是否被人为转化,即“同质性-异质性”的变化,从中引出“平等-不平等”的产生陷阱。

1. “平等-不平等”与“同质性-异质性”的混同。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异质性的集合体,也有观点认为,以范畴来划分同质性和异质性是相对合理的,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集合体为此范畴,不同性质的事物集合体为彼范畴。总体而言,社会是一个从单纯、同质的状态向复杂、异质的状态演变的过程,即社会是不断分化的结果。这个概念从斯宾塞提出社会进化论学说以来,成为分析社会科学、社会关系、社会集体时的标准,也被用来作为同质、异质和差异的指标。斯宾塞坚信“必然进步”的观点,将进化描述为“从均一到不均一、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定到确定的”的进步过程。”^[6]例如在我们周围存在性别集体、年龄集体、族群集体等,他们都具备了集体的共同特征,即以贡献和威信论资排辈、以生活方式决定文化群体。我们以最小单位将社会空间进行区分,并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和价值。

社会符号把我们的世界进行了不同的区分和分节。分节就是一个事物将另一个事物置于

“不同”的位置。在实际生活中,人类重复思考着如何赋予“不同”以新的标准,使其成为“相同”,或者以不同事物的不同价值标准将一直以来的“相同”转化为两种“不同”。就这样,相对于一个符号和象征,我们在强调“同质性”和“异质性”中建构起现在的社会秩序,社会被亲和性向违和性转变形成的距离区域定序。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在一定时期通过意义附加的方法来改变基于价值基础的“同质性-异质性”分节标准。

“平等-不平等”与“同质性-异质性”基准的变化密切相关。从分析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用诸如A比B高这种连续的、垂直分化来表示“平等-不平等”;用A和B和C这种水平分化、非连续性的标准来表示“同质性-异质性”。例如在高考中同为文科的A同学和B同学,A同学成绩很好,能够考上北京大学,B同学成绩相对较差,不能考取北京大学,这是从排名这种垂直分化的标准来论述的,两者属于相同范畴;但另一方面,文科的A同学和理科的C同学即使取得相同的分数,C同学也未必能够考进北京大学,这又是从水平分化的标准来论述的,两者属于不同范畴。然而现实是,由于外人都认为“A同学和C同学都很好,考试没问题”,从而将分属于不同范畴的A同学和C同学放到了同样的范畴,水平分化标准变成了垂直分化标准。按照这种思维方法,造成“平等-不平等”与“同质性-异质性”这两对概念的混同,就在于将名称标准转变为序列标准。也就是说,当被问到是否平等时,最重要的就在于弄清这个“平等”是否是以同质标准来进行界定的。由于社会成员所具备的认知和价值上的差异,对“平等”的看法也不同,从而形成共识也就变得困难。根据用来从经验常识解释社会及其结构的归类标准,至少能够从常识上对平等概念进行把握,但如果对异质领域的各要素进行比较,必然会产生理论的、价值的矛盾。

2. 记述的同质性与现实的异质性的混同。现实中之所以会产生名称标准转变为序列标准的情况,就在于人们在区别“平等-不平等”与“同质性-异质性”时,将“平等”和“应当平等”,“异质”和“应当异质”这类记述层面的内容与

现实层面上的内容混同了。“平等-不平等”是行为主体(个人或群体)对其他社会成员或集体在如何处理待遇的问题上,对其正当性和适宜性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规范概念群。比如我们常说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和“即使男女雇佣机会平等,就业的实际情况依然是男女不平等”。“同质性-异质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描述构成社会的个人和集体,或者区别基于集体能力和属性形成的特性的概念群,比如“男人勇敢,女人温柔”。

在现实社会中,记述层面与现实层面的交错是怎样产生的呢?例如在“因为雇佣机会已经平等,所以男女实现了平等”这句话中,包含了“只要男女一样就实现了平等”的解释,也就是说,“平等”变成与“同质”相近的概念。此外,在“男人勇敢,女人温柔”这句话中实际上已经注入了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价值观,对质的差异性认识很容易带有世俗性眼光。对于男女平等和异质性,男女自出生以来就被划入了不同的社会范畴,因此,人们很容易对诸如“因为男女不同,所以应该……”这种记述上的认识形成定势,使得这种认识向规范的、合理的认识转变,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环境,从而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正由于此,社会成员往往将“现实的异质”误认为是“记述的同质”,从而强化了对平等概念的扭曲理解。

我们还是以教育平等为例,既然女性被同等地保证了受理科教育的机会和内容,那么又是什么使其选择理科的愿望变低呢?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被赋予了“女性”这种属性的记述特性及其附带的价值判断决定了行为的“平等-不平等”与“同质性-异质性”的相关领域。比如通过“女性生来就是为了成为好妻子、好母亲,所以没必要与男性同样优秀”和“虽说是女性,但也不能不鼓励她学习,学习好的女性可能为社会作出与男性同样的贡献”两种主张中,我们乍一看认为这是围绕性别,对教育的平等应当是怎样的状态所形成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表达了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一定限制,后者则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实际上,两者都被转化为现实的异质性,形成的依据是相同的,即女性可以不受教育。在这

个点上,差异化的形成机制使记述性与现实性产生混乱。因此对于男女范畴,我们在同质的领域中讨论的不是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同质和异质发生的错位。这给社会及其成员对“平等”的认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四、从性别的视角看平等与差异

通过前面对平等和差异的形成机制的考察,我们对当今社会的平等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就需要从性别视角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男女平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一方面平等的实现和分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流动上,而另一方面人们对不同性别集团与社会领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性别特征所形成的差异上。前者涉及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交错,后者则是对具体领域男女差异问题的考察,往往不涉及经济领域。即使将后者与经济领域联系起来探讨,也只是将经济作为男女差异的一种补充。

受绩效支配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领域优于私人领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女都扮演着各自的性别角色,形成了“公共领域由男性主导,私人领域由女性主导”的意识。这种性别观在社会蔓延的结果,使得女性在受到不平等待遇时仍不自知,满足于在生活和工作中所获得的“虚假平等”。现在之所以从性别视角研究平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发现,如果将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关的领域进行固定,那么男女不平等在公共领域优于私人领域的社会秩序中就能显现出来。此外,研究视点向私人领域的变化更加显著地改变了女性问题范畴的分类方法,家庭和劳动领域中的社会性别和文化性别也作为重要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从要求废除女性差别的女权运动中诞生的性别视角,与“差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女性与男性作为具备不同生理特征的存在降生在上,被社会强制赋予了其应有的表现,并被放置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优劣顺序中,强调了规范的现实异质性。“性别不平等仅仅消失在了纸面上,真正的两性不平等以各种隐蔽方式表现出来。”^[7]男权社会无视被差别对待的女性意志,反而著书立

说为这种差异进行理论上的辩解,甚至设置话语的陷阱使女性即使在对男权的批判和运动中,也在男性掌控的范围进行。人们对男女差别对待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一是认为现实不存在男女差别或者虽有差别但是不大,相当于否认了男女差别的存在本身;二是虽然承认男女差别,但低估了被差别对待的女性价值;三是对男女评价的方法区别对待,将不平等正当化。

现代社会存在一种现象,即很容易将“男女平等”的问题换成“女性差别”,主要是因为与“男女平等”相关的问题中本身就包含了男女的差异指标;而“女性差别”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的、自然的差异,是以异质性为根据的。这种现实的异质性被转化为自然的异质性也就成为女性控诉不平等的关键。男女平等问题是在承认身体自然差异的基础上,进而要求权利平等的问题,实际上平等问题就被转化为规定性身份的问题。在社会中,平等的规范问题被视为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男女都不处于对称的位置,而为了保持对称就必须建构对称轴,这个对称轴就是规范的平等。总之,性别与

平等的问题必须从“差异”的重重话语陷阱中逃脱出来,树立作为对等社会范畴的男女观念,从而真正理解平等的本质,并以此建构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 王晶,李乾坤.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哲学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6):130.
- [2] 罗英.社会性别视野中的性别平等权[J].法学杂志,2011,(2):102.
- [3] 王一多.社会平等:理想与现实[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7):222.
- [4] 张念.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J].开放时代,2013,(2):107.
- [5] 孙小玲.正义和正义的超越——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J].道德与文明,2016,(1):97.
- [6] 侯波.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考异[J].求索,2009,(12):92.
- [7] 王婷.社会性别视角的嵌入:促进性别平等的完善进路[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11.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the Difference Creation Mechanism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WANG Chi¹, ZHANG Bo²

(1.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2.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0, China)

Abstract: Equality is a value that people pursue all along and gender equality is consisted in it.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1960s was the climax of women's liberation, which mad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gender equality. Thu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the mechanism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wo waves of feminist movement have led to the change of equality in concept, meanwhile, it also makes us realize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pai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quality in concept and inequality in reality. With the study of equality, differentiation and heterogeneity, I am trying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social system and gender differences, finally I will return to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to innovat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Key words: equality in concept; mechanism of formation of difference; gender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妇女观

丰 艳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的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要求,形成了具有大局性、民本性等鲜明特征的习近平妇女观,丰富了妇女发展的时代内涵。他明确指出广大妇女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加强妇联组织建设;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使妇女获得更为彻底的解放。习近平妇女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做好妇女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准则。

关键词:习近平;妇女观;半边天;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1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妇女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论断和新要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妇女观。习近平妇女观也体现出党和政府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政治意识以及核心意识,为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下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凝聚占人口半数的巾帼之力,促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妇女观产生的社会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又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新思想新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的经济、科技、国防

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掌握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人民幸福感获得显著提升。首先,国民经济平稳运行。2013~2016年GDP年均增长7.2%,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其次,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50%,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已经超过60%。再次,2013~2016年,党和政府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扶贫政策,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缩小,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已经削减了391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1]。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有效控制,距离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又更进一步。这些历史性成就为妇女的全面发展及妇女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鼓励与培育下,广大妇女

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获得了明显的提升。政治上,国家制定完善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法律,推动妇女积极参政。《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要求改善基层妇女参政状况,推动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据调查,2013年,在全国30个省级政府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已经超过95%。在95个地市级政府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已经超过90%,妇女在基层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上,国家为妇女就业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党和政府广泛开展妇女创新创业活动,并且从资金、培训等方面给妇女提供帮助。据统计,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已经超过70%,在业妇女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5.3%、14.5%和40.2%^[2]。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在世界前列。文化教育上,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2013年,女性在15岁以上的文盲率已经从1995年的24.1%,下降到6.7%^[3],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发展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此大背景下,妇女事业也同样面临着一些自身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会影响到妇女权益的维护,最终也会影响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为共筑中国梦发挥自己的半边天作用。

首先,我国妇女参政与国际公认标准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从女性参政数量上看,女性在较高级别管理层岗位任职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从妇女参政的结构上看,担任党政一把手的女性人数非常之少,并且妇女干部晋升往往会遭遇“玻璃天花板”现象,晋升机会小且难度大。其次,就业中很多女性遭遇不平等问题。数据显示,女性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收入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远不及男性在工作中获得的劳动收入,男女收入差距比较大。另外,女性在就业中会遭遇到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问题,很多岗位明确要求只限男性,或者对女性身高、年龄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定等,而在具体工作、劳动和学习中,还有不少女性遭遇过性骚扰事件^[4]。再次,妇女在婚姻中遭遇到各种不公平以及权益被侵犯的问题。女性在

婚姻中负担过重,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义务,比如烧饭、洗碗、打扫卫生以及照顾老人孩子等等,远高于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婚姻生活中有很多女性曾遭受过配偶侮辱、殴打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问题。最后,女性受教育水平存在地区差距。如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区的女性能够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很多女性难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妇女发展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做好妇女工作的新路子,形成了习近平妇女观。

二、习近平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思想。

(一)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以实现男女平等为重点,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妇女观的起点。尽管目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妇女的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明显提升,妇女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利于妇女发展的传统性别歧视等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存在,不同地区之间妇女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男女在资源、权利、机会等方面都不平等,社会对妇女的才能与贡献认识不足。此外,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中,妇女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妇女的全面发展问题,并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2013年10月习近平指出:“做好党的工作……必须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充分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5]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全球男女平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6]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①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责任心和担当,通过制定国家的法律法规、作好新闻宣传、微博微信宣传等

多种途径和方式,大力弘扬男女平等思想,并加强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构建平等、文明、和谐的性别文化,反对并禁止一切针对妇女的各种暴力和歧视问题,打破阻碍妇女发展的陈规陋俗,积极为广大妇女群众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积极保障妇女权益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维护和保障妇女权益,满足广大妇女的合理诉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对妇女事业的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妇女事业发展放到“五位一体”总布局 and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规划,指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妇女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其次,习近平指出:“妇女权益是基本的人权。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6]在制定法律政策上,要充分考虑女性的特殊诉求和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同时,要抓好妇女发展纲要,解决妇女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且对侵犯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7]。再次,习近平同志指出,妇女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创造者,这表明妇女是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针对当前不少妇女仍然处于贫困中的现状,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妇女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好妇女脱贫工作是责无旁贷的重大任务,要帮助贫困妇女精准脱贫,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最后,习近平同志认为妇女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水平,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时俱进。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妇女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性,用更大决心与勇气去解决妇女面临的突出问题,作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调动广大妇女参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积极性。

(三)加强妇联组织改革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坚持与时俱进,加大了对妇联改革的力度,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印发了《全国妇联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包括妇联在内的党的群团改革任务,要求扎实推进妇联改革工作。

1. 坚定政治性。习近平同志强调:“群团组织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8]。政治性是妇联组织的灵魂,妇联组织要团结带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引导妇女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让广大妇女把党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她们的日常行动中。

2. 加强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保持和增强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先进性。由于妇联组织是为广大妇女群众争取自身全面解放和发展的群众性组织,必须发挥先进性,跟上时代的潮流,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只有这样,妇联组织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妇女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3. 保持群众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妇联组织在内的各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都要以群众为中心,帮助妇女解决生活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强调“各级妇联组织干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大妇女的心中。”^[5]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强调:“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①,这意味着妇联组织要密切联系和服务广大妇女群众,满足妇女群体的合理诉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妇女在中国梦中的伟大作用。

(四)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党和政府深知妇女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的每一个胜利都有妇女的卓越贡献。为了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广大妇女更需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半边天作用。首先,发挥好广大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

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5]正如德国教育学家福禄贝尔所说的:“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母亲则在子女的教育中起着关键作用,子女教育得好,才能形成良好的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有利于形成清正廉洁的政风和纯朴的民风。其次,发挥好妇女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认为,妇女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具有独特作用,能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广大妇女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优势,向沿线国家宣传中国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后,充分发挥妇女在中国梦中的半边天作用。习近平认为男女平等不仅体现在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更重要的是结果平等,中国梦是每个人的福祉,广大妇女也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尽情展示自己的巾帼风采,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努力拼搏,以获得更为彻底的解放。

三、习近平妇女观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要求,逐步形成了具有“习式”特色的妇女观^[9]。习近平妇女观涵盖了两性平等、保障妇女权益、加强妇联组织建设、发挥妇女独特作用等诸多领域,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十分严谨的思想体系,具有民本性、创新性、大局性、法治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妇女观对当前我国进入新时代,指导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广大妇女工作和妇女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要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观,习近平妇女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针对当前广大妇女在工作、婚姻、教育等方面仍遭遇各种歧视以及不平等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广大妇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妇女思想,包括要宣传男女平等,加强妇联组织建设,积极保障妇女的权益,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等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与弘扬习近平妇女观,不仅有利于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也有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新境界,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促进妇女事业的发展与妇女全面解放

受传统性别观念、立法过程对妇女权益保护不足以及妇联组织不够完善等因素影响,歧视妇女的现象以及侵犯妇女权益的问题仍然存在,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与男性还不平等,这严重阻碍了妇女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妇女的全面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以及妇女的发展问题,不断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力宣传男女平等思想,营造两性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不断探索有利于维护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的权益保障机制,在法律政策制定与具体落实上充分考虑两性的差异,考虑女性自身的特殊诉求,使妇女在婚姻、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女性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加强对妇联组织的改革,使妇联干部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群众性,真正把妇联建设成为妇女可依靠和信赖的温暖之家等等,这些举措不仅体现出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与担当,也进一步促进了妇女事业的发展与妇女的全面解放。

(三)有利于共筑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当前,我们更加具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能力与机会,但是伟大梦想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与,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历史经验表明,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广大妇女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党能认清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并激发广大妇女的潜力具有极端重

要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满足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广大妇女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才智。党和政府要带领广大妇女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完成三大历史任务,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发挥自己的半边天作用。

注释:

-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参考文献:

- [1]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 [2] 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5-15.
- [3] 赵丽.中国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彰显大国担当[N].法制日报,2015-09-30.
- [4] 邢培顺.论女性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及其对策[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2):25-29.
- [5] 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N].人民日报,2013-11-01.
- [6]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5-09-28.
- [7] 沈跃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J].中国妇运,2017,(4):4-7.
- [8] 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7-08.
- [9] 李岁月.论习近平对妇女工作的理论贡献[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1):18-22.

On the Views of Women 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ENG Y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the significan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s creatively propos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ideas, new theories and new requirements on women. Xi Jinping's view of women has been formed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the nature of broad vision, and individual - orientation, which 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current connotation of women's development. The majority of women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thus we must promot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of women's federations,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women to hold up half of the sky, and finally achieve more complete liberation of women. Xi Jinping's view of wom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concepts of women, which will provide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s and guidelines for women's work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Key words: Xi Jinping; view of 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 Chinese dream

(责任编辑 鲁玉玲)

新社会风险下的中国妇女福利：挑战与应对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 北京 100730)

摘 要:新社会风险给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更大的挑战:劳动力市场化与家庭照顾需求增多加剧工作-家庭平衡矛盾,福利供给模式变化导致女性社会保障不足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借鉴福利国家应对新社会风险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平衡工作-家庭之间冲突的历史经验,转变妇女福利从女性的基本权利到劳动力市场投资的发展理念,提出适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趋势、满足妇女发展需求、推动男女平等的妇女福利发展策略。

关键词:新社会风险;工作-家庭平衡;家庭照顾;妇女福利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19-08

性别角色与家庭机构和功能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得新世纪的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面临新的风险,其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育儿精细化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家庭照顾,而劳动力市场、职业发展需要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更加凸显,使得兼顾家庭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化以及中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家庭模式的改变,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原有的单位/工作保障减少,使得在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获取保障的能力更差,不利于她们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就需要我们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社会、家庭密切合作,共谋男女平等、社会发展大计。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新社会风险是指 1970 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变迁而出现新的社会需要,它包括劳动力市场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子女抚养和老人护理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风险,因超出福利国家风险范围而进行福利改革政策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风险。朱利亚诺·博诺里(Giuliano Bonoli)将“新社会风险”分为三类: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与传统的家庭责任之间矛盾的激化;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使得知识型社会中低技能工人随时可能遭遇到失业和贫穷陷阱;职业生涯中断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不足^[1]。

传统的福利保障的是和市场经济运行相关的风险,比如养老、工伤等,目的是促进社会再生产,

收稿日期:2018-01-03

基金项目: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类)“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讨”(项目编号:12&ZD035);2016 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工作研究”

作者简介:黄桂霞(1976—),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妇女就业与保障、性别平等研究。

劳资双方都能从社会保障中获益,核心群体是有稳定就业和连续就业的工人,其实是以男性为主的,所以,面临新社会风险的主要群体是女性,尤其是有家庭照顾负担无法平衡工作-家庭矛盾冲突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对她们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型劳动力市场需要终身学习,个人发展与职业发展都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投入更多,但同时家庭育儿精细化、人口老龄化又加重了家庭照顾负担等,使得工作-家庭的冲突越来越激化;二是性别平等使得女性对职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的追求越来越高,男女平等不断推进,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主动,更注重自我发展,与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矛盾深化;三是女性因家庭照顾责任而中断职业导致的社会保障不足。

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化以及福利国家的改革使得新社会风险的责任越来越分散到个体家庭及女性个人。作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照顾责任的增加以及保姆市场求大于供的困境,都使其需要在照料孩子与赡养老人方面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养育3岁以下婴幼儿的职业女性,从子女照顾和发展的角度出发,一部分女性选择暂时中断职业,专职抚养婴幼儿,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加入到失业大军行列,这使其不仅当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还直接影响了其以后的职业发展和对社会保障的享受;还有一部分女性为了协调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选择了不利于职业发展的兼职工作或者灵活办公的低职、低薪工作,但大部分兼职工作收入较低、保障较差,就低工作也使得女性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另外,女性社会地位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其在劳动力市场占有一定的优势,妇女对家庭的依赖性降低,离婚率和单亲母亲数量增加,而单亲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又遭遇很多传统的障碍,面临新的风险。应对以上挑战的核心是化解工作-生活冲突,解决途径就是平衡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其实,工作-生活平衡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内时间的分配以及在两个领域作为劳动者和照顾者责任承担的平衡,这也是妇女福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新社会风险下中国妇女福利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 劳动力市场变化增大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风险

就业是女性获得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业采取国家统分统招的形式,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而且各种制度保障同工同酬(当时,工资基本就是全部收入),国家还为双职工家庭提供了方便易得的家庭可支付甚至免费的公共托幼服务以及职工食堂等,解除了妇女就业的后顾之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和单位提供的托幼公共服务不进不退,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无形之中加重了目前中青年职工的老年人照料负担,在家庭照料负担和劳动力市场需要之间,妇女的就业矛盾更加凸显。

市场经济的深化给女性就业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就业权问题。职业要求提高,但家庭照顾服务支持不足,女性就业困难增加。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效率优先的劳动力市场,需要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且需要劳动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女性因家庭照顾分散大量精力,因生育造成人力资本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在就业市场的加剧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下降,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中立,使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不仅是家庭经济的选择,也是部分女性抵御风险和解决性别身份认同危机的出路^[3]。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本身就失去了福利的主要来源,而且市场劳动收入越来越高,不参与劳动市场的女性与参与者相比失去的更多。

另一个是收入的性别差距。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女性收入仅为男性的62%,2017年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中国女性的每天工作时长为男性的1.09倍,且花在照顾家庭等无报酬工作上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44.6%,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8.9%。在女

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甚至高等教育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比例也略高于男性的当前,女性为了平衡家庭-工作冲突,而更多地选择了灵活、劳动强度较小但收入也相应较低的职业。

收入存在性别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绩效工资的差异。在2017年的一项涉及13个省市2万多职工的调查中,男女职工认为同工同酬的比例均超过80%,管理者中同工同酬的比例达到91%。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机关事业单位同工同酬的比例在90%左右。“同工同酬”的比例之高与收入的性别差异之大形成鲜明的对比。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同工同酬,同的是基本工资,而目前收入的内容更加丰富,比如绩效工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更高,也恰恰是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的这一部分工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当收入不再仅仅是基本工资,而越来越多的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相关联时,以基本工资为标准的同工同酬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变得不再明显,因为它已被不平等的绩效工资淹没了,但收入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所以,女性的就低就业、兼职与弹性就业、无酬家务劳动尤其是家庭照顾责任,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劣势、收入较低的主要原因。

(二) 育儿精细化、人口老龄化增加家庭照顾需求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福利有相当大部分是针对妇女的高就业而无力承担家庭照顾责任而提供的,单位保障的体制可以为女性劳动者提供家庭照顾,减轻她们的家庭照顾负担,比如为职工生活提供便捷、减轻家务劳动的集体宿舍、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设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点转向经济发展,为减轻财政负担,弱化了公共福利的提供,甚至从很多公共服务中退出,为在职女性提供的平衡工作-家庭的福利措施也一并取消,家庭照顾责任重新转移到家庭中的女性身上。城镇保障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保险为主,妇女工作-家庭平衡面临双重压力,市场经济甚至驱逐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农村的社会保障在一段时间内仅有较低水平的救助性的社会福利,而且至今依然不够完善,只有基

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生育相关的保障和育儿相关的保障政策近乎空白,农村妇女面临更重的家庭照顾和养育负担。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中青年女性,上有老下有小,照料负担越来越重。一方面儿童照料需求猛增。不仅是日常照料的精细化要求提高,养育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养育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全职工作的女性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非常困难,从早教到各种兴趣班、学习班,家长需要全程陪同。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健康寿命的不同步,导致老年失能人口增多、失能时期延长,家庭照料负担增加。自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趋势掉转,减少了345万,而60岁以上老年人增加了891万,2014年,又增加了594万。这其中有三成甚至更多需要长期照护的失能老者,照料需要激增。2015年我国80岁及以上人口大约2300万人,2035年将超过5000万,2055年将超过1亿人^[4]。

育儿精细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加重了家庭照护负担,制约了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挤出”了用于学习和教育的精力、时间和金钱,也加大了经济活动人口的压力。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员外出劳动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又需要劳动者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投入,增加工作时间,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带来的供给缺口,同时加大劳动强度、提高人力资本要求,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这在现代服务业、知识生产领域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更常见。这些都加重了工作-家庭冲突。

(三) 福利供给模式变化凸显工作-家庭矛盾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是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当经济压力较大或者社会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时,家庭往往会成为被忽视或放弃的一方,当家庭照顾需要较多、经济压力较小、个人职业发展期望较低时,工作、职业发展容易被忽视,但当家庭照顾需要较多、个人职业发展期望又高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凸显。

人口老龄化需要维持高就业,需要更多的劳

动力进入市场,少子化、低出生率,更迫切需要成熟的妇女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工作的灵活性和可变通性却越来越差,单位可以提供的时间和经济保障越来越少,女性需要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收入来换取家庭照顾的时间,否则就会被劳动力市场淘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婚姻越来越不稳定、不安全,家庭的照顾、福利功能日渐衰弱,女性的家务劳动尤其是照顾劳动得不到补偿甚至不被承认。劳动力市场变迁和家庭稳定性下降,使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增加,她们亟需在社会上求得自身的发展、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定位也发生变化,其职业发展需求越来越强。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了经济独立,减少了对家庭的福利/经济依赖。但职业女性在工作中的投入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作用的发挥,尤其是照顾工作的投入减少。劳动人口中女性数量的增加,引发儿童看护以及老年看护的社会化,公共服务需求增加^[5]。而现有的福利体系尤其是公共服务没有给予积极及时的回应补充,女性兼顾工作家庭这种多任务耦合的概率越来越低,导致家庭决策也更倾向于市场的选择,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女性甚至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做起全职妈妈。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从事非农劳动的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且逐年大幅升高,女性在1981~1990年生育的职业中断比例为10.3%,1991~2000年生育的职业中断比例为21.2%,2001~2010年的这一比例为35.0%。社会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女性却无力平衡工作-家庭冲突而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大部分职业女性深陷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的矛盾之中,工作-家庭矛盾平衡成为新社会风险下女性所面临的核心命题。

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国内外实践经验

质高价廉的公共服务可以让父母将工作和育儿结合起来,丰厚的育儿津贴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负担,让家庭有更强能力从市场上购买照顾服

务,从而保障育龄女性的劳动就业权,也可以更好地保障1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通常将与生育相关的女性就业权利保护作为政府实现平等就业和反歧视、家庭-工作平衡支持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进行了婴儿照顾津贴的探索,1950年代双职工家庭开始大量涌现,尤其是19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党和政府出台系列法律政策,减轻妇女家庭照顾责任,使她们能够安心从事社会劳动,较少工作-生活冲突。

(一)公共服务支持解除职业妇女的后顾之忧

对积极参加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给予社会支持,其主要体现在国家在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上提供服务支出的水平,特别是花费在家庭主妇照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采取发展多种多样的托儿组织来为双职工家庭提供照顾支持的,尤其是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举办的托儿所、幼儿园,为了方便职工接送子女,除了在职工居住集中的地点和办公地点开办比较正规的托儿所、幼儿园外,还会在工地开办临时托儿所,以减少职工送托子女往返路程的劳顿和时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费用直接由职工所在企业支付,少数单位不方便建托儿所的职工,可以将子女送往个体托儿所或幼儿园,管理费则由职工所在工作单位报销。据北京市统计,1949年初有托儿所11处,收托儿童340名,到1955年底,托儿所、幼儿园发展到791处,是1949年的近72倍,收托儿童4万名,是1949年的117倍^[6]。这些托儿机构,对于发挥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责任早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就是德国关注的问题了,当时政府认同并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自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都主张增加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承诺要“平衡协调工作和家庭关系”,主张扩大公共服务。法国在支持照顾儿童方面较为突出,1999年此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23%,比如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方式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托儿所。在英国,主要通过税收减免和私人机构提供护理支持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在2000年正式注册的63.4万个儿童护理机构中,有55%是由注册的私人儿童护理员提供的,41%是由私人托儿所提供的^[7]。

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公共育儿服务,减轻女性育儿负担,以扩展女性潜在工作空间,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的方式。比如,韩国政府向在工作场所建设育儿设施的雇主提供不超过7亿韩元的长期低息贷款,给予育儿中心建设和运行必要的信息、咨询及部分开支支持等^①。法国政府向工作的父母提供廉价高质量的育儿服务,比如开放免费的保育院^②。1970年代,瑞典通过扩大社会服务和日间护理机构解决儿童照料问题,并实施了6小时工作制,支持夫妇双方都工作的家庭,帮助妇女从母亲和家庭主妇转变成为独立的个体。

(二) 育儿补贴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对婴儿照顾补贴进行了探索。1931年劳动法规定,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婴儿补助金,用来购买小孩十个月所必需的物品和牛奶。1941年陕甘宁边区规定,生育妇女可以领取分娩津贴及小孩津贴,女工所带小孩每月发给带乳费。太行区在1948年的规定中增加了雇佣人的费用支付项目,为太行区工作的妇女干部产前产后提供假期、粮食待遇,并且提供麻纸50张,棉花1市斤,小米70斤,作为生产及雇佣人的花费;男干部之妻生产时则一律给小米50斤,作为雇人之用^[8]。为雇人提供费用,在保障孕产妇自身权益的同时,也为婴儿享受更好的看护提供了基本条件,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难得的高水平的保障。

国外尤其是欧洲很多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直接补贴来降低育儿服务的相对价格,增加育儿服务的可及性,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法国2004年对有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增加了育儿补贴,Givord和Marbot在2015年研究发现,这项改革平均减少了家庭50%的育儿开支,增加了女性大约1%的劳动参与率。Bettendorf等(2015)对

荷兰2005年改革^[9]的研究显示,改革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2.3%,每周工时平均增加1.1小时。挪威政府对于找不到育儿中心的1~2岁儿童提供超过9000美元的现金补贴。澳大利亚通过实施育儿津贴和育儿税政策来帮助家庭减轻育儿成本。在法国,1980年代扩大了对公共日间护理中心的投资,1987年政府还提供了儿童津贴,鼓励妇女在家照看子女,1990年代,政府对雇用他人照顾子女的家庭提供补助,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家庭护理。

(三) 灵活办公时间,为家庭照顾提供支持

国外在灵活办公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一方面是削减工时,即生育女性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每天工作,但工作较短时间。这样既避免了女性长期远离劳动力市场,也便于其保持自身工作技能以及重返工作岗位,对于保障女性就业权利有较好作用。在瑞典,生育女性可以以削减3/4、1/2、1/4或1/8正常工作时间的形式休产假(分别享受3/4、1/2、1/4或1/8的产假补贴),也可以以削减最多1/4正常工作时间的形式,休产假直到孩子满8岁^②。新加坡还推出了兼职计划,每天正常工作,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每天工作,但是工作更短时间;也可以自选工作时间,如一周工作一周休息;也可以混合采用。

另一方面是灵活工作时间,即指除“核心”时间外,灵活掌握上下班时间。早在1998年,新加坡Abacus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就规定,雇员可以在7:30~9:30的任意时间开始工作,在4:30~6:30的任意时间下班。这种工作方式在不增加企业工资成本的同时,延长了工作场所的运作时间,也为女性雇员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提供了机会,对增强女性工作动机、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员工忠诚度都有积极作用。

中国目前的削减工时主要针对育有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哺乳时间算工作时间。为女性缓解婴幼儿照顾与工作冲突提供了较好的支持。每天减少的劳动时间可以分开哺乳使用,也可以晚到或早退相

应时间。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长,有的地方有家长会假,比如北京市规定可以在工作时间去开家长会,工资照发,评奖不受影响^③。

四、新风险下中国妇女福利发展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领域更受重视的社会中,作为促进社会稳定与性别关系两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妇女福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有保障女性就业权的系列法规政策,但平衡工作-家庭的政策措施明显不足,新社会风险下,不仅需要转变妇女福利发展理念,还需要政府、市场与家庭共担福利责任,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纳入性别视角,制定可持续的家庭友好政策,为妇女提供高质量而且可以负担得起的儿童照顾服务,考虑妇女“家庭照顾”的津贴,提供家庭照顾服务,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福利^[9]。

(一)转变妇女福利发展的理念

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新社会风险的保障,新社会风险除了面对市场风险外,更多的是要满足与人口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需求,比如儿童照料。因此,需要新的社会福利理念和制度来化解。

一是将社会福利从基本权利向人力资本投资转变。缺乏儿童照顾设施不仅是影响母亲就业和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因素。应对新社会风险的平衡工作-家庭矛盾冲突的妇女福利、儿童福利政策,其实是通过扩大劳动力队伍和劳动力的可雇佣性、提高市场效率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来支持经济竞争力,通过支持性的社会供给创造社会投资,而不是补偿性的福利转移,仅仅增加福利消费的负担^[10]。因此,针对妇女尤其是家庭中儿童养育的福利,比如为幼儿提供照顾津贴,不仅仅是帮助家庭尤其是妇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使其有更充沛的精力和更高的效率投入到全职工作中,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本价值,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补偿和投资,是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有效运作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是将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相结合。非正式照顾工作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或者参与度,但

是非正式照顾也是现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因此,重置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的关系,通过增加工作生涯的弹性将有酬工作与非正式照顾结合起来,是目前化解工作-家庭矛盾的最有效方式。可以与私人服务提供者合作,引入非正式看护的福利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捆绑形式的福利。

(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福利

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低人口出生率,使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迎来刘易斯拐点,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再创造,妇女成为化解这个问题的理想的劳动力后备库。但是质高价廉可得的公共照顾支持或者是普惠性的育儿照料津贴的缺乏,成为影响妇女就业的主要障碍,需要政府帮助职工尤其是女性协调职业发展与家庭照顾负担。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家庭政策和性别平等问题实质是一个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弥补妇女福利发展的短板。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观实力与能力^[11]。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还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提供针对女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减少女性在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提高妇女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消除性别歧视的雇佣保护,促进女性多渠道就业创业,不断提高妇女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实现妇女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缩小收入上的性别差距,使广大妇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国家回归:为工作-家庭平衡提供支持

国家除依靠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制度很难解决不平等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外,还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平衡社会发展与社会平等。因此,社会政策的设计不仅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要兼顾家庭需要和妇女个体发展需要。

首先,将社会政策纳入家庭视角,建立家庭友好型政策,提供更多的家庭服务支持。家庭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它为家庭成员提供必要

的照顾与保护,因此,当家庭照顾功能弱化时,需要国家与社会给予一定的支持。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照顾补贴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与假期。时间和精力冲突是工作-家庭冲突的核心,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和更多更灵活的休假——育儿假、陪产假以及家庭事务紧急假等可以较好地满足照顾需求,而足够的经济支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市场服务替代家庭照顾服务,比如可给困难职工提供家庭照顾津贴或者补助。另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尤其是质高价廉易得的公共托幼及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与独生子女政策,加重了核心家庭的照料工作,职业岗位对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要求,需要创建更能适应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中照顾儿童的形式,比如时间更长、更灵活的照顾提供。获得照顾应该是儿童的法定权利,政府需要整合资源强制性地组织这些照顾活动,这不仅能满足儿童权利,也可满足双职工家庭的照顾需求。

其次,提高女性教育收益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承认家庭照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与男性不相上下,但因为照顾家庭而选择就低就业,降低了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国家需要给予平等就业政策,以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为平衡家庭照顾,成为灵活就业、兼职就业的主体,导致其社会保障的缺乏,国家需要承认家庭照顾的社会价值,与有酬工作一样,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比如,将照顾儿童的成本“社会化”,对养育儿童的母亲变相支付和增加养老金账户基金等。

(四)打破男权:平衡家庭照顾责任

家庭是福利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尤其在非制度化福利供给中,是福利资源最重要的来源,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福利功能,其福利角色主要体现于老人照顾、子女养育、情感慰藉等。在我国,家庭照顾在福利中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基础地位和提供模式,主要由女性承担福利给予,尤其是家庭照顾者的角色和责任绝大部分是由女性来承担的,这些直接影响了她们在社会上从事有偿劳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也成为女性社会参与的障碍。缺乏有偿劳动的机会,女性也就在一

定程度上丧失了分享社会福利的权利。

新时代,广大女性追求男女平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男性共同奋战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前沿,当女性的活动领域不再局限于家庭,家庭照顾责任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担就成为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一个显性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表明,经济上不活跃而陷入贫困高风险的原因,男性主要是生病和残疾,妇女则主要是家庭责任拖累^④。因此,应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让更多的男性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更多地承担照顾责任,让更多的女性尤其是母亲能从事有酬劳动,不仅为劳动力市场作贡献,也可以减少妇女尤其单亲母亲贫困,为社会减贫作贡献。

(五)社会支持:妇女福利责任的再平衡

家庭核心化趋势使得家庭照顾功能弱化,作为基本照护服务供给和消费的最小单元,家庭提供照顾服务的能力不断下降,社会介入儿童照料问题、弥补家庭照料不足成为必然。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为参与社会劳动的家庭提供了较好的公共服务支持,尤其是托幼服务,而且职工大部分能居住在单位附近,即使单位福利不足,女性也可以就近很好地照顾家庭,加之当时人均寿命相对较低,且有一定的单位福利,老年照顾负担也较轻。改革开放以来,原本属于政府责任的服务供给职责逐渐被转移给家庭,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离工作场所较远的地方,往返交通一方面占用了很长的有效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单位保障功能难以实现。例如北京,严重拥堵的交通让很多人选择了更加有有保障的公共交通出行,即使单位能够提供托管服务,过度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无法携带婴儿到单位托管,这就需要社区提供相应的照顾支持服务,以替代家庭的部分照顾功能。

当然,用人单位的责任也不可推卸。当社会文化倡导女性履行大部分照顾孩子的责任,并鼓励男性发展公共领域的能力时,必然会妨碍女性发展她们的潜能,导致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劳动力市场不仅要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实现经济独立提供就业机会和途径,提供基本的社

会保障,还要在保证单位绩效的情况下,为有家庭照顾需要的职工提供工作-家庭平衡支持,比如灵活的办公方式、相对弹性的工作时间等。

注释:

- ① 改革始于2005年,具体内容包括提高育儿补贴水平(减少家庭育儿开支50%,把补贴范围扩大到几种不常见情形,在接下来的5年增加3倍育儿公共开支),增强低收入父母税收优惠力度等。
- ② 参见《SFS 2006:442》第四到第八部分内容。
- ③ 参见北京市颁布实施的《关于职工参加学生家长可作公假处理的通知》,北京市劳资字第311号。
- ④ 参见ONS(2002b)NDLP: Statistical Release to September 2002。

参考文献:

- [1] 余南平,梁菁.新社会风险下的西欧国家工会[J].欧洲研究,2009,(4):85-106.
- [2] 黄桂霞.男女不平等: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4):1-8.
- [3] 吴小英.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8.
- [4] 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7——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探索与制度选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53-55.
- [5] 安内莉·安托宁,陈珊.北欧福利国家遭遇全球

化:从普遍主义到私有化和非正式化[J].社会保障研究,2010,(1):1-15.

- [6] 1956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执行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关于“增加托儿所、托儿站数量,提高质量,加强对托儿所、托儿站的监督管理”提案执行情况的报告[R].北京市档案局,档案编号110-001-00566-211.
- [7] Anne Daguerre. *Childcare Policies in Diverse European Welfare States*[A]. Klaus Armington, Giuliano Bonoli. *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Adapting Post-war Social Policies to New Social Risks*[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16-221.
- [8] 太行区婴儿保育、产妇保健暂行办法草案(1948年7月1日)[A].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56-257.
- [9] George, V., Page, R.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M].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5. 236.
- [10] [英]彼得·泰勒-顾柏.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M].马继森,译.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10. 167.
- [11]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 52-54.

Chinese Women's Welfare under New Social Risk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HUANG Guixia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social risks have brought more challenges to Chinese families, especially women. The labor market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amily care intensify conflicts in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Change in welfare supply patterns leads to in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for women. To response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other welfare countries' response to new social risk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work-family balance in China. Women welfare development strategy need to change women's welfare ideas from the basic rights of women to invest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o put forwar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could suit for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 meet the needs of women'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Key words: new social risk; work-family balance; family care; women's welfare

(责任编辑 鲁玉玲)

论性别公正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李晓广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形式。然而,基于性别公正视角的考察,这一在乡村逐渐推行的民主治理方式,却因存在明显的女性边缘化现象,导致其有效性受到质疑,也制约了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在更深层次上,需理性辨识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非对称性及男性精英的自利性等因素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所产生的变异机制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治理效用的侵蚀,进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从协商机制创新入手,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协商民主;性别公正;产生机制;农村基层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27-07

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进快速。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重要性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在国家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中都曾反复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行政村、社区的协商。”“涉及行政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①与此同时,2015~2017年连续3年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在财产分配、婚姻生育、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表明近年来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日益突出的女性问题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事实表明,当前我国

农村妇女在反贫困、生育健康、资源分配、权益保障等多方面遭遇重重困境,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又产生了诸如性骚扰、婚姻维系等等留守妇女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存与发展,制约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也背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平等”重要思想^②。因此,在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进程中,女性问题理应成为重要的议题。

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性别公正检视

讲“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重要的是看这种平等或不平等是否性别公正。如果性别公正,那就顺其自然;如果性别歧视,那就应该去纠正这种“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1]。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角度来看,性别公正主要还是基于女性的社会待遇差于男性并呈现出不合理而提

收稿日期:2018-01-0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江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研究”(项目编号:SKCX2016006)

作者简介:李晓广(1974—),男,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乡村政治发展研究。

出的,它是一个女性价值追求的课题^[2]。就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性别公正问题而言,体现为从制度文本到具体实践运行及其结果对女性权利、机会及其利益的尊重与维护。

基于这一理念,首先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关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原则性规定和倡导性意见来看,因性别盲视而产生的性别公正缺失较为显见。这从两个重要的测量维度即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的大致规定可见一斑。如2015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协商议题应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中关乎广大村民实际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农民强烈要求尽快加以解决的困难和纠纷;党政部门针对乡村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的落实;政策法规明文要求协商的事项;乡村各协商主体如村两委、村民小组、驻村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户籍和非户籍村民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等提出要求加以协商的事项等。这里既没有明确将农村女性问题作为协商议题,也没有将农村女性作为协商主体单独列出,缺乏性别意识的敏感性。只是在谈到运用多种平台开展农村基层的协商活动时,提到“妇女之家”这一平台。而在之后各地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中,虽然对协商内容和协商主体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框定,但大致上只是扩展了中央文件的基本规定,触角都没有延伸到女性群体和女性问题,性别意识仍然较为模糊^③。

如果说中央和地方文件只是一种倡导性的一般规定,那么各地农村基层应该根据村务工作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在制定较为具体的协商民主制度章程及协商实践运行中体现一定的性别公正。但实际情况是,自协商民主在农村实践以来,协商主体在两性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不仅体现为制度文本对女性的性别盲视,而且还表现为参与协商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在协商阶段和最终的决策中对涉及女性的相关利益与议题未能给予充分的尊重和关怀。

浙江温岭市是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肇始地,其松门镇在1999年召开了四次论坛,讨论的主题涉及村镇建设、村容村貌、工业经济发展、科

教兴镇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泽国镇的村级民主恳谈会则规定,恳谈会的目的主要是对重要的村庄事务(如村庄规划、经济发展、环境卫生等)和公益事业作出决策。对于参加恳谈会的成员则规定村民可自愿参加,村民代表必须参加。2004年,温岭市正式下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对民主恳谈的基本原则、议题范围、参加对象等作了明确规定。但从恳谈的内容和参加的人员来看,既没有将农村女性问题纳入恳谈议题,也没有对女性参与作出明确规定,多年来性别敏感度一直较低。直到2005年,将西方协商民主理念引入民主恳谈会,在中外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指导下,在对一些村镇的民主恳谈会进行控制性试验中,才逐渐有了一定的性别意识。如泽国镇扁屿村将协商民主的主体平等原则嵌入民主恳谈会的制度设计中而产生的参会代表的随机抽签选拔制度,使女性有了被选为代表参与民主恳谈的平等机会。他们采取乒乓球摇号方式选择民意代表,在2005年规定抽签到户,男双女单派户代表,2006、2007和2008年进一步以相同规则抽签到人^[3]。而且在2006年的4次试验中,考虑到参会的村民代表在代表性上的问题会导致一些弱势群体(如农村妇女、低保困难户、外来人口等)的声音不能在民主恳谈会上得到反映,还对村民代表之外的参会人员进行了专门挑选。最终在85名参会人员中,除47名村民代表,代表之外人员中有9名妇女,从而使参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1.1%(超过临界规模的30%)^[4],以确保女性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就村庄重要事务发表意见,并且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恳谈的主题虽然涉及面较广,如村庄规划与经济发展、治安与环境卫生、垃圾处理与村庄绿化等,却没有关于农村女性问题的议题。另一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控制性试验,是分别在2009、2012、2015年,由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专家学者全程参与指导的河南Z村三次修订村规民约的村级协商民主实践,协商内容主要聚焦于村庄集体资源分配中男女两性村民的村民资格和权利,并在协商主体中确定一定比例的妇女代表参与村规民约修订的充分协商,而且在修订后的村规民约的宣传、执行中也发挥了妇女们的积极

作用,很好地维护了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出嫁女的合法权益^[5]。强烈的性别意识,使村规民约修订中的性别公正得到充分体现。

可见,在由专家学者全程参与指导下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控制性试验中,尤其是在为解决性别问题的协商事项中,能够较好地遵循性别平等的原则,体现一定的性别公正。但在有专家学者进行制度设计和参与下的协商民主实践中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性别公正,并不代表日常的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兴起的其他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如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中,性别公正缺失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从议事协商的范围和内容来看,几乎各地农村的协商民主形式都规定,商讨和决定的事项主要包括:村庄公共事务,如经济发展、村庄规划、村庄道路修建、环境卫生等;村庄集体公益事业;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等。在协商事项上没有明确将农村女性问题列入经常性议题。从协商主体来看,各地农村协商民主章程的制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盲视。在成员构成上规定,除村两委成员外,要积极吸收老党员、老干部、退伍军人、经济能人、外出乡贤及村中有威望的宗族长等。这些规定看似没有性别歧视,但精英取向的选人标准在传统性别本质主义认知的影响下,却严重制约了女性当选为协商代表的机会,致使女性理事或议事成员比例明显偏低。如安徽省全椒县三个村的村民理事会成员中,女性仅占理事会成员总数的16%^[6];成都市郫县A村的女议事员占比为19%^[7]。广东省新兴县某农村社区理事会31名理事成员中,只有4名女性,仅占理事总数的12.9%^[8]。四川双流县某村25名议事会成员中,女性只有2名,仅占8%^[9]。虽然一些地方,如在江苏某地农村的党群议事会章程中对议事会人员组成上要求吸纳一定比例的女同志^[10],安徽省在出台的《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实施方案》中强调,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立的村民理事会成员组成上,应包括妇女代表^[11],但这些非强制性且措辞模糊的倡导性意见并不能弥补女性代表人数偏低的不足。

现场观察发现,在具体的协商过程中,女性

协商代表往往参与消极,发言较为温和,且简单、直接,缺乏逻辑性和辩论性,发言内容也与生活息息相关,多数集中在乡村治理中的细小事务上,对重大事项不仅关注较少,且讨论中缺乏思考,较为被动。以简单平等的随机抽样方式产生协商代表,看似提高了女性代表的比例,实则女性群体在实际的参与中存在着较高的缺席率。即使参与,女性代表保持沉默的也不在少数。当女性代表不愿发言或发言次数过少时,主持人也未给予在场女性适当的启发和带动。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女性群体并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言论表达权,她们的观点被忽略,她们的参与被边缘化^④。整个协商过程实际上被由作为强势一方的男性群体所操控,协商民主的对话范式充满了男权主义色彩。这表明,虽然男女间的尊重规范已经被明示了许久,但非正式的规范还是使得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力^[12]。而且“只有平等进入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保证弱势群体在进入制度后被平等对待。比如,他们会不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因为他们会感到无权利讲话或认为别人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参与。”^[13]两性话语权不对称的协商过程必然带来协商结果的达成以有利于作为强势一方的男性群体而告终,从而导致女性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

综上所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文本,包括国家和地方关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政策、意见,各地基层具有典型性的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党群议事会等协商形式的规则、议程等都存在着对女性的主体参与和女性问题的性别盲视。在具体的协商实践中,女性问题在协商议题中的被排斥,女性群体在协商代表席位获得中的低比例,在参与协商对话中话语权的性别弱势等,使得看似人人独立平等、自由无涉的协商参与,却无意中剥夺了女性群体平等参与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置她们的利益于不顾。这表明在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性别公正缺失还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既违背了协商民主理念的包容性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对话进程,提出或质疑某个主张、陈述理由、表达和挑战各种需求、价值观和利益^[14],又违背了平等原则

要求将所有公民包容在协商之内,并将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如权力、财富和已有的社会不平等排除在外^[12]。

二、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性别公正缺失的产生机制

分析导致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缺失的原因,在更深层次上,需嵌入性别视角阐释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念、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非对称性及男性精英的自利性等,在乡村治理中所产生的变异机制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带来的实质影响。

(一)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的持续作用力

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性别政治意识形态所体现的“男公女私”“男外女内”等非正式制度规范曾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地束缚在以家庭为轴心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特别是公共政治领域一直是男性的专属领地。“牝鸡不可司晨”的观念使得政治成为女性不可触碰的雷池,偶有“僭越”又得以男性的官场形象来型塑自己,否则就会遭致排挤,“女性干政”还经常会背上“红颜祸水”的骂名。男性的政治属性与女性的家庭属性印刻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传统性别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近乎性别本质主义的认知及对两性政治社会化的区别对待,既不因近现代西方性别平等思潮的引入和各种女权运动的冲击而逐渐式微,也不因当代中国在各个层级的参政领域极力推进“男女平等”的政治活动而土崩瓦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制定了实现两性平等参政的政策法规,但因传统性别政治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执行起来往往是南辕北辙。“男公女私”“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和运作,不仅造成女性的家庭角色定型化、社会角色非政治化的性别刻板模式依然残存,而且致使女性对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占有的匮乏,整个社会特别是权力领域,仍然为男性主宰,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依然由男性掌控,女性在经济、政治上只能继续处于依附、从属地位。公共政治领域对女性的排斥,政治社会化对女性的忽视,文化素养、政治能力培育中的女性缺失,“相夫教子、男主女从”对女性的

角色期待,这一切使得女性按照男性为她们设计好的角色规范去型塑自己,主动将自身排斥于政治之外。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村落男权文化中,对男人一贯的依附和从属心理,使得农村女性不愿涉足政治。

因此,虽然协商民主进入村民自治领域为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平台,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却遭遇了以“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为特征的传统性别政治文化的消极抵制。现实中的男女村民长期受传统性别政治文化的熏染,从内心早已接受这一分工模式,并内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这种传统的思维惯性与观念错位的“刚性意识形态”,“主内”和“附庸”的角色定位,严重阻碍了广大女性参与乡村协商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即使参与事关自身利益的议题商讨,也存在高缺席率,如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因为一旦规范获得了社会关注,并获得了共同体成员的遵守,变革这种规范的努力依然必须克服维持现状的压力。即使某人作为个人可以从规范的变革中受益,他(她)也不会选择变革^[15]。

(二)两性既有权力地位的非对称性

从协商制度设计与执行本身观之,并不存在显见的性别歧视现象。对协商主体和协商议题的原则规定,也没有剔除女性协商资格和女性协商议题的明显倾向,而且理应包含其中。但这种看似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实际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女性协商主体和女性议题的双重缺失。从表面上看,制度设计与执行者的性别盲视,可以理解为一种性别无意识或性别敏感度低下,如在泽国镇,发展至今的民主恳谈会,没有一位女村干部参与到具体的民主恳谈会的领导工作中,妇联主席(主任)也只是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民主恳谈会的组织者对两性的参与情况也茫然无知^[16]。但各地普遍存在的,尤其是温岭历经十余年,并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对女性参与协商的主体作用和女性问题作为协商议题的重要意义的忽略,实则刻写着性别歧视的深深烙印。因为长期以来,各个领域的核心权力几乎被男性群体独占,女性只是权力舞台的配角。在广大乡村更是如此。事

实上,从性别视角观之,中国农村至今有两点维系未变:从夫居的父权制和村庄权力的男性绝对主导^[17]。在两性权力的非对称格局下,男性群体有意无意地经常在乡村权力核心的周围筑起排斥女性的藩篱,致使乡村自治中女性参与始终只是一种远离权力核心的外围参与,女性问题也从来不是乡村自治中的重要事务。虽然“弱势群体常常在自身的社会层级中设法寻找能有力地表达他们利益和梦想的作为特定群体的代表”^[18],但缺乏权力的女性群体因缺乏在决策机构中为自己代言者,致使女性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效地融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虽然村民自治在中国已践行30余年,但乡村民间自治团体的力量还相当弱小,为广大农村女性代言的妇女组织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依附于村两委的附属机构。虽然有时也代表女性为她们的利益发出一些声音,但因缺乏和垄断着核心权力的乡村男性精英们形成力量对等的博弈关系,从而对村务决策影响甚微。因此,虽然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群体的利益常常受到损害或被忽视,但因权力地位不对等,缺乏和男性群体博弈的筹码,又不得不接受现有制度。即使她们认识到乡村协商民主实践中协商主体地位和话语权的缺失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害,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变革,导致不利于女性群体的不平等政治关系依然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些有幸从弱势群体进入村治权力领域的女性,由于成为了男权村庄权力结构资源分配的受益者,就很容易在行动和思想上成为男性精英机制的辩护者,也就很少能为女性群体的利益挑战由男性主导的协商民主实践。因此,当两性在乡村权力格局中处于非对等的情况下,受传统性别政治和性别社会分工观念的影响,对女性政治能力低下的固有偏见,使得协商权力配置中的男性偏好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而且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乡村男性精英们具有实现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偏好,也不大可能将稀缺的协商资源向女性倾斜,从而使得协商民主实践中女性主体性缺位、协商代表性别比例失衡及女性议题边缘化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三)男性精英的自利性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实现“男女平等”的呼声很高,但女性的参政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同步提高。现实中,一些部门却往往以女性参政能力不够或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足以让更多女性进入权力领域为由而加以搪塞。因为在今天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性别政治平等虽因国际社会女权运动的影响、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的极力倡扬,及国内一些女性组织如妇联等的大力争取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根本而言,还只是男性统治阶层基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从制度文本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对女性参政一定程度的保护、照顾,并且是以不侵害男性群体核心政治利益为界的。换言之,公共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只能是一种文本上的模糊象征,而不能在现实中过于明朗化。而且法律文本中“男女平等”的原则规定,也不是男女双方之间的契约式的约定,男性统治阶层无需承担违约的责任和成本。再者,政治上性别平等,对于推进我国的经济、民主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又没有可见的参照样本;政治上的性别不平等也没有对我国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权力领域女性参政人数不断增多,则必然会分割男性群体一部分政治资源,而且女性越接近于权力核心领域,对男性的威胁越大。因此,对女性参政一贯持有偏见、为政绩终日忙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级权力部门的男性精英们不可能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把“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这些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关系重大的基本国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而与女性平等共享“权力”这杯羹^[19]。“男女平等因为不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远离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自然因为不重要而被忽视。”^[20]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在关于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中性别盲视或性别敏感度低下也就成为寻常之事了。

而作为处于探索阶段的乡村新生事物的协商民主,对原先就被边缘化或者被排斥在村级权

力结构之外的广大农村妇女来说,被作为协商民主规则章程主要设计者的男性乡村精英们所忽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而且即使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女性平等参与协商民主制定了一些保护性的规章,但各乡村其实都是一些理性的个体,其利益不可能与上级部门完全吻合,何况乡村自治的自由裁量权和弹性空间较大,上级部门又不能过多插手村民自治事务,由此导致在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作用和保护自身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乡村男性精英往往寻找制度软约束的真空,致使跃然纸上的保护女性参与协商民主的一些规章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虚置的象征,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三、实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的策略反思

综上所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性别公正缺失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应融入性别视角,紧扣“明确协商内容、确定协商主体、拓展协商形式、规范协商程序、运用协商成果”这一主题,以实现“三个平等”^②为目标,创新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第一,加强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建立对政策文本内容的性别审读机制,强化地方和基层党委、政府的性别敏感意识和推进性别公正的责任意识,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政策、法规设计理念,明确女性的协商主体权益和女性问题协商的重要性。第二,构建由村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负责、村妇女组织参与的协商代表和议题的性别遴选机制,优化协商代表的性别结构,提升协商议题遴选中的性别意识。第三,构建包容性性别商讨机制,如针对女性议题的专门协商形式的开放、对女性非逻辑性表达和非理性见解的公平对待等,以强化女性代表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对协商成果达成形成有效压力。第四,建立协商成果采纳、落实的性别监督与考评机制,严格协商成果落实程序、明确责任主体、细化考评内容,以杜绝和切断外生性变异机制产生的性别歧视或性别盲视对协商成果落实效度的影响。第五,建立协商民主理念与技能的性别培育机制,以妇联、妇代会和妇女之家等为组织载体,培育和提

升广大农村妇女参与民主协商的意识与能力。这是最终形成一种性别公正的农村社区协商新局面的基本方略。

但根本上而言,必须逐步以先进的性别文化理念取代传统性别政治价值观在各领域的主导地位,改变各层级各部门核心权力结构中的性别失衡,以及有效抑制男性群体的自利行为。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当今中央对解决农村妇女问题的高度关切与地方的积极回应,基层党政解决基层女性问题对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现实需求,处理日益紧迫的农村妇女在反贫困、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婚姻危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对乡村男性精英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农村妇女表达“个人利益”或争取“公共利益”的参与式民主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现有乡村治理中参与主体性别结构失衡的现实挑战,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导致的乡村“男工女耕”使农村妇女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性别优势和治理能力日益凸显等,又说明路虽漫长却值得期待。

注释:

-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1日(02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2/09/c_1114310670_2.htm;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7/22/c_1116010168.htm。
- ② 2013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集体谈话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所要实现的目标表述为:“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三个平等”重要思想。
- ③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各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
- ④ 参见张婧的《性别视角下的民主参与和协商——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卓惠平的《妇女参与社区民主协商的途径、成效和启示——基于青岛市城阳区的调查》,中国妇女报,2016年12月20日B2版。

参考文献:

- [1] 潘锦棠. 男女平等与性别公正[J]. 中国妇运, 2002, (11): 36.
- [2] 余玉花. 追求社会性别公正 破解女性发展困境[J]. 中国妇运, 2013, (4): 22-23.
- [3] 郭夏娟, 张婧. 平等参与条件下的女性政治潜能: 来自民主恳谈会的检验[J]. 浙江学刊, 2010, (2): 191-197.
- [4] 何包钢, 王春光. 中国乡村协商民主: 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 (3): 56-73.
- [5] 靳豆豆. 协商民主与村规民约的制定、修改[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6, (4): 72-75.
- [6] 周仁标. 村民理事会的功能、性质与发展趋向——基于对安徽省全椒县的调查[J]. 行政与法, 2016, (7): 29-35.
- [7] 张露露, 任中平. 村民议事会: 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的实践探索——来自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的调研报告[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103-108.
- [8] 徐满泽. 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以云浮市为例[J]. 南方农村, 2014, (4): 70-73.
- [9] 董馨. 全省首次检察院监督村民议事会[N]. 成都商报, 2010-03-31.
- [10] 洪泽县农村党群议事会章程[EB/OL]. http://cwc.hjz.wscwh.hongze.gov.cn/art/2015/4/3/art_1344_9246.html, 2015-04-03.
- [11] 汪国梁. 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可建村民理事会[N]. 安徽日报, 2017-02-13.
- [12] [美]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 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黄相怀,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02.
- [13] [美]戴维·米勒. 协商民主不利于弱势群体[A]. 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 新的视角[C]. 王英津,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43.
- [14] [美]格雷厄姆·史密斯, 科琳娜·威尔斯. 公民陪审团与协商民主[A]. 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 新的视角[C]. 王英津,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45.
- [15] [美]杰克·奈特, 吉恩·恩斯明格. 变革社会规范中的冲突: 讨价还价、意识形态和执行[A]. 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51.
- [16] 张婧. 性别视角下的民主参与和协商——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53.
- [17] 金一虹. 主体的寻找——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妇女[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3): 9-11.
- [18] [美]埃米·古特曼, 丹尼斯·汤普森. 审议民主意味着什么[A]. 审议民主[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34.
- [19] 李晓广. 中国共产党人女性政治观实践价值的理论辨识[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 115-120.
- [20] 林虹.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施情况的制度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1): 5-13.

Practice of Rura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Justice

LI Xiaogua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leve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effective form of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Howev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justice,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 in rural areas is facing the phenomenon of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 which leads to the questioning of its validity and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t a deeper level, we need to rationally identify the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gender politics, the asymmetry in status of two sexes, the selfishness of male elites, and so on. Then, in practical operation level, we can star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o seek more effective solution.

Key word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gender justice; generation mechanism; rural level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成因分析及正向引导体系构建

贾 琰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目前, 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分析影响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并据此构建正向引导体系, 可以帮助贫困女大学生消除自卑心理、克服自己的弱点, 提高自身素质并树立自信心, 提高成才意识, 增强社会竞争能力, 对创建和谐社会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贫困女大学生; 心理问题; 正向引导; 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34-03

一、影响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分析

(一)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个体对自己以及周围环境的认识, 主要涉及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等问题。一是大部分贫困女大学生步入大学以后, 由于经济上的窘迫, 学习生活遇到挫折时, 会产生自卑情绪, 逐步表现出自我认知不完善, 放大自己的弱势, 对自己评价过低, 对自己不满意, 不能正确地悦纳自己。二是受传统观念和家庭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性别差异偏见意识过于强烈。认为女人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 很多贫困女大学生存在“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错误思想, 导致她们出现认知错误, 只满足于拿到毕业证书, 缺失努力奋

斗的信心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企图逃避各种现实问题, 出现消沉、颓废心态, 或者贪图玩乐, 注重个人打扮, 麻痹自己的心灵, 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从而荒废了自己的学业等。

(二) 情绪问题

贫困女大学生容易产生 4 种情绪问题。一是焦虑。焦虑产生于对事物的强烈的欲望, 期望值异常高, 同时产生担心或者达不到目标的焦躁、疑虑情绪。贫困女大学生往往会与家庭条件好的女大学生进行比较, 产生盲目攀比的心理, 继而导致心理不平衡。成绩平平的贫困女大学生其焦虑主要与考试产生紧张、人际关系紧张、自尊心过强等密切相关。二是抑郁。贫困女大学生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外界物质条件较低给其带来了压力, 生活中往往会遭遇更多挫折, 如果

收稿日期: 2018-01-13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资助经费项目“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支持系统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 J17ZZ71)

作者简介: 贾琰(1982—), 女, 山东女子学院学生工作部(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副教授, 主要从事会计理论、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长期努力得不到回报往往会产生抑郁心态,严重者会导致抑郁症。抑郁症患者通常伴有轻生的念头,最终可能会结束生命。三是恐惧。贫困女大学生长期缺乏勇气和信心,在遇到问题时往往选择退缩,胆怯,不敢与人沟通,回避问题,不敢承担责任。四是自卑。贫困女大学生往往会因为物质条件的匮乏而产生自卑,自卑的人往往情绪低落,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自卑心理还会造成对自己的评价过低,对他人依赖性强,否定自我,排斥自我,成就动机低,这些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幸福和事业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三)心理冲突问题

心理冲突是指贫困女大学生在高校的行为活动中,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反或者相互排斥的动机时产生的矛盾心理。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冲突表现在因为家庭条件贫困而产生的自卑和内心的自强^[1]。另外,贫困女大学生对团队归属感和爱的渴望与长期自我封闭产生矛盾心理。

(四)人际关系问题

贫困产生的人际交往障碍在贫困女大学生身上表现较为突出,相对于其他女生,她们要承受心理上和经济条件限制的双重压力^[2]。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困女大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相对较少,对别人的帮助往往表现出疑心与猜忌,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交恐惧,朋友较少,但是她们内心又比较渴望被人喜欢、被人接纳。长期因自卑封闭自己,过度的孤独和多疑会更加影响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贫困女大学生要树立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在人际交往中确定好自己的方向,保持自己的正向情绪,克服自卑、自我过度防卫、盲目攀比的心理特点,逐步培养自己热情开朗的性格。

(五)生活学习中的问题

贫困女大学生本身自我满意度比较低^[3]。多数贫困女大学生来自边远地区或城镇下岗职工家庭,目睹家长节衣缩食供其生活读书的现状,往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想通过在大学期间提高学习成绩、获得各种奖项等满足家人的愿望,但当评奖评优目标没有实现或者在校出现了

违纪处分,重要人际关系出现危机时,会出现明显的心理不适,导致心理障碍,这不仅仅会影响她们的生活和学习,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今后的人生。

(六)就业压力问题

长期以来,社会对女大学生就业存在性别偏见。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推行了“自主就业,双向选择”政策,再加上各种因素影响带来的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明显,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家庭经济困难的女大学生会因为没有所谓的“关系”“熟人”产生巨大的就业压力。在实习、择业、就业期间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异常脆弱,承受能力往往会左右她们的价值取向和进取精神。作为高校工作人员,应遵循贫困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她们入校后就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使其真正做到心中有目标,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帮助她们消除自卑心理、克服弱点。

二、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引导体系构建

(一)外部支持系统体系的构建

高校要建立专门的贫困女大学生就业指导系统^[4]。构建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将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贫困女大学生择业、就业教育的内容有机融合。为不断增强贫困女大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可为贫困女大学生创建带薪实践、带薪实习的就业实习新模式,帮助她们在完成实践、实习任务的同时,获得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解决她们生活的难题。在校内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发挥专业特长进行自主创业,其中贫困女大学生申请项目在同等情况下可享有优先权。拓宽贫困女大学生就业思路,开设具有女性特色的就业指导课程,例如开设茶艺课、甜点制作、插花艺术等就业实践课程,提高贫困女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鼓励她们积极创业。邀请校外就业指导专家入校指导,帮助贫困女大学生调适择业心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举办专场招聘会,根据国家政策,建立就业

帮扶机制,积极推荐贫困女大学生就业,给予她们更多的帮助和关心。构建学校层面的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保证机制。高校要确保有领导分管、成立专门的针对贫困女生的心理健康咨询基地、优质心理健康辅导师资队伍、有心理咨询场地和专项资金保障的工作格局,为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强有力的全方位支持。

(二)内部支持系统体系的构建

女性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通常面临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和困难,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女大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和虚荣心理,不愿意公开自己家庭真实的经济情况,并且心理素质欠佳。需要高校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尤其需要构建富有女性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预机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对“心理脆弱、个性偏执、经济贫困”的三类学生家庭走访,全面准确地摸排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帮助她们排解各种心理问题。在入学之初进行一些心理量表的测试,利用心理健康专业软件进行心理普查,建立完善的心理档案,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学生及时掌握,实时跟踪,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治。注重师生情感的互动,

用真实感情去感染学生,通过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会学生自我克制,自我消化不良的心理情绪。在入学教育初期,对新生的人际关系处理,大学生活的适应等方面进行引导,对于高年级的学生,用成功女性的典范,引导和感染她们,帮助她们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信心。

综上所述,如果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外部支持系统和内部支持系统做到无缝对接,会产生 $1+1>2$ 的效果。我们应继续努力以形成社会、家庭、高校强大合力,努力形成对贫困女大学生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心理健康正向支持引导系统。

参考文献:

- [1] 姬咏华,杜咏梅.贫困女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探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35(7):152-154.
- [2] 谢秀美.女校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初探——以湖南女子学院为例[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4):81-83.
- [3] 余秀华,徐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冲突问题浅议[J].教育探索,2008,(10):128-129.
- [4] 刘蒨斐.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探讨[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30-131.

On the Causes of Po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Proble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sitive Guidance System

JIA Ya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all class circle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women, especially those in poverty.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female students in poverty, and puts forward a positive guidance system for these problems. The aim is to guide po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o guard against a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caused by poverty, and to help them to eliminate their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to overcome their own weakness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is to guide them to make clear their goal orientation, improve their ability and build self-confidence, improve their talent awareness and enhance their social competitiveness. It is of immense importanc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po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o probe into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po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problems; positive guidanc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责任编辑 王 灵)

· 妇女史研究 ·

山东省妇女团体志的编写与妇女理论研究

——以 1995 ~ 2005 年《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为例^①

田梅英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1995 ~ 2005 年《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编纂对妇女理论尤其是山东妇女理论的研究大有裨益, 可以为妇女理论研究提供原创性文化资源和鲜活的研究内容, 历练妇女理论研究的队伍, 推动乡土妇女理论研究的开展。我们要充分发挥妇女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为和谐山东建设与山东女性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关键词:山东省妇女团体志; 妇女理论研究; 山东妇女

中图分类号:D4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37-04

2015 年, 山东省妇联启动 1995 ~ 2005 年《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编写, 新妇女志又称为“二轮志”, 面对改革开放全新时代, 顺应历史潮流, 科学地记述十年间山东女性的发展与进步, 是新志书的使命和根本任务。新妇女志书编写对妇女理论研究大有裨益, 现就此问题作一简单思考, 以就正于同仁与广大妇女工作者。

一、为妇女理论研究提供原创性文化资源

世上凡是独立存在的事物, 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同时也都作为系统的事物而存在。如果我们以发展过程来记述, 那就是史, 成书就是史书; 如果以事物存在的角度去记, 那便是志, 成书就是志书。凡是能成史的就一定能撰写志, 有世界史, 就有世界志, 有地方史就会有地方志, 有山东省妇女史, 就会有山东省妇女志。志, 记也。宋代郑兴裔(宋元进士, 庐州及扬州太守, 曾先后

主修《合肥志》与《广陵志》), 认为志书有“资政、教化、存史”^②作用, 后人对志书的作用大多沿用郑兴裔的说法, 只是各有所侧。按一定的体例、体裁和独特的文字表达方式, 把某个地方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的信息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科学性的记录, 是为志。本轮《山东省志·妇女团体志》, 上接 1991 ~ 1994 年首轮志, 从山东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 实事求是地记述 1995 ~ 2005 年十年山东妇女运动发展的状况, 集中反映山东妇女在党的领导下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成就, 属山东省总志下的妇女团体志部分, 独立成书。存史是志书基本的功能,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大量、全面、准确、典型而系统的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志书质量的首要保障, 认真核实、修改、补充, 决不能因资料的硬伤而影响志书的质量,

收稿日期: 2018-01-05

作者简介: 田梅英(1963—), 女, 山东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儒家文化与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也不能因资料的缺失而影响志书的整体结构,乃志书编写的首要原则。本轮妇女志采用篇章结构,篇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篇内事以类从,横排纵述,全志由概述、专志、大事年表、附录等组成,记述山东妇女界的大事、首事、要事,共有概述、八篇、附录等10部分,主要材料源于3万余份原始档案材料,另有文献资料如大事记、年鉴,信息简报、报刊资料及市地提供的相关资料等。写作参阅山东省工会组织志、山东省农业志、广东省妇女志、四川省妇女志等相关的志书。真实性为志书之魂,任何的虚构、错讹和想当然都不能出现在志书中,所有记述均须有据可考、有稽可查,真切无疑。严格按照志书的规范和写作要求编纂,坚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客观公正,确保记述的真实无误;对考正不清,资料缺乏的人或事,本着宁舍勿取、宁缺勿错的原则处理,确保资料选取和运用的真实;所用数字多出自原始统计数字,一目了然。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将大量确凿无疑的信息囊括其中。初稿完成后,几经修改,将征求意见稿交由妇联、史志办及各市妇联对所熟悉或经历的部分进行重点审阅和修改,往返数次,以最严谨的态度和最大的努力保证志书的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志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的文化事业,“地近易核,时近易真”,“志书有微型档案库之便,一册在手有省时致用之功”,妇女志无疑为妇女理论研究和学科研究提供了原创性的文化资料,可以成为当代妇女理论研究者直接征引的依据。

二、为妇女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研究内容

妇女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妇女事业发展中起着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其最深厚的源泉和最强大的动力,是广大妇女群众的社会实践。1995~2005十年间,党和政府重视妇女事业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把妇女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全省在县级以上政府均颁布实施《妇女发展纲要》,建立完善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制定落实一系列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发展纲要》等保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规定得到进一步贯

彻落实,山东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提高、参与决策与管理的队伍壮大、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妇女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妇女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妇女工作在探索中前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农村,各级妇联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大力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开展科技培训、服务、示范“三大网络”建设,帮助农村妇女实现增收致富。在城镇,围绕扩大就业和发展服务业,积极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各级妇联创办一大批“爱心大姐”“阳光大姐”等社区服务实体,一大批妇女实现了就业再就业,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围绕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积极开展“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激励广大女职工立足岗位建功成才。围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美在家庭”创建和“巾帼文明队”建设活动,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在活动中,各级妇女组织创造出许多有影响的品牌项目,如“三大网络”建设、“大姐”家政服务、“巾帼文明队”建设和“美在家庭”创建等,在山东和全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妇女运动谱写了新的篇章。十年虽短,但却是齐鲁女性奋斗的长歌和发展的史诗,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山东女性的现状特点及其成因是什么?这种现状的形成经过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每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发生?隐藏于其后的原因和规律是什么?又会对未来女性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丰富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把理论创新与妇女运动的实践有机结合,尊重妇女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利益,把广大妇女群众鲜活的实践纳入研究视域,概括与升华、探讨与研究,得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系统性的结论,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推动妇女理论成果的运用、普及与深入发展,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富含前瞻性的科学依据,此乃妇女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妇女自身素质的制约,前进中仍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尚未能完全实现,女性参政比例仍然偏低,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程度尚还欠缺,妇女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妇女整体素质水平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仍不相适应,妇联自身的建设还落后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等,影响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还

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妇女就业再就业难度大;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在一些地方还得不到落实;妇女“四期”劳动保护在有些民营企业没有落实;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工作进展不平衡;婚前医学检查率比1995年下滑;性病、艾滋病的蔓延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隐患;部分乡镇卫生院产科设施比较落后,农村医疗水平较低,制约农村妇女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等。推本求原,“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③。这些不足给我们启迪和教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妇女运动中的重点和难点也将是我们妇女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国情、省情和山东妇女的需要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找出根由,寻求解决之道,体现妇女理论研究服务大局、服务实践、服务妇女和面向未来的宗旨,此正是妇女理论研究成果更多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妇女理论研究者责任和使命。同时妇女群众的实践还可以检验、审视妇女理论的不足,对研究中有争议、有误差、有疑点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事例、史例推理论证。从这一点上说,修志是一项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系统工程,是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子孙探路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

三、历练妇女理论研究的队伍

隔代为史,当代为志。一人成史,众手成志。志有主编,却离不开众人辅佐与团队的支撑,志里面凝聚着众人的智慧和奉献。妇女团体志从确定体例、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拟定志稿、总纂定稿、反复打磨、分纂合成到付梓成书,凝结了省地市50多个部门的专家、学者、妇女工作者、退休老干部及相关人员150余人的辛勤汗水。编纂的过程就是相互帮扶和沟通协调的过程。在资料征集阶段,有的地市妇联因机构改革而合并重组,一时无人提供资料;有些忙于其他事务而未能及时交稿;或上交的资料与征集要求不符合,如时间断限不明确,资料缺失等。为此,一方面取得地市妇联组织的理解,使其积极配合资料征集工作;同时对所提交资料多次反复,求证筛选,直到合乎要求为止。只有协调处理好每一阶段的人际关系,众志成城,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修

志创造有利条件,顺利地完成任务。修志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需要吃苦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在修志过程中,资料收集是最基础最烦琐也是最辛苦的工作,资料的鉴别和考证都需要踏踏实实、反复求证,且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疏误都可能成为志书质量的硬伤。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在赋予修志人荣誉感和自豪感的同时,更要求修志人有强烈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修志是文化苦旅,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特性决定了志书从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工作程序、语言文字表达等,均有别于其他作品、书籍的创作和编辑。志书要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完整、记述得体、资料翔实、行文规范、装帧精美,而每一篇每一章至每一节还应达到体例结构的科学而规范,做到严守志界、横排竖写、述而不论、图表相宜;框架篇目要分类科学、归属得当、排列有序、特色鲜明、标题严谨;记述内容要全面、系统、完整,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详略有致、个性突出,同时要消除抵牾,不能存有“矛盾”;入志资料要全面系统、真实准确、权威科学;语言表述要严谨、朴实、简洁、规范。宏观和微观的记述,突显时代特征、地方特色、专业特点,交叉和重复问题的处理,以及以事系人、图表入志等,均需要所有参与者不断的研讨、交流和协作,故编修人员要有专业素养和对整体工作驱架平衡把握的能力,这对修志人尤其是初涉修志工作的人来说,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所以需要极强的学习意识和能力。编纂过程中,常有陌生的专业名词,如“四大企业”。从陌生到大体熟悉,从对山东妇女运动的模糊到逐步了解,其间就是一个边修边学的过程,而这个团队所具有的品质、精神、专业素养及对妇女工作的关注与关怀,正是妇女理论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培养了这一团队敏锐的妇女理论研究意识。

四、推动乡土妇女理论研究的开展

盛世兴文,乱世兴武。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传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宗教文化与妇女,先进性别文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等一直为妇女理论所关注。《山东

省志·妇女团体志》是山东妇女情况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改革开放、走强国富民之路历史画卷的一个侧面。从妇女史学科的角度看,十年山东妇女的发展与山东妇女史同步,妇女志的编纂,是对山东妇女史的重要补充和延续,立足山东妇女实际,使妇女理论研究本土化。山东是孔孟之乡,老革命根据地。而今,作为沿海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山东妇女地位状况在全国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历史上的山东女性多贤妻良母,社稷情怀与忠诚的品格一脉相传;在民族解放与现代化建设中,山东女性将自己的命运寓于国家和民族解放与发展的洪流之中,听从党的召唤,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不移,始终高举集体主义的旗帜,舍小家顾大家,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听从党的召唤,为民族解放和山东的发展竭尽全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山东女性秉持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再立新功,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倍出,其所体现的诚信奉献、自主创新、独立进取的新道德、新风貌,释放出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凸显齐鲁文化深厚的底蕴和软实力以及发展先进性别文化的决心和信心,是在当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最现实、生动、亲切和富有说服力的乡土文化教材,引领更多的女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鉴往知来,刻苦学

习,勤奋工作,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透过山东妇女的发展与奋斗,由热爱故土开始,到对故土的认识与认同,升华为对祖国爱护、改造和发展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并身体力行,这不仅体现出乡土文化教育的真正内涵,也是我们苦心孤诣编纂妇女志的真实目的之所在。

志书乃是有思想的学术,“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士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②,妇女志的编纂对妇女理论研究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上述只是其中的一些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妇女志在妇女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应该认真加强研究,使妇女志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为和谐山东建设与山东女性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

注释:

- ① 本文为山东女子学院校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② 参见[宋]郑兴裔的《广陵志序》,《郑忠肃奏议遗集》《四库全书》本。
- ③ 参见[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6页。

The Compilation of Women’s Group and Women’s Study in Shandong: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ial Chronicles: Women’s Group Chronicles in 1995 ~ 2005

TIAN Meiya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ial Chronicles: Women’s Group Chronicles from 1995 to 2005* benefits women’s study especially the women’s study in Shandong. It provides vivid research content and original cultural resources for women’s study. It also refines teams of women’s study and promote the work of rural women’s stud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women’s Chronicle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ill serve th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women in Shandong.

Key words: women’s group chronicles in Shandong; women’s study; women in Shandong

(责任编辑 王 灵)

近代苏州乡村女性的兼业

陈艳君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蚌埠 233041;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对在民国时期江南乡村女性兼业中具有典型性的苏州轿妇进行考察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近代江南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苏州乡村女性在田间劳作之余的兼业范围有较大的改变,她们从事各种零碎的兼业,虽然收入微薄,却是家庭生计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支柱,然而,她们的家庭贡献与家庭地位是极不对等的。民国时期的苏州轿妇既是苏州风土志中的一个奇迹,也是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占相当地位且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乡村女性;兼业;民国时期;苏州轿妇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41-05

学术界对近代江南乡村女性的职业和生活情况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①,而民国时期苏州乡村女性的兼业,尤其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苏州轿妇,还没有充分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本文在广泛收集留存的贫乏史料基础上,以近代江南社会转型为研究视角,从民国苏州乡村女性的兼业背景、兼业类型和特点及在家庭生计中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考察民国苏州乡村女性的生活图景。

一、近代社会转型与苏州乡村女性兼业的变化

中国传统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导致小农占有耕地的缺乏和普遍贫困化,小农生产的特性和贫困化压力迫使农民必须寻求副业才能维持生存,兼营各类副业成为他们谋生的天然出路,几乎所有的小农户家庭都紧紧抓住兼业这一谋生手段,进行一些“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禀赋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种兼业既可以在农户

住所中,也可以外出兼职,或者是从事小商小贩等。农户的兼业几乎伴随小农经济存在的始终,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和发展相互影响。

在近代以前,江南乡村女性的兼业主要是从事丝棉纺织业,杭嘉湖宁绍以及苏锡乡村地区以丝织业为主,苏松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很明显,这种职业分工“是与地区经济作物类型相联系的。”^[2]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冲击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近代化因素不断被引入江南社会,近代工业和交通的兴起,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江南社会转型日益深入,对乡村女性的兼业既形成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

首先,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和江南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冲击了乡村家庭手工业,改变了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生存环境。由于产品价格、质量等竞争不过机制品,传统家庭手工业遭到排

挤,尤其是纺纱业及手工缫丝业衰落较为明显,逐渐被排挤出市场,被机制品所代替。织布业亦发展艰难,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作为江南乡村女性传统兼业重要内容的丝棉纺织业,“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3]。“家家都把布机、纺车停止起来,藏到灰尘堆里去了”,所以,大部分女子“都抛下梭子,去做‘男人家’的事,即作长工,当‘脚色’,而男人们的劳力反而渐感多余无用起来。”^[4]尤其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向中国倾销过剩的工农业产品,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而江南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较之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密切。此外,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动荡,江南乡村经济日趋萧条,农民收入不断减少,入不敷出,农村经济日益破产。而苛捐杂税繁重,各种支出又增多,农民负担加重,在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压力下,苏州乡村女性也不得不为家庭生计奔波劳作。作为小农家庭重要的辅助性谋生手段,乡村女性的兼业必然出现此消彼长的发展。

其次,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既给乡村女性兼业带来了复杂冲击,同时,近代社会转型也为苏州乡村女性兼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代化带来了交通和生活方式的显著变化。随着更方便的新式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轮船的通达,江南城镇的外来旅游者越来越多。苏州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苏州北依长江,西抱太湖,依江濒湖,河网如织,四通八达,又有大运河之便,地理位置优越。加之《马关条约》签订后,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及作为上海的外围地区,深受上海核心区的辐射,加快了社会近代转型的进程。苏州历史悠久,名胜古迹颇多。“盖苏垣筑自吴王阖闾,阅时千百载,城郭依旧,然丘陵犹昔。湖山之胜,风物之美,既甲于吴,亦轶于浙。用是每逢春秋佳日,山塘七里,游人如织;而四方人士之来游天平、穹窿、灵岩诸胜者,寻幽探奇,踵趾相接”^[5]。民国时期的苏州,开始把旅游业“作为当地发展的一条主导性道路,吸引了很多城乡治游者们的目光。”^[6]旅游业在客观上为广大苏州乡村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家庭外的就业机会,她们兼业与获取收入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民

国时期“在他处所不易经见”的甚至被视为奇风异俗的苏州轿妇,便是苏州天平山下附近乡村女性兼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苏州轿妇的肩扛生活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去苏州天平山旅游的好时节,游人“终日不断于送”。天平山在苏州西南方向,从阊门雇船到枫桥乡登岸,再有六七里路程即可抵达,但由于这段路程车马不能通行,需要走路,或者乘坐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椅轿。因此,游人都会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有很多女轿夫。每每船还没有到天平山脚下,在路边等着的轿妇就会跟着船在岸上跑着说价钱。她们一看见船在石桥边靠岸,就飞快跑向岸边,用吴依口音抢着说:“轿子要吧?坐轿子上山去吧!”^[7]如果有不坐者,她们必定尾随其后,喋喋不休,并告客曰:“奴既不男人。苦恼。坐子去罢……”^[8]她们轻巧而熟练地扛着椅轿,在沿途不停地向上山的游客争揽生意。

那些特殊的轿子其实只是用一张竹椅子装上两根竹杆,周围并没有围障,加上乘客的重量,都在一二百斤之间。都说“苏州女儿嫩如水”,而苏州天平山附近的那些轿妇,她们大多从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练习抬轿子,起初开始抬轿子的年轻女子,一般多选择比较瘦小的女乘客,或是小孩子,等到慢慢地有了经验,体力也增加了,她们一天便可以多抬几趟,也不再挑选游客,只要是肯出钱的,她们都争相接揽。她们的皮肤都粗糙枯黄,腿和手臂都很壮硕,衬托着宽阔的肩膀和臀部,已经丝毫没有了人们想像中的苏州女人的柔弱风度。

如果价钱说好了,客人坐上去,她们抬着轿子就走,如果客人太重,便由三个女人轮换着抬。她们抬轿的本领非常不错,即使肩头负荷着上百斤的重担,上山下山,在曲折的山路上亦如履平地。1934年8月11日《申报》上的一篇游记生动地描绘了苏州天平山下轿妇抬轿时的情景:上山的时候一共雇了4顶轿子。抬轿的人中女子占了6个,“伊们是一样的壮健,……其余的二位男子汉,却是一对烟霞城中的俘虏。憔悴,瘦弱,猥缩”。由他们的言谈和称呼中得知,两个烟鬼竟

然是其中两个少妇的丈夫。翻过两个山头,走了大概十多里路,“一对烟鬼,当然是全不中用,累得要命。可是6个妇女,却始终健步如飞。但大汗也已似潮水一般从额上滚到嘴边,湿透了颈背,渗入了衣裤,全身如洗了个澡,热气蓬勃地发散着。伊们立刻把外衣脱去,只留着一件短小的衬衫,丰满的乳峰,抖抖地似乎要跳出衬衫外面来了……”^[7]这是一种艰苦的体力劳动,她们往往以停下让乘客看风景为借口休息一会。1946年5月23日《申报》上的一篇游记便记载了游客的体会:久闻苏州轿妇抬起轿子来健步如飞,而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却并不尽然,“我注意到前面的那一个,尽是把轿杆在肩膀上移动着。她将轿杆斜放在两肩上面(或者不如说她扭转了肩膀承着那坚硬的轿杆),所以老是有点歪来歪去”,她们抬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停下了。问她们为什么停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看景致呀”,我听见别人的轿夫也是这么被她们放下来了。于是我们茫然地看了一会景致,然后又坐上轿去^[8]。

由于春秋两季正是农闲时期,轿妇们抬山轿可以挣得一笔不错的收入。尤其是每到星期日,城里的人出外休闲旅游,便是轿妇挣钱的大好机会。力量大的轿妇一天可以抬三四趟,力气最弱的一天也可以抬两趟。最初要价仅一元半元而已,然而“迨至半山,则又索点心钱。及归,再索不已。客悯其苦。慨然与之”^[9]。但因为常年战乱、灾荒等导致经济萧条,大部分游客都不大肯坐轿,往往一整天没挣到钱的轿妇也很多,她们空等乘客的焦虑,自然也都是可以想得到的。《申报》上曾记载了1946年苏州轿妇的收入:由于“抗战以来当推今年的游客为最盛”,她们平均每天约有15000至16000元收入,如果雨水不多,天气好,“就能扯到两三万了”^[10]。

三、家庭贡献与家庭地位的不对等

苏州天平山轿妇的本职工作是耕田,是像别的地方的男子那样下田工作。“在那田间,有点点的青布头巾一起一伏,这是农妇在播种,一撮撮的豆或是一撮撮的麦,从她们手中点入土中,埋伏着未来的萌芽,而为人类的养料所仰给。”^[11]即使下雨了,雨水打湿了她们的衣服和

身体,她们也依然继续在雨中劳作。秋收打稻的工作,也全是由妇女完成。但是天平山附近多山,土地生产力薄弱,游人多的春秋二季,抬山轿,就逐渐成了她们的一个兼业。虽然辛苦,至少终有几毛钱可挣。

除了抬山轿的兼业外,苏州轿妇还有一些零碎的兼业,例如纺织、刺绣、砍柴和织草鞋等等,有的就在山脚下摆一个小摊,货品有她们用树枝砍成的手杖、水果、糕饼、汽水和香烟,这是“她们倾销自己的土产,招揽顾客的必需品”^[12]。刺绣的兼业,是她们世传的技艺。上海畅销的顾绣,实际上全是出自她们之手。顾绣庄派跑街下乡,把工作交给她们,再约定时间来取。但是工资很低,一天只有二三百钱。所以天平山的游客会见到那些等活的轿妇,她们身旁都架放着绣花的绷子,没有游客或者价钱谈不好,她们就坐在那里刺绣,可谓粗活细活样样拿手。她们唯一的目的,“便是用劳力换取‘老爷’‘太太’‘先生’‘小姐’荷包里的金钱以补生活之不足”^[13]。

那么,天平山附近的男人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除了种些山田之外,以打猎为副业,……他们把打猎换回的金钱,“除了捐外,便在‘太白遗风’的小酒店里消磨整年的傍晚,晚上呢?给卅二张骨牌迷住了心”^[12]。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出去工作,很多人都有烟瘾、嗜好红丸,要么就是泡在茶馆里。他们能找到的工作就是为人开山搬石头,而开山搬石头的男人,更是没有一个不吃鸦片或吞红丸的,他们的工资是三天一元钱,可是一元钱只够他们在鸦片或吞红丸方面消费两天。因此,“不仅他们衣食住的费用,要逼迫着妻子们做牛做马来供给,便是他们的鸦片烟,也要熬煎着妻子们的血汗来吞吸”。而在苏州的这些旅游名山附近的村落中,营业特别兴旺的便是酒馆、茶馆以及烟馆等场所。“年青的汉子们,尽有整天的盘桓在内的。高兴时,还可畅快地赌一阵子。这么着消耗掉的金钱,却都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换来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向出卖着劳力的妻子们,所压榨得来的。自然,家中的开门七件事,不用说得,是完全由妻子们维持着的。”^[13]

苏州轿妇的劳动对家庭生计的维持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她们在家中的权利与此却是极不相称的。她们的丈夫“毫无羞愧地从勤苦的女人手中不劳而得来钱,养活自己,而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一点不知俭省,一味纵任着自己的劣性情,吃喝呀,嫖赌呀,任所欲为,假使赌输了,或受了外边的气,回家还找寻老婆出怨,不是打就是骂,做女人的,总是忍受,除了自叹命苦之外,是不加以些微反抗。她们虽是粗糙女子,但因为出身良家,对于服从丈夫的传统观念,不敢也绝没有存心去破坏它”^[14]。

四、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

外界的变化对近代苏州乡村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她们并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将商品经济的浪潮拒于千里之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传统农业以外拓展新的就业渠道。苏州轿妇兼业的发展是近代社会转型引发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她们的兼业具有多样性、重要性的特点。她们对家庭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保障了家庭的基本生计需要。都说苏州人是享乐的,苏州女人是娇生惯养的,可苏州天平山附近的乡村女性几乎比任何地方都劳苦,为了养家,她们总是不停息地出卖着自己的劳动,贴补一年的家用,难有片刻清闲。

近代社会转型对妇女地位的变迁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妇女就业“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15],为妇女地位的变迁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苏州轿妇无疑应该享有平等权,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由形式上瞧来,这种出卖劳力而维持丈夫吃喝的妻子,不啻是丈夫们的奴隶”,但是事实上呢,“丈夫们由妻子们供应着吃喝,那分明妻子们,应处于主人的地位。但是相互着的主子奴才,却大家能相安无事,而且能颇有历史的维持着这么个制度,这真不能不说是苏州风土志中的一个奇迹。”^[13]

这种畸形的家庭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影响下,我国传统法律没有赋予女性财产继承权,宋元明清时期,女儿在分家制度中的权利也仅限于“在成长时受抚养

和出嫁时得到一份嫁妆”^[16],确切说是赐予,而不是女性的法定权利。“非其父母特别给予,不许在遗产上主张任何权利”^[17]。在婚姻家庭中,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父为女纲、夫为妻纲、子为母纲对应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下,出于反封建的需要,提倡遗嘱自由,但是男女继承权仍然不平等。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推动妇女界不断进行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法律权利的斗争。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了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积极贯彻这一主张。但只是部分承认了女子的继承权,仍然排斥已婚妇女的财产继承权,以财产论“应指未出嫁女子与男子同一继承权”^[18]。至1930年,才正式确认女子的继承权,规定配偶与子女一样有继承权,同时也承认“女子对个人财产有完全处分权”^[19]。尽管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女子的继承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财产继承权并没有获得良好的保障。

尽管近代乡村女性通过各种兼业途径,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甚至整个家庭生活依赖她们的收入贴补才得以维系。但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土地才是家庭的主要财产,而土地是按照男系原则传递的,由于女性没有土地的继承权,经济地位也就没有保障。因此在家庭地位方面,没有土地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丈夫相提并论。她们“一方面是生育孩子,一方面是担任烹饪针线等家里的杂务”,此外,“还要下田,(负责)晒谷子,喂猪等较轻的农作”^[20]。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要求她们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只是孝女、贤妻、良母以及顺妇,甚至是成为节妇。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是和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下的经济地位相统一的,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乡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仍然是相当困难的。苏州乡村女性竭力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冲击,为家庭生计艰难而坚韧地奔波劳作,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破除封建旧习,提升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 ① 主要成果有:小田《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近代变动》,《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小田《论近代性江南村落女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王庆国《以竹枝词为视角看近世以来江南乡村妇女生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小田《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王亚娟.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兼业化行为趋向的效率分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J].人文杂志,2002,(1):65-70.
- [2] 小田.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近代变动[J].历史档案,2001,(3):107-113.
-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165.
- [4] 陈凡.宝山农村的副业[J].东方杂志,1935,(18):104-106.
- [5] 陆璣卿,颜大圭.旅苏必读:首集[Z].吴县市乡公报社,1922.16.
- [6] 冯贤亮,林涓.民国江南城镇的现代化变革与生活质量[J].学术月刊,2012,(10):146-154.
- [7] 朱维明.苏州天平山下的抬轿妇女[N].申报,

1934-08-11(15).

- [8] 蔡钧徒.苏行拾趣[N].申报,1929-05-03(21).
- [9] 钱公侠.苏州的女轿夫[J].杂志,1944,(6):46-47.
- [10] 君宜.苏州的女轿夫[N].申报,1946-05-23(8).
- [11] 孟晖.苏州散记——农业都市的剪影[J].民间,1936,(2):18-20.
- [12] 沈右铭.山游拾得[J].十日谈,1934,(29):187-189.
- [13] 周贤.苏州的女轿夫[N].申报,1936-04-11(14).
- [14] 江鸟.苏州天平山的女轿夫[J].妇女杂志,1941,(4-5):28-30.
- [15] 王纪芒.女性的角色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3):14-17.
- [16]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33.
- [17] 郑全红.民国时期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思潮与观念变迁[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1):45-50.
- [18] 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57.
- [19] 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58.
- [20] 费孝通.禄村农田[A].费孝通文集:第二卷[C].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360.

Sidelines of Rural Females of Suzhou in Modern China

CHEN Yanju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ethods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the article carries on a gener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female bearers in Suzhou, which is typical as a sideline of rural females in the Suzhou Delta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females in this area have a wide range of sidelines. They engaged in various poorly paid sidelines. Although the income is low, they are the major pillar of their family livelihood. However,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ir family and their family status are out of proportion. Female bearers in Su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 are not only a miracle in Suzhou's custom, but also a problem worth concerning in the history of women's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females; sidelines;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China; female bearers in Suzhou

(责任编辑 王 灵)

· 妇女史研究 ·

明清时期《女论语》版本考述

王丹妮, 李志生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作为《女四书》中的一部,《女论语》在明清时期的流传甚广,影响巨大。目前传世的数十种《女论语》,均为明清刻本。这些刻本可分为《名媛玑囊》本、重编《说郛》本和《女四书集注》本等三个系统。年代最早者,保存在明万历年间所刻《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玑囊》首卷。重编《说郛》本为明末坊间之作,而非陶宗仪《说郛》原本;《绿窗女史》本与重编《说郛》本实为同一书版的前后印本。《女四书集注》本中,年代最早者为清初奎壁斋本,清末诸多《女四书》本的祖本是崇德书院《校订女四书笺注》。《状元阁女四书》则是流传最广、翻刻重刻次数最多的版本。

关键词:《女论语》;版本;《名媛玑囊》;重编《说郛》;《绿窗女史》;《女四书集注》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46-10

《女论语》是一部出现于晚唐的女教书,最早见于五代成书的《旧唐书》^[1],北宋时编修的《新唐书》也载有此书^[2]。但在宋元时期,其书的刊印和流传总体不明,诸家书目中也鲜有踪迹,唯《玉海》和《通志》两书有所著录,但袭用的仍是两《唐书》的内容^①。今见《女论语》皆为明清刻本,作者通常署名宋若昭或宋尚宫,凡十二章,使用四字韵文,其篇数、体例、作者与史传、宋若昭墓志^[3]的记载均互有出入。因此,今见《女论语》是否为宋氏姐妹原作、原作如何流传,就成为了存在争议且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研究者探讨的热点^②。

本文暂且搁下《女论语》作者与内容的讨论与争议,而关注《女论语》产生巨大影响的明清时期。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以后,《女论语》成为了

《女四书》中的一部,“这部《女四书》不胫而走地传遍了妆楼绣阁”^[4],其影响之巨、范围之广,足应使我们对它更为重视、对它的刊刻与流传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就将考察明清时期《女论语》的版本情况,以期缕析出这一时期《女论语》流传的脉络。

笔者收集并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等处收藏的《女论语》,所见版本共计25种。所见虽仍不够博洽,但已大略涵盖了各类重要版本。

一、《名媛玑囊》本

今见刊刻年代最早的《女论语》,收录于明人池上客所编女子诗歌总集《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玑囊》中。此书(以下简称“国图本《名媛玑

收稿日期:2018-01-11

作者简介:王丹妮(1993—),女,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李志生(1962—),女,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妇女史、唐代社会史研究。

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共五卷,刻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书编选上古至明代女子的诗歌佳作,首卷为《女论语》。

国图本《名媛玃囊》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版心处刻“名媛玃囊”四字,中部刻各卷内容,首卷《女论语》版心有缺失,刻“论□□卷”,根据第一至四卷版心之“忠集”“孝集”“廉集”“节集”,首卷版心或为“论语首卷”四字。近一半的书页版心下方有“宗文书堂”四字,有些则无。小序首页、全书末页有“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印,首卷首页有“叶国”白方印,小序首页、卷一首页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长方印,全书末页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末页牌记云:“万历乙未年孟冬月书林郑氏云竹绣梓。”首卷《女论语》仅存第一至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前两行,至“子侄团圆”四字,凡七页。第十一章“子侄团圆”之后的内容及第十二章——即第八页至首卷终,皆不存。

是书原为郑振铎藏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的藏书悉数捐献给国家,继由北京图书馆收藏。随后,北京图书馆在郑振铎原有藏书目的基础上,整理、考察全部藏书,编定《西谛书目》。其中有关《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玃囊》的著录^[5]十分简略,没有超出牌记所提供的信息范围。日本内阁文库另藏有两种《名媛玃囊》,其中之一与国图所藏相同,题名《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玃囊》,记为明万历二十三年郑云竹刊本。另一本题名《名媛玃囊》,记为明代宗文书堂刻本^③。高彦颐曾参阅两书,称宗文书堂本《名媛玃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而万历二十三年刻本的印刷质量要优于万历二十年刻本;又言“因装订有误,《女论语》的第7~9章从前一个版本(指1592年版)中消失;第10~12章则与第9章的最后一行混在了一起,并且,它们又在后一个版本(指1595年版)中消失”^{[6](P321)}。宗文书堂为元代郑天泽所设书坊,递经元明两代,刻书甚多。万历年间,郑氏后人郑云竹主持宗文书堂的刊刻事业,《名媛玃囊》便是众多付梓书籍中的一部。

国图本《名媛玃囊》中的《女论语》内容并不完整,不过,据高彦颐的描述,内阁文库藏万历二

十三年刻本中,第10~12章的内容与第9章最后一行混在一起,这一部分内容中,恰恰包含了国图本缺失的部分。也即是说,《名媛玃囊》本《女论语》的内容,能够使用国图本和内阁文库藏本配补完整。

《女论语》为何被置于列女诗选之前,编者池上客并未明言,也难有其他线索可寻。但在宋元以来的社会观念中,诗歌不利于女德的培养,因而女性读诗、作诗并不会得到特别的赞赏和鼓励,司马光即言:“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7]不过,历朝历代仍有许多诗词佳作出自女子之手,好事之人在欣赏之余,将其汇编成集,付梓刊印。池上客认为此种限制女子读诗、作诗的“贞教”未免过于严苛,他在序中即言道:

悛者乃谓朱紫并陈,雅郑兼收,用以忘倦则可,非所以训也。嗟嗟,阿谷援琴,东山携麈,迄今以为美谈,而赋闲情、传孽嬖,宁以诲淫也,亦宣尼氏不删郑卫意耳。何必斤斤程度,尺寸不踰,乃称贞教哉^[8]!

这说明了他选编《名媛玃囊》时,人们对于女子读诗、作诗仍持否定态度。既不能恣意赞赏女性才性,又想好好欣赏她们的娟辞丽语、彤管佳作,这种矛盾心理如何处理,就成为其时社会道德规范的制定者所需面临的问题。为了化解此一矛盾,《女论语》才被安置于名媛诗集之前,以昭告世人,在诗作之外,女德才是第一要事。面对道德训诫与诗歌合流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高彦颐根据《名媛玃囊》至少有万历二十年和万历二十三年两个刻本而认为,“女诫的附录是想,也确实达到了增加销售的目的”^{[6](P61)}。无论编者出于何种考量而将其置于首卷,《女论语》都凭借着这样偶然的因素保留了下来,成为至今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版本,而它也成为丛书本《女论语》之外的一个特别的版本。

二、重编《说郭》本与《绿窗女史》本

一些学者在论及《女论语》版本时,都谈到了《说郭》本和《绿窗女史》本。而所谓“《说郭》本”,实指明末重编《说郭》本,而非陶宗仪原本,

准确的叫法应为“重编《说郛》本《女论语》”。我们通过详细比勘,发现重编《说郛》本《女论语》是所有版本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一种,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另外,重编《说郛》与《绿窗女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尚未得到学界关注。就《女论语》一书而言,这两个版本实为同版印刷而成,是前后印本的关系,并非两个独立的版本系统。

(一)重编《说郛》非陶宗仪原本

《说郛》为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编,其书“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9],包含多种后世不传之书,因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遗憾的是,陶宗仪原本在编成之后很快散佚,没有刻本保留,流传至今的基本都是散卷残篇的抄本。明中后期出现一百二十卷本《说郛》,另附《续说郛》四十六卷,虽然书前题有“天台陶宗仪纂、姚安陶珽重辑”等字,书目也与陶本有重合之处,但此后出《说郛》的规模和内容已与陶本差异甚大,后世多称其为“重编《说郛》”。其书迭经删削重印,演变为清代通行本《说郛》,后入《四库全书》。无论陶本《说郛》还是重编《说郛》,因其篇幅巨大,校订、刊印及保存版片都成为十分艰辛的事情。即使有印本行世,也很少有人能够完整收藏一套。重编《说郛》杂糅窜乱之处颇繁,多遭诟病。民国时期,张宗祥因重编《说郛》非陶宗仪原本,便凭借主持京师图书馆职务之便,汇集六种明抄本,意欲恢复陶宗仪本原貌^[10]。书成之后,由涵芬楼排印,凡一百卷,是为涵芬楼本《说郛》,被认为是与陶宗仪原本最接近的版本。

清人陈师曾作《说郛书目考》,欲探求通行本《说郛》中各书之源流,然仅有抄本存世,且为残卷^④。对于《说郛》较为全面的考察,肇始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24年,他在《〈说郛〉考》一文中谈及了陶宗仪的生平、《说郛》的编纂与校订以及版本源流等问题^[11],但因他身在法国,资料缺乏,论述难免有误。其后,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学者渡边幸三作《〈说郛〉考》^[12]、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员景培元作《说郛版本考》^[13]、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仓田淳之助作《〈说郛〉版本诸说与己见》^[14],三人分别根据所见诸本《说郛》,对《说

郛》的版本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1979年,台湾学者昌彼得《〈说郛〉考》一书,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与《说郛》相关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是为《说郛》版本研究的一大力作。昌彼得之后,与《说郛》版本相关的讨论数量不多,而且均在昌氏的基础上进行细微的阐发和修正。近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在研究《圣武亲征录》时,旁及了《说郛》的版本问题,作《〈说郛〉版本史》,详细阐发了明代《说郛》诸抄本之间的谱系关系^[15]。

以上的诸多《说郛》版本研究,几乎均将考察的重点集中在陶宗仪原本《说郛》的编纂和流传方面,而详细梳理重编《说郛》的成书及流传状况者,唯有渡边幸三、景培元、仓田淳之助和昌彼得四人。渡边幸三之说发表年代较早,不及昌彼得的阐释精确,景培元虽参看了不同的版本,但他多沿用渡边的看法,“其文鲜有发明”^{[16] (p2)}。因此,有关重编《说郛》可以参考的学说,只剩仓田淳之助和昌彼得两家。

重编《说郛》的编纂及流传状况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通常所言的“《说郛》本《女论语》”实指重编《说郛》本,而非陶宗仪原本。明确这一点,方可判断《女论语》收录于《说郛》的时间。既然张宗祥所辑涵芬楼本《说郛》是最接近陶宗仪原本的版本,那么,若将重编《说郛》的目录与涵芬楼本《说郛》的目录两相对比,便可知两个版本所收书目的同异。而景培元也已完成了《说郛》目录的对比工作,详见其《说郛版本考》文后所附《说郛子目异同表》。景氏所采之本共五种:(1)涵芬楼本;(2)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藏明刊本,《说郛》120卷,《续说郛》46卷;(3)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明刊本,《说郛》120卷,《续说郛》44卷;(4)清初印本;(5)《四库全书》本。其中,后四种均属重编《说郛》版本系统。查阅此表,《女论语》一书未收于涵芬楼本,其余四种皆收录于“马七十”^[17]。近年,汲古阁藏明钞六十卷本《说郛》披露于学界,是当年张宗祥编订涵芬楼本《说郛》时未及参考的明钞,对此,张氏《铁如意馆随笔》云:“《说郛》(指涵芬楼本)印成后,知

台州图书馆尚有六十卷,亦明钞本,王子庄先生曾为题记,且目录亦全,但未寓目,不敢断定为何时写本。”^[18]此本现藏于浙江台州临海市博物馆,徐三见《汲古阁藏明钞六十卷本〈说郛〉考述》一文认为,此明钞本即以陶宗仪原本为底本而成^[19]。徐氏在文末附此明抄本的目录,为学之人得以略窥其貌。目录之中,没有《女论语》的条目。由是可以得出结论,《女论语》入重编《说郛》为明中后期之事,陶宗仪本人没有将《女论语》收入《说郛》之中。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女论语》因何收录于重编《说郛》?何人将《女论语》收录其中?所据底本为何?仓田淳之助在《〈说郛〉版本诸说与己见》一文中,着重讨论了重编《说郛》(仓田文中称为《重较说郛》)的问题。他首先注意到《重编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广汉魏丛书》《唐宋丛书》《五朝小说》等丛书的行格字体与重编《说郛》近乎一致,均为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单鱼尾,且这几部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目与重编《说郛》目录相同。同时,他比对了日本所藏以上诸丛书与重编《说郛》中相同的版面,发现两者的区别在于,重编《说郛》挖削了版片上原有的校阅者姓名,遂认为以上诸丛书的书版刻成后,大部分旁用于重编《说郛》。因而得出“重编《说郛》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刊版合集”^[14]的结论。但是,《重编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广汉魏丛书》《唐宋丛书》《五朝小说》等诸多丛书,并非由同一家书肆刊印,它们之间应该是互相独立的关系。因何毫无关联的几套丛书,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行格字体?对此,仓田淳之助却没有作出说明。

与仓田淳之助全然相反,昌彼得认为先有重编《说郛》之版,诸丛书后取用之。对于重编《说郛》的成书过程,他详细比勘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广汉魏丛书》《重编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熙朝乐事》和《游艺备览》六部丛书与明印本重编《说郛》的异同。他认为,重编《说郛》纂于万历年间,编成后刻板。何人主持编纂之务,今已无考。但是,当时寓居武林(今杭州)的诸多读书人,分别承担了校订重编《说

郛》的工作,刻板之时,于每一书名下标示校阅者姓名。但因无初印本传世,彼时是否印刷,尚存疑问。天启元年(1621年),杭州城发生火灾,重编《说郛》板片旋即分散,遂为书商所购。书商以这部分板片为基础,修补增刻,编印数种丛书,如《广汉魏丛书》《重编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熙朝乐事》《游艺备览》等。崇祯年间,重编《说郛》的书版被人搜集起来,由分而合,挖削增补,特别是挖去了校阅者姓名,其后重新印售。明亡,重编《说郛》板片仍存于杭州。顺治三年(1646年),浙江提学道李际期整理旧版,重定印行,是为清代通行本《说郛》的祖本。此后板片递有损毁,并且因其中部分书目关涉违碍禁忌之语,重编《说郛》屡经删改,各个印本互有不同,康熙年间,其板最终由合而分^{[16](P29-31)}。

重编《说郛》较陶宗仪原本《说郛》而言,所收书目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中有四百余种与陶宗仪原本相同,其余则为重编者所增。对此,昌彼得认为,这是抄本之误所致:

杨维桢《说郛序》云:“陶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一千余家”,此处“一千余家”,重编《说郛》本杨序刻作二千余家,殆其所据抄本之讹。重编《说郛》者既未能获见郁本之全书与全目,因此序有二千余家之说,于是广搜博采,流传之丛刻杂纂,无不囊括,欲符其数^{[16](P34)}。

由是,《女论语》本非陶宗仪原本所录之书,而是出版重编《说郛》的人在“广搜博采”的“凑数”过程中收入其中的。而其所据的底本,亦如重编者不知何人,无从考究,或为彼时坊间流行之本。

(二)重编《说郛》本与《绿窗女史》本为同版印刷

在重编《说郛》本《女论语》之外,《绿窗女史》本《女论语》亦颇受关注。《绿窗女史》,明末秦淮寓客辑,凡十四卷,是一部以妇女为主题的丛书。内容以前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为主,另涉女子仪范、妆容、劳作、撰著等。《女论语》位列全书首卷,类属《闺阁部·懿范》。

国家图书馆藏有《绿窗女史》数种,多为残

卷,仅有两明刻本为足本,两书内容完全一致,应为前后印本。印成时间较早的明刻本(简称“国图本”),凡十四卷,板框大小不一,行格不尽相同,应使用多种版片合印。但是行格多为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封面有“选工绣像”“心远堂藏板”字样。前有秦淮寓客所撰的《绿窗女史引》,小引首页有“万卷楼”朱椭圆印、“青宫之师”白方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朱长方印,另有一朱方印模糊不清,较难辨识。《女论语》首页有“王铁仙曾观”白方印。

比对《绿窗女史》和《说郛三种》影印本两书的《女论语》可知,国图本《绿窗女史》的行格字体与重编《说郛》完全一致。除清晰程度有所差别,版裂之处亦完全相同。初步判断,两书中的《女论语》应为同版印刷。

如此,《绿窗女史》与重编《说郛》的关系,就需作进一步考量。重编《说郛》与同时期的许多丛书,都有一定的关联。昌彼得的推想是,万历末年重编《说郛》版片刻成后,因天启元年杭州的火灾而散入书商之手,书商继而用以别印他书。不久之后,重编《说郛》版片又被重新收集起来,遂有崇祯年间重印的重编《说郛》。而《广汉魏丛书》《重编百川学海》《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熙朝乐事》《游艺备览》这六部丛书的印刷时间,要早于崇祯年间搜集重印的重编《说郛》。昌彼得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发现六丛书中,“所收四百余种书中,约四分之三逾三百种,《说郛》即据此旧版重印”^{[16](P26)}。而比较六丛书与重印本重编《说郛》重出的书目,虽然使用同版,但也有不同之处。重编《说郛》原为武林文人校订,因此每书作者之下,均有校阅人的姓名。校阅人的姓名在六丛书中有所存,在崇祯年间重印本重编《说郛》中,几乎不存。除了少数地方忘记删削,大部分校阅者姓名均被挖除。

依照这样的思路,也可将《绿窗女史》与重编《说郛》作一番比较。影印本《说郛三种》为明刻本,且较易获得,我们暂且使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刊本《绿窗女史》与《说郛三种》中的重编《说郛》进行对比。

这里关于《绿窗女史》还需作出一点说明。

《绿窗女史》的版本流传情况,今亦不甚明晰。除国图本之外,台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也收录了影印的明刻本《绿窗女史》^⑤(简称“丛刊本”)。相较丛刊本,国图本少收书18种,其中15种无目无书,另外3种有目无书。而这18种书的目录编次,无一例外地位于其所属小类的最后。仔细翻看国图本各小类目录部分,小类名称大字单行,书目名称小字双行,书目名称与小类名称中无空行。若小类中所收书目为单数,则最后一书目与下一小类名称中空出半行。《青楼部上·志节·徐兰传》《青楼部上·志节·义妓传》和《青楼部下·品藻·秦淮士女表》三书,丛刊本有目录处,国图本皆无,但是后者留有挖削未净的痕迹。或可以说明,国图本的印刷时间,晚于丛刊本。当时主持重印《绿窗女史》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想要删掉一些书目,又不想被人发现,因此直接删去每一小类最后的一种或两种,并挖除了相应的目录。删削卷末的部分,远比去除卷首、卷中的部分容易得多,这样做,便很难在目录上发现异常。有目无书的3种,应该是印刷之人一时疏忽大意,忘记挖削所致。考丛刊本《绿窗女史》,凡收书208种,见于重编《说郛》者,共30种,见于《续说郛》者,共12种。虽然国图本《绿窗女史》较丛刊本收书较少,但是除了《焚椒录》和《秦淮士女表》2种之外,其他见于重编《说郛》者,均存其中。丛刊本与国图本既为同版印刷,在丛刊本效果不甚理想、国图本得见原书的情况下,暂用国图本与《说郛三种》进行比对。

考两书重见书目,可知《绿窗女史》的印刷时间晚于明末重印本重编《说郛》,理由有五:(1)据昌彼得推论,重编《说郛》重印之时,挖削了原书作者之下的校阅者姓名。《绿窗女史》中,作者之下,均无校阅者姓名。(2)两书重出书目,集中分布在重编《说郛》弓七十、弓一百十一至弓一百十四以及《续说郛》卷四十三、卷四十四。重编《说郛》虽无明确的分类标准,但内容相近的书目,多集中排列。《绿窗女史》编纂者根据需求,分别取用了重编《说郛》与《续说郛》中的部分书目,后借版印刷。(3)《绿窗女史》版片模糊漫漶之处,较重编《说郛》更加严重,有些书页几不可阅,也出

现了笔画掉落的现象。如《女诫》叶五b前六行上半部分、叶六a第五、六行上半部分十分不清晰。叶三b“守节”的“节”字、“妇德”的“妇”字,分别掉落一半;《同昌公主传》叶四b最后一行第一字“珍”连同部分板框均磨损不见,重编《说郛》中尚存。(4)《绿窗女史》与重编《说郛》版面裂缝处相同,前者裂缝更大,更有甚者分裂为两部分。如《刘无双传》最后一页,《绿窗女史》版片的裂缝更大,且横向贯穿,裂缝上下的界格并没有对齐,或已彻底断开。(5)《绿窗女史》补版之处,与重编《说郛》原版有所不同。《绿窗女史》中,《赵飞燕外传》全书的版面状况都十分糟糕,重编《说郛》情况稍好,单页模糊不清。《绿窗女史》刊刻之时,版面状况已劣于重编《说郛》重印之时,因此在非常糟糕的地方,模仿重编《说郛》进行了重刻。叶三b“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二十七字为补版部分,字体较重编《说郛》更为纤细。

明末书坊,甲乙互鬻屡有发生,同一套版片,可能被不同的书肆用以印刷,出现在不同的书籍之中。重编《说郛》版片被人重新搜集起来之后,保存于书肆,《绿窗女史》编纂之时,借用了重编《说郛》的部分版片,稍稍进行了补版、重刻,再行印刷,于是才出现了今天可以看到的《绿窗女史》与重编《说郛》中的《女论语》为同版印刷的情况。因此,重编《说郛》和《绿窗女史》两书中的《女论语》应为前后印本的关系。

三、《女四书集注》本

《女论语》为世人所熟知,多藉由明末清初人王相的《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但是《女四书》的成书时间,至今不能确定。王相选择哪一版本的《女论语》作为底本,今亦无考。收入《女四书》的《女论语》可泛称“《女四书集注》本”或“《女四书》本”。《女四书》成书之后,迭有刊印,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版本系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多文堂刊本、清初奎壁斋本、书业堂本及清末诸多印本,均是《女四书》本版本系统中的一部分。不过,不同版本的《女四书》,多少存在相异之处,《女论语》也因《女四书》的版本差异而发生了些微变化。

(一)多文堂本

每论及王相《女四书集注》,多文堂本《闺阁女四书集注》必是最先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女四书集注》刊本。但是,得见此本者似乎仅有胡文楷一人,旁人均是通过他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叙述,才了解了此本的情况。胡氏于自序中言道,《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著录的书目,其经眼者,或向全国各图书馆借钞,或遍观诸家私藏。而“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提拔者,诗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20](P5-6)},也一一采录。其凡例又云:

书囊无底,闻见有限,著录各书,或仅著初刻,而覆刻重刻之本,未见著录;亦仅有据重刻,而原刻不详者。而坊间石印之本,前以其不甚珍贵,未经采集,故未能一一著录^{[20](P10)}。

胡氏所阅之书虽多,但仍有许多书籍未得经眼,故其所见者,于条目后标示“见”字,未得见者则标示“未见”。关于《女论语》,胡文楷著录云:

《女论语》一卷,唐宋若莘、宋若昭撰,《新唐书·后妃传》著录。(见)

明末多文堂刊本,列入《闺阁女四书》,琅琊王相笺注。书凡十篇: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前有自序。又《说郛》本^{[20](P22)}。

又《闺阁女四书集注》条云:

《闺阁女四书集注》,明天启四年甲子多文堂刊本。

(明)王相笺注。相字晋升,琅琊人。是书前有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御制序。卷首题莆阳郑汉濯之校梓。九经堂刊曹大家《女诫》、仁孝文皇后《内训》二种。后多文堂刊《女论语》及《女范捷录》,为《女四书》^{[20](P843)}。

胡文楷于《女论语》条目后书“见”字,表明他过眼了天启四年(1624年)多文堂刊印的这部《女论语》,如此,至少在二十世纪中叶,此书仍留于中国大陆。遗憾的是,胡氏没有明言《闺阁女四书

集注》的来源和去向,并且自他之后,也再无人见过此书,其书至今下落不明。因此,关于此版本《女论语》的情况,仅能依靠胡氏只言片语的记载得以了解。

胡文楷所见的《闺阁女四书集注》由两个版本配补而成,而非九经堂或多文堂最初刊刻的足本。其中,《女论语》由多文堂所刊,而此本最大的特点即其为十章,而非通常所见的十二章。除此之外,所有版本的《女论语》皆为十二章。

(二) 奎壁斋本

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初刻本。板框大小约 18cm × 12.8cm,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方体字。版面模糊漫漶处颇多。此本封面除书名外,另有“奎壁斋订本”“金陵郑元美行梓”等字。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内训》末页、《女范捷录》末页牌记曰“莆阳郑氏订本 金陵奎壁斋梓”。《女诫》首页、《宋若昭女论语》首页、全书末页分别有“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印。文字不避康熙、乾隆之讳。《宋若昭女论语》凡十二章,卷首题“琅琊王相晋升笺注 莆阳郑汉濯之校梓”,前有宋若昭本传和《女论语序传》。

关于“奎壁斋”,《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奎壁堂”条云:“一作‘奎壁斋’。明万历间金陵人郑思鸣、郑大经的书坊名,在状元坊。”^{[21](P425)}则《女四书集注》牌记中所谓的“金陵奎壁斋”,即指此书坊。而关于郑元美,《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认为,郑思鸣字元美,故郑元美就是郑思鸣^{[21](P425)},但对于这种看法,尤海燕进行了辩驳。她认为,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主要在明末清初,其立论的证据如下:(1)奎壁斋刻《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正文首页标注“琅琊王相晋升增注 莆阳郑钡元美校梓”,可视为郑元美非郑思鸣的直接证据。(2)《歌林拾翠》刊于“己亥年”,书中收录的《红梅记》的流传时间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晚于此前的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遂排除了万历二十七年刊刻的可能。(3)除《歌林拾翠》外,郑元美奎壁斋所刻诸书如《广日记故事》《女四书集注》,完全不避康熙、乾隆之讳,因而《歌林拾翠》应刻于康熙之前的己亥

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年)^{[22](P59-63)}。

此外,由于《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首页标注“琅琊王相晋升增注 莆阳郑钡元美校梓”,尤海燕认为此书的刊刻由郑元美主持,实际增订评注工作则由王相完成,因此郑元美和王相是同时代的人^{[22](P62-63)}。这一推论有一定道理,那么郑元美和王相可能生年有所重合,进一步而言,王相或许还见到过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

尤海燕关注到的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即为我们所见之本。《女论语》书前编录宋若昭本传,正文十二章,卷首题“莆阳郑汉濯之校梓”之外,另题“琅琊王相晋升笺注”。在多文堂本不知去向的情况下,奎壁斋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女四书》本《女论语》,又因其刊刻之时王相可能尚在人世,所以文本内容应比较准确、可信。

另外,还有以奎壁斋本为底本的书业堂本《女四书》,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书业堂,明万历年间苏州金阊地区的书坊^{[21](P85)},入清后,刻书、售书活动仍继续。据书业堂本《女四书》封面“奎壁斋订本”“乾隆六十年秋镌”“书业堂梓行”等字可知,书业堂本《女四书》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以奎壁斋本为底本而成。此本板框大小约 17cm × 12cm,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首页有“浅草文库”“书籍馆印”和“日本政府图书”等印。书业堂本虽本自奎壁斋本,但《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四书的排列顺序与奎壁斋本稍异,奎壁斋本的顺序为《女诫》《内训》《女论语》和《女范捷录》,而书业堂本则为《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书业堂本的顺序以四部书产生的年代顺序排列,而奎壁斋则将本朝(明朝)徐皇后的《内训》前提,这一编排颇具时代特点。另外,在现存的《女四书集注》中,清末印本较多,明代及清代中前期印本稀少,作为清中期刻本的书业堂本,可视为《女四书》在清代迭有刊印的确证。

(三)《校订女子四书笺注》与《状元阁女四书》

《状元阁女四书》系指清末李光明庄所刻的《女四书》及其他书坊据此覆刻之本。李光明庄

是其时南京城内颇具盛名的书坊,印售各种童蒙读物,十分畅销,流传颇广。20世纪90年代末,黄永年先生至苏州,于旧书铺内购得一部《香山诗选》,书后附有一页售书广告:“江南聚宝门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李光明家自梓童蒙各种读本,拣选重料纸张装订,又分铺状元境,状元境口状元阁发售,实价列下。”^[23]而“自梓童蒙各种读本”中,便包括了《状元阁女四书》。

《状元阁女四书》印成发售之后,颇受时人欢迎,其他书坊相继仿刻,并沿用《状元阁女四书》之名。不过,《状元阁女四书》的校订刊印,并非李光明庄的创举,而是肇始于苏州崇德书院。李光明庄以崇德书院的《校订女四书笺注》为底本,或另参照其他坊间流传的《女四书》,进行了简单校勘,虽然修正了崇德书院本的个别字词错误,但有多处原本正确的地方,《状元阁女四书》却现为错字。事实上,当时流传甚广、今天仍为许多研究者所重的《状元阁女四书》,并不如崇德书院本精良,可以说,崇德书院《校订女四书笺注》才是清末流行的诸多《状元阁女四书》的祖本。由于李光明庄在刊印童蒙读物方面知名度较高,所以坊间覆刻之作较多,人们也多愿选读《状元阁女四书》,而渐渐遗忘了它的祖本——崇德书院《校订女四书集注》的存在。

1. 苏州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集注》。此本刊刻于光绪三年(1876年),封面题名《校订女四书笺注》,首页题“琅琊王相晋升笺注 莆阳郑汉濯之校梓”等字。内封牌记曰:“光绪丁丑刊于苏州崇德书院”。板框大小约17.6cm×13cm,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或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潘遵祁《序》,《序》文开头纸页破损,缺“诗三”两字。其中的《女论语》书为《宋若昭女论语》,前有宋若昭《唐书》列传及《女论语序传》,共十二章。

潘遵祁(1808—1892),字顺之,号西圃,吴县人(今苏州吴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翰林,后无意仕途,回乡隐居,著有《西圃集》。潘遵祁《序》作于光绪二年(1876年),其云:

诗三百篇,首求淑女。易六十四卦,爰着家人,此关雎所以为王化之始,而正家所以可定天下也。闺门之教,今之人忽焉不讲,而古圣人重之如是。善乎陈文恭公之言曰:“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于是乎有《教女遗规》之刻。近日坊间所传《女诫》《女论语》等,流风善政,犹有存者,无如翻刻麤陋,增损失真,仅供村塾师口授,而诗礼之门、庠序之士,反为未见之书。世风日下,中馈不严,休其蚕织,嘻嘻终吝。每观一家之兴替,系乎内助之贤否者甚多。读文恭之书,慨焉有思古之怀。适坊友重谋剞劂,因为校正授之,而并以书^[24]。

陈文恭公是为编纂《教女遗规》的陈宏谋,潘遵祁有感于陈宏谋对于闺门之教的重视,又因坊间流传的《女诫》《女论语》等书翻刻丑陋,粗鄙失真,故在崇德书院的邀请下,重新校订了王相所注的《女四书》,翌年,这部潘校《校订女四书笺注》便付梓刊印。

以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中的《女论语》与崇德书院本(简称崇本)校勘,可以发现两者相异之处。如《女论语序传》部分,“深惜后人”,崇本作“深夫后人”;《学礼章》中“迎来递去”,崇本作“迎来送去”;《训男女章》中“家乡不顾”,崇本作“家庭不顾”;“酗酒歌唱”,崇本作“酌酒歌唱”;《营家章》中“扰乱四邻”,崇本作“扰乱西邻”;《守节章》中“女德昭明”,崇本作“女德聪明”。这些与奎壁斋本具有明显差异的文本,均被诸本《状元阁女四书》继承下来,也可以作为判断版本源流的依据之一。

2. 李光明庄本《状元阁女四书》。此本刻于光绪六年(1880年),封面朱墨题名《状元阁女四书》,内封刻朱色广告词“江南城聚宝门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秦状元巷中李光明庄重复校对自梓童蒙各种读本拣选重料纸张装订发兑”一段。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序文刻于红靛套印龙凤图框正中,半页五行,依序文内容提一格、两格、三格不等,凡四页。叶四b牌记曰“光

绪六年八月”,另有“天子万年”四字。《曹大家女诫》首页、全书末页有“北京图书馆藏”朱长方印。板框大小约 18.4cm × 13cm,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方边框下凹一字,版心下方刻“李光明庄”四字。正文及注文部分有圈点句读。书后附潘遵祁跋,实为崇德书院本《女四书》中潘遵祁序。

李光明庄《状元阁女四书》中的《女论语》部分,整体承袭崇德书院本,于个别之处予以校改。对比两书,第六章《事舅姑》末尾,状元阁本添加“恣音自”的音释,崇本无此三字,年代更早的奎壁斋本亦无,说明此为李光明庄所添,非王相原注。其他与崇本不同之处,如《唐书》列传,“德宗”,状元阁本作“德宋”;《女论语序传》,“深夫后人”,状元阁本作“惧夫后人”。《学礼章》“当起不起”,状元阁本作“待起不起”;“汤干醋尽”,状元阁本作“汤干酬尽”。

自潘遵祁校订、苏州崇德书院印行《校订女四书笺注》后,王相笺注的《女四书》在清末社会中迅速流传开来,对这一流传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李光明庄所刻《状元阁女四书》。其后,文成堂、江左书林、共赏书局、善成堂、江阴宝文堂等,直至民国时期的锦章书局、会文堂书局,相继据李光明庄本覆刻或重刻此书,诸书的祖本实际都应是崇德书院的《校订女四书笺注》。清末诸多书坊更直接沿用了李光明庄“潘遵祁跋”的说法。

综此,我们看到,目前传世的数十种《女论语》,均为明清刻本。这些刻本实分为了《名媛玃囊》本、重编《说郛》本和《女四书集注》本等 3 个系统。《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玃囊》首卷所收明万历年间刻《女论语》,是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者。重编《说郛》本为明末坊间之作,其非陶宗仪《说郛》的原本;《绿窗女史》本与重编《说郛》本实为同一书版的前后印本。《女四书集注》本中,清初奎壁斋本的年代最早。清末诸多《女四书》本的祖本,是崇德书院的《校订女四书笺注》。而《状元阁女四书》则是流传最广、翻刻重刻次数最多的版本。

注释:

① 见王应麟《玉海》卷五五《艺文·唐女论语》,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049 页;郑樵《通志》卷五六《艺文略·列女》,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志 779 页下。唯《通志》虽沿用前代之说,但却误将“篇”作“卷”。

② 如高世瑜认为,宋若莘的《女论语》原作已散佚,传世的《女论语》前十章为宋若昭的申释之文,后两章“和柔”“守节”的内容或为后人所添(氏著《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148 页);李志生认为,《女论语》十二章均为宋若昭作,前十章为申释之文,后两章为总结之文,随着宋若昭注释的流传,位于结尾处的总结之文渐被冠以十一章和十二章(氏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8 页);日本学者山崎纯一推测,传世的《女论语》或是薛蒙妻韦氏的《续曹大家女诫》(氏著《教育からみた中国女性史資料の研究》,东京:明治书院,1986 年,第 109 页);黄嫣梨认为,《女论语》作者确为宋若莘、宋若昭,但今传本或并非原本之制(氏著《〈孝经〉与〈女论语〉》,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第 189 页)。

③ 据内阁文库馆藏检索系统获取两书信息,见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④ 陈师曾《说郛书目考》,现存 1~3 卷,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⑤ 参见秦淮寓客的《绿窗女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中心《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 2 辑,天一出版社影印明刻本,1985 年。

参考文献:

- [1]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98.
-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08.
- [3] 赵力光,王庆卫.新见唐代内学士尚宫宋若昭墓志考释[J].考古与文物,2014,(5):102-103.
- [4]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84.
- [5] 北京图书馆.西谛书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66.
- [6]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7] 司马光.家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2. 34 上.
- [8] 池上客.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玃囊[M].明万历

- 二十三年郑云竹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序2.
- [9] 陶宗仪,等.说郛三种·杨维禎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 [10] 陶宗仪,等.说郛三种·张宗祥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 [11] [法]伯希和.《说郛》考[A].冯承钧,译.应再泉,徐永明,邓小阳.陶宗仪研究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276-295.
- [12] [日]渡边幸三.《说郛》考[A].陈越,译.应再泉,徐永明,邓小阳.陶宗仪研究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02-377.
- [13] 景培元.说郛版本考[J].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1):19-32.
- [14] [日]仓田淳之助.《说郛》版本诸说与己见[A].贾莉,译.应再泉,徐永明,邓小阳.陶宗仪研究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38-354.
- [15] [美]艾鹭德.《说郛》版本史[J].马晓林,译.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4,(9):387-438.
- [16] 昌彼得.《说郛》考[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17] 景培元.说郛子目异同表[J].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1):43.
- [18] 张宗祥.铁如意馆随笔[M].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9.
- [19] 徐三见.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J].东南文化,1994,(6):112-127.
- [20]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1]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济南:齐鲁书社,1999.
- [22] 尤海燕.《歌林拾翠》刊刻年代考论——兼论奎壁斋郑元美的刊刻活动时间[J].文献,2010,(3).
- [23] 黄永年.介绍一个世纪前的童蒙读物[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4):164-165.
- [24] 王相.校订女四书笺注·潘遵祁序[M].苏州崇德书院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 Study of *Nü Lunyu*'s Edi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WANG Danni, LI Zhishe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many editions of *Nü Lunyu* are reserved in libra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book has not been studied in detail. All *Nü Lunyu* reserved today were prin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derived from three different systems of edition——*Mingyuan Jinang*, Reprinted *Shuofu* and *Nüshishu Jizhu*. The earliest edition came out in the form of the first volume of *Juan Liechao Lienv Shixuan Mingyuan Jinang*, printed during the era of Emporer Wanli. Reprinted *Shuofu* was produced by a book store in the late Ming. *Nü Lunyu* was added along with many other new works. Edition in *Lüchuang Nüshi* were printed with totally the same inscribed boards of Reprinted *Shuofu*. Among all the editions of *Nüshishu jizhu* system, the work of Kuibizhai in early Qing was the earliest to be found. Other editions in late Qing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Jiaoding nüshishu jizhu* published by Chongde publishing house. *Zhuangyuange nüshishu* was the most popular and widespread edition, which was also reprinted for several times by other presses in late Qing.

Key words: *Nü Lunyu*; edition; *Mingyuan Jinang*; Reprinted *Shuofu*; *Lüchuang Nüshi*; *Nüshishu jizhu*

(责任编辑 鲁玉玲)

· 女性文化研究 ·

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现状的调查研究

刘文菊

(韩山师范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已经式微的挽面民俗在潮汕地区仍然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近年来有复兴之势,挽面美容店铺开始增多,挽面顾客增多。传统潮汕女性在出花园、婚嫁、满月、丧葬、时年八节等习俗中都要挽面。挽面是女性的重要生命民俗事件,承载着性别文化的特殊意义,有着鲜明的女性民俗文化色彩,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的发展变迁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与变化。

关键词:潮汕文化;挽面民俗;女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56-06

挽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几近濒危消失的传统女性美容术。多数研究者是把挽面涵盖在地方婚俗中进行简单的附带介绍,在近年来的民俗学研究中才把挽面当作一种女性民俗非遗文化来关注。对潮汕地区的挽面美容店、挽面娘以及挽面顾客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已经式微的挽面民俗在潮汕地区仍然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甚至近年来有复兴之势,不少现代女性选择这种绿色健康的传统美容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对挽面娘的口述访谈,解读挽面在女性生命历程中的意义,揭示挽面民俗鲜明的女性文化色彩。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的发展变迁史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与变化。

一、挽面的基本介绍

(一)挽面的概念

挽面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女性美容术。“挽”在闽台方言中是“拔”的意思,挽面是一

种利用纱线拔除面部的汗毛,修齐额发、鬓角和眉毛的传统的女性美容方式,也是传统婚俗中女子出嫁的修容仪式。挽面也称“挽脸”“绞面”“绞脸”等,闽台方言称“贵面”,广东江门称“捩毛仔”,广东湛江称“拔面毛”,也有称之为“开面”“开颜”“开额”“换新脸”,有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祈求吉利、祝福新娘的寓意。在中国,从北方到南方,如东北、河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都有为新婚女子“开脸”的习俗。

按照台湾的习俗,女性头一次挽面是在出嫁之前做的,叫“开面”,要邀请多子多孙的老妇人动手,如果这位老妇人不会,只要做做样子,再另外请挽面婆完成。在台湾,还流行着一道谜语“四目相看,四脚相撞。一个咬牙根,一个面皮痛。”谜底便是“挽脸”^[1]。挽面在潮汕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陈友义,杨萍认为:挽面这一独有的潮汕民间生活习俗始于何时,今难以考证,有一

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2014年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妇女/性别研究课题“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的现状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FY1409)

作者简介:刘文菊(1968—),女,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女性学、女性文学研究。

说它在清朝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根据潮剧《苏六娘》中的剧情:“杨家乳娘对苏六娘说:‘修容择在寅时,簪花择在卯时。’”可见,挽面这一民间生活习俗在明代就已出现^[2]。

(二)挽面的方法

关于挽面的方法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如,林长华说:“挽脸”就是一种利用纱线拔除脸上汗毛的古老美容方法^[3]。杨萍介绍:挽面,是用浸湿的纱线绞去脸上汗毛的一种古老的美容术^[4]。施翠峰介绍:挽面是一种利用纱线来拔除脸上汗毛的美容方法^[5]。给人挽面的大都是女人,被称为“挽面娘”,其挽面的手法大同小异。陈绍龙描述了挽面的情形:王婶断一根长线,两头在一块打上结,绕几个交叉,形成“剪”状,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绷紧,用牙咬着线的一端,把线贴着女孩的脸,两手和嘴同时外撑开,就把脸上的汗毛给绞下来了^[6]。涂明炎介绍:开脸者先在姑娘脸上扑粉,然后用双手绷着棉线,让两根线绞着姑娘脸上的汗毛,轻轻地扯起来。棉线在脸上来回地扯,反复多次,直到将汗毛扯尽。再用煮熟的鸡蛋白在扯过汗毛的脸上滚动按摩,起到滋润皮肤、防止感染的作用。上述程序完成后,再梳顺头发,盘成发髻,黄毛丫头就变成了俊俏媳妇。每次挽面,多则半小时,少则也要10到15分钟,在这个过程中,顾客眯着眼任挽面娘的棉线在脸上“游走”,除了第一次挽面不适外,挽面会成为一种美容享受。^[7]我们在潮汕看到的挽面情形往往是这样的:两人相向各坐一只凳子,一高一矮,挽面娘坐得高一点。她先用粉饼涂在额头、两颊、眉毛四周、嘴巴周围和下巴上,然后将一条两尺多长的纱线对折,中间在右手拇指上绕了两匝,一头用牙咬着,另一头拿在手上,像一把剪刀一样,交叉绞动,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把汗毛绞干净。挽面所需的工具极其简单:棉线、松粉、眉夹、簪子和板凳。挽面的场所也很简陋,只需一个小铺面,也没有复杂的设施,有些甚至是在街边树下、屋檐廊下,成本低、收费少、时间快,深受老百姓欢迎。

(三)挽面的习俗

传统潮汕女性在出花园、婚嫁、满月、丧葬、时年八节等习俗中都要挽面。

第一,挽面是潮汕地区女性出花园的仪式。出花园是潮汕地区一种特有的传统成人礼俗,有15岁男女孩子的家庭,要在阴历七月初七乞巧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或另择日为孩子备办三牲果品拜别公婆神。姿娘仔出花园时要请人来挽面,开过脸的女孩象征着已经成人,可以谈婚论嫁了。在出花园仪式上,长辈会教育她们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做一个贤惠勤奋又善良坚贞的好媳妇,这就是基本的妇德教育。曾有诗记曰:“亭亭少女卓娇妍,十五华龄意气翩。挽面修眉施粉黛,穿新沐浴饰珠钿。改肠换肚良而善,悦色和颜丽且娴。拜谢婆亲从此别,依然不舍俏童年。”^[8]

第二,挽面是潮汕女性出嫁的仪式。挽面是传统婚俗中女子出嫁的修容仪式,在旧时的中国非常普遍,只是不同地区称呼不同而已。挽面通常由女性长辈施行仪式,有的是在新娘上轿前在女方家里进行;有的是在新婚后第一个早上在男方家里进行。挽面娘须是子孙满堂、夫妇和睦、有威望的“好命人”,希望“好命人”通过挽面可以把这一福荫传给新娘。出嫁挽面要用五彩线,寓意着对新娘的祝福和美好愿望。汕头澄海的高女士讲她2016年结婚挽面的情形:现在比较难找到挽面娘,所以由我妈妈代替,只是个形式而已,挽面用两条线,一条是线青,一条是线红。由妈妈代替做四句“挽条青合大家,挽条红合众人。挽条青合大家。挽条红合夫郎。”重复两遍,挽八下。

第三,挽面是部分潮汕女性在葬礼上的礼仪。在潮汕的有些地区,在丧葬礼上有“男剃头、女挽面”之说,参加葬礼的女性要挽面,男性要剃头,无论男女都以干净整洁的容颜去送别逝者,这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一种悼念,是丧礼上祛魔祈福的象征性仪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早已没有了严格之规,只是象征性地做一下挽面的动作就可以了。有文章写道:“老人过世后,直系亲属中男的都要剃光头(现在一般只需要剪一下头发),女的都要挽面。”^[9]

第四,挽面是潮汕女性在时年八节的礼仪。有些潮汕地区的女性在时年八节都会去挽面,表达对节日的庆祝、对美的追求,也要去祭拜神明,

祈愿家人平安。在过年前,男人理发,女人挽面,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有俗语说“有钱没钱,挽面过年”。劳热,也叫拜老爷,是春节前后各村举行的民俗庆典活动,在劳热之前,女性都会去挽面,以表达对神明的尊重的愿望。

另外,在其他重要的日子,比如坐月子时也要挽面。《海韵东山》记载:“产妇满月也习惯挽一次脸,寓意脸庞如满月美丽皎洁。”^[10]《翔安民俗》记载:“以前行丧事或坐月子后都要请人绞面后才能外出走门串户。”^[11]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挽面也不再有多禁忌,现代女性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挽面,故而挽面在近些年有复兴之势。

二、潮汕女性挽面民俗现状的口述访谈调查

自2014年以来,我们深入到潮汕地区的城镇乡村寻找挽面娘,进行口述访谈。共走访了11位挽面娘,让挽面娘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她们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分析挽面文化现状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第一,访谈内容。一是口述个人生活经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主要状况;二是口述学习挽面的经历,包括挽面时间、挽面学习途径等;三是讲述挽面的历史变迁,包括过去和现在的经营状况、家人态度等。

第二,访谈对象。挽面娘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50岁以上的挽面娘有8人,年龄最大的是1930年出生的王奶奶,年龄最小的是1975年出生的周阿姨,挽面时间较长的是出生于20世纪30~50年代年龄在50岁以上的挽面娘。其中潮州6人,揭阳5人,共计11人,其中1人来自海南,1人来自湖北。

第三,受教育情况。她们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有7人,其中有2人是高中毕业,其余4人是文盲。

第四,生活现状。从家庭情况来看,她们多数兄弟姐妹众多,家庭条件艰苦,自幼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从生活状况看,其多数把挽面当作副业,同时还兼做理发,时间支配相对自由。其中现状较差的是揭阳的肖阿姨,她与丈夫分居,儿女都不认她,目前一个人租店挽面,靠挽面和社保为生。

第五,挽面时间。多数50岁以上的挽面娘

具有较长的“挽龄”,都在10年左右,挽龄最长的是揭阳的陈阿婆,做挽面40多年。挽龄比较短的是潮州古巷镇的李阿姨,有7年挽龄。

第六,挽面途径。挽面娘学习挽面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自学,有的是跟母亲学习,有的是跟邻居学习,还有的跟亲戚学习,学习对象都是女性。多数挽面娘因为母亲擅长挽面,年幼时便耳濡目染,属于家传手艺;有的是姿娘仔时开始学挽面,有的是嫁人之后跟着亲戚朋友学习。

第七,经营状况。挽面店的经营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小本手工生意,稍微补贴家用。她们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最多挣100元,生意不好的时候,三四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多数挽面娘并不以挽面为生,也不刻意经营。挽面的店铺,有的是理发店兼挽面店,理发顺带做挽面,比如揭阳的黄阿姨、蔡阿姨、周阿姨;揭阳陈阿姨的挽面店兼做中介工作。有的人是把挽面当作业余手艺,并不开店经营,只等顾客上门或者叫去家里服务,如潮州的张阿姨和李阿姨。挽面娘的家人不会阻止和为难她们,只要能挣钱补贴家用就好。

第八,挽面顾客。挽面顾客来自四面八方,有年纪大的常客,有从外地回家过节的邻里,有同乡和亲戚朋友。主要人群是青年女子、中年女子和准新娘。男顾客很少,偶尔有熟客,黄阿姨、陈阿姨明确表示不会给男顾客挽面,要遵守挽面行业的规则,一律婉言谢绝。蔡阿姨则不同,她不拒绝给男顾客挽须。

第九,挽面费用。挽面的费用非常低廉,王奶奶说最早挽面只要8分钱,后来慢慢涨到1角、2角,直到现在是一次20元。陈阿姨说如果只是修眉和挽嘴边四周,收12元,全脸就是20元;肖阿姨的收费是每次20元,包括挽脖子后面的汗毛。潮州的蔡阿姨每次挽面收12元,但给新娘挽面则要一两百元。

三、潮汕女性挽面民俗调查分析

(一)从传承主体看,挽面的主要参与者是女性

挽面是女性的专属领域,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不仅挽面娘是女性,挽面顾客也多数是女性,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行规。上到七八十岁的

老太太,下到小女孩,都成为挽面的主要群体。挽面空间一般具有很高的私密性,挽面场所大多在女性化的私密空间进行,比如娑娘仔的闺房、嫁娘的新房、产娘的房间等,即便是在店铺里,也是很狭窄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挽面的私密性。同时,挽面方式也具有很强的亲密性,两人相向贴近而坐,面对面、脸对脸的挽面动作,鼻息互通,零距离接触,更是决定了挽面的排异性。故而,挽面是女性化的美容术和女性化的民俗活动,男性一般是被排除在挽面之外的。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挽面娘都拒绝男顾客,只有一名挽面娘表示可以给男性挽须。如陈阿姨口述:

我自己不会给男人挽面。觉得这是女人活动的地方,男士不宜参与。不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带她男朋友来叫我替他修眉,我答应了,毕竟是他女朋友带来,不好意思拒绝。后来有几个男生结队来我这里挽面,被我拒绝了。^①

蔡阿姨口述:

我是等孩子大了上学后才开店挽面兼理发的,有时女儿也会来帮忙。都是女人来挽面,很少有男人来。不过,我也给男人挽面,是来挽须的,而且是熟客,并不觉得难堪。^②

(二)从传承方式看,挽面主要是通过女性谱系传承

挽面技艺是通过女性代代相传,属于女性谱系传承。挽面娘学习挽面的途径各有不同,但比较普遍的是从小跟着母亲学习或是模仿女性邻里亲朋自学而成。有的是母亲手把手地教会女儿;有的是跟女性邻居学习;有的是完全靠自学。她们首先是自己要有好奇心和兴趣,再去刻苦练习,并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来教授。像钩花、刺绣等传统女性化的手工艺一样,主要是靠女性谱系传承,挽面技巧虽然相对简单,但是也常常被挽面线割破手指,一样充满艰辛。有些挽面娘有意要将挽面手艺传给下一代,可是并不被接受,挽面的濒危也不可阻挡。如肖阿姨口述:

以前我妈妈会挽面,她用一条细纱线教我们三姐妹,但那时我怎么都学不

会。后来在普宁的建筑工地打工,快过年了,一起打工的三个揭阳娑娘仔一定要我给她们挽面,我说我不会,她们硬是拿着纱逼我帮她们挽,但不知为什么,我拿起线来骤然就会了,真是奇事。现在我是潮州挽面做得最好的,“潮州挽面第一人”。^③

(三)从传承功能看,挽面是女性的生命民俗事件

挽面看似只是一种传统的美容方式,实际上却与民俗文化活动紧密相联,承担着文化的传承功能,承载着特殊的性别文化意义。传统潮汕女性的生命事件几乎都需要挽面这个仪式协助完成,出花园、结婚、生子、拜神、丧葬等。出花园时要挽面,寓意从此迈入成人的殿堂,告别了黄毛丫头的身份,从一个少女变成了青春女郎。出嫁时要开脸,挽面“开额”寓意从此开窍和会持家,从青春少女变成贤良主妇。生产满月要挽面,俗称“挽脱产”,挽面用过的丝线要挂在石榴花上,寓意多子多福。长辈的丧礼上要挽面,既表达追悼和尊敬,也寓意除去丧礼上的晦气。总之,挽面贯穿着女性的一生,是女性的生命民俗事件。它不仅是女性性别角色、身份地位转变的见证,也是民俗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如陈阿姨口述:

女人一生重要的日子都要挽面。一般15岁出花园和出嫁的时候是一定要挽面的,这两个日子最重要。出嫁的时候要先看个好日子,选好良辰吉时,请挽面娘到家里去挽面。也有人到这里来挽面,我要边挽面边做四句。^④

(四)从挽面的时节看,时年八节、婚丧礼是高峰期

挽面是分时间和场合的,有一定的时节性,一般来说,时年八节、婚丧礼是高峰期。逢年过节挽面的人最多,俗语说“有钱没钱,挽面过年”,挽面为的是图个喜庆,客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连中途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劳热日的时候,挽面的人也多起来,挽面是为了表达对拜神仪式的尊重和虔诚。挽面最多的是娑娘出嫁

的时候,潮汕地区的婚嫁习俗很讲究,挽面是新娘必需的一个仪式,要在良辰吉日请挽面娘上门来挽面,边挽面边“做四句”,还要给挽面娘大红包当回礼,仪式才算圆满完成。另外就是丧礼上的挽面了,这时的挽面比较简单,一般是挽面娘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婆娘们轮流来挽面,老少都要挽面。不过,现代社会里生活风气开化,很多礼俗禁忌都逐渐松动,女性为了美容保健随时都可以挽面,已经没有了时节的限制。如何阿姨口述:

挽面最忙的时候就是年底了,从早做到晚,每天差不多有15个人。不忙的时候,有时一整天没人来,有时有五六个或者七八个。收费也从原来的5块涨到现在的15块。新娘挽面都会选好吉日,提前打电话,告知时间、地点,她家里会提前准备好东西:一碗干净的生水,一枝红花和仙草凑成对放在水里。挽面时,新娘穿着嫁衣坐在放有裤子的凳子上,我用五根彩线(红、白、蓝、黑、黄)挽面,一边挽一边做四句,哼唱道“今日好日子个额来开起,挽额就食老有食,挽耳就生弟,挽额就发大财。”挽好之后,新娘会给我一个红包,有的220元,有的240元,有的280元,都是吉祥数字。^⑤

(五)从挽面的发展看,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挽面的习俗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衰微,现代美容方法兴起之后,挽面技艺更是几近濒危,挽面娘也多是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传承人群的断裂使得挽面技艺逐渐消亡,微小的挽面文化甚至没有被当下兴起的非遗热潮所关注,也没有受到民俗活动兴盛潮流的冲击,仍然处于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不过,在学术研究界,受人类文化学以及民俗学研究热潮的影响,挽面文化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比如,台湾有不少学者从事挽面文化研究,张君荧《“但求立锥之地”:士林挽面摊贩的民族志研究》,以台北市士林区文林路“挽面街”的挽面摊贩们为主要研究对象^⑥。王明典《一个当代台湾

“挽面”文化再兴起的探讨》,“探讨台湾挽面产业文化其背后所隐含的兴起衰败及一个好的文化应该有的延续价值。”^⑦尤秀惠《挽脸美容业顾客满意度之研究》,“探讨挽脸美容业之顾客满意度,并分析不同背景变项的挽脸美容业顾客满意度在消费环境、服务品质、产品品质之相关及差异情形。”^⑧

同时,在后工业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手工业整体开始走向复兴,挽面技艺也在近年来慢慢回暖,甚至有复兴之势,不少现代女性开始选择这种经济环保、绿色健康的传统美容方式。现代美容业也逐渐改进传统挽面技艺,把挽面作为美容的一个环节,使之更加卫生洁净。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兴起一种“蝶式挽面法”,把线缠绕在双手上成剪刀状拔毛,将传统的垂直技法改成平行技法,让挽面技艺重新焕发出活力。潮州的挽面娘也在革新技艺,把传统的面对面相向而坐改为顾客平躺在美容床上挽面,挽面娘进修专业技巧变成现代美容师,也不再用牙咬住挽面线,而是把线挂在脖子上,并戴上口罩。如,潮州的张阿姨就这样改进了挽面技艺,深受顾客欢迎。张阿姨口述:

我在潮州一个印刷厂做工,下班之后业余时间做挽面。我觉得挽面的时候用牙咬线头很不方便也不卫生,我就把线头绑住用一根带子挂在脖子上。另外,我还戴口罩,一是讲卫生,二是防止尘粉和毛发。挽面线会经常割破手指,我就戴指套保护手指。^⑨

综上,挽面作为一种传统的女性民俗,伴随着女性的成长,在女性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寄寓着独特的文化意味,寄托着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塑形,正如有研究者所论:“相对于外在的条文规范而言,生命民俗是柔性的、隐形的,它与女性的一生息息相关,从生育、养育到婚姻、丧葬,这些记录着人生印迹的生命民俗潜移默化地左右和影响女性的思想、行为。”^[12]

通过对潮汕挽面文化历史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以了解潮汕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她

们的民俗角色的,这一生命民俗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潮汕女性,在无形中要求她们怎么做一个贤妻良母。随着时代的发展,挽面已经逐渐淡化了民俗文化的意义,而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容方式,近年来又有复兴之势。

注释:

- ① 口述史料:陈阿姨(1954—),女,潮州市湘桥区人。访谈时间:2014年4月,访谈人:吴岱音。
- ② 口述史料:蔡阿姨(1955—),女,揭阳市普宁县人。访谈时间:2014年8月,访谈人:陈晓燕。
- ③ 口述史料:肖阿姨(1956—),女,潮州市南春路人。访谈时间:2014年7月,访谈人:陈晓燕。
- ④ 口述史料:陈秀奎(1964—),女,揭阳市榕城区人。访谈时间:2014年10月,访谈人:吴岱音。
- ⑤ 口述史料:何志兰(1959—),女,潮州市湘桥区人。访谈时间:2014年4月,访谈人:刘文菊、蔡舒婷。
- ⑥ 张君荧《但求立锥之地》:士林挽面摊贩的民族志研究,国立清华大学,2012年。
- ⑦ 王明典《一个当代台湾“挽面”文化再兴起的探讨》,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2010年。
- ⑧ 尤秀惠《挽脸美容业顾客满意度之研究》,屏东科技大学技职教育研究所,2016年。

- ⑨ 口述史料:张阿姨,约40多岁,女,潮州市人。访谈时间:2014年8月,访谈人:陈晓燕。

参考文献:

- [1] 林长华.“挽脸”美容法两岸共相传[J].两岸关系,2002,(2):48.
- [2] 陈友义,杨萍.挽面:潮汕的传统美容术[J].寻根,2015,(1):44-48.
- [3] 林长华.“挽脸”古风[J].闽南风,2013,(12):36.
- [4] 杨萍.传统美容亮相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J].医学美容(财智),2007,(8):8.
- [5] 施翠峰.风土与生活[M].台中:中央书局,1966.10.
- [6] 陈绍龙.开脸[J].中国老区建设,2006,(4):63.
- [7] 涂明炎.姑娘出嫁要开脸[J].民间传奇故事(A卷),2005,(5):19.
- [8] 方建元.贺小女出花园[J].诗词月刊,2015,(3):16.
- [9] 陈爱丽,陈坚伟.广东普宁地区潮汕人葬礼的伦理特征[J].云南社会科学,2012,(4):25.
- [10] 黄江辉.海韵东山[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138.
- [11] 洪水乾.翔安民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87.
- [12] 毛海莹.构建生命之美: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J].民俗研究,2013,(2):45.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Face – Threading” Custom of Chaoshan Women

LIU Wenju

(Hanshan Nora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00, China)

Abstract: Though the “Face – threading” custom is fading away,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living space in Chaoshan area, and there has been a revival in recent years, with more beauty shops and more customers. Traditional Chaoshan women need to do “face – threading” in some custom occasions, such as coming – of – age ceremony, wedding, a baby’s first month birthday, funer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so on. “Face – threading” is the main folk events in female’ life, which carrying the special meaning of gender culture. There is a distinct female folk culture feature in the “face – threading” custom of Chaoshan women and it unveil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female’s social statu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haoshan culture; Face – threading custom; Female culture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文化研究 ·

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研究

——以 9 家媒体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报道为例

张敬婕, 王雪琪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 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性别研究的框架,对人民网、新京报网、南方网、凤凰网、中华女性网、新浪、网易、搜狐、腾讯这 9 家媒体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报道情况进行性别分析发现,这些媒体尽管对屠呦呦获奖的报道有一定的重视,但是从社会性别角度对报道内容进行议程设置的却并不普遍。媒体对性别议题的表达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设置方式,既有从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角度出发设置的报道议程(即具有性别敏感的报道),也有从一般性的新闻报道程式进行的议程设置(即性别不敏感的报道),也有从歧视性和差别性的视角出发设置的议程(即性别歧视性报道)。除了中华女性网之外,其他媒体对性别议题的报道均存在着性别不敏感的问题,对女性被报道对象的性别凝视,使得媒介对屠呦呦的外貌、衣着、家庭关系过度关注,这种媒介生产与传播模式暴露出媒体对从社会性别角度设置性别议程的重要性还不够重视,也比较缺乏对性别议题予以“性别化”设置议程的意识和能力。

关键词:性别议题;媒体表达;性别敏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62-05

一、研究意义与事件背景

我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于 2015 年 10 月凭借发现青蒿素获得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首位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其所获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不仅是对其个人及团队科学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女性群体

的极大肯定和鼓励。

在屠呦呦获奖之后,各类媒体争相对其进行采访与报道,但一些报道并未聚焦在其获奖对于肯定中国妇女发展和妇女对社会贡献的意义上,而是将议程设置为对其私人生活和外貌着装的关注,一些争议性报道缺乏性别平等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屠呦呦获诺奖所应引发的正面作用。

本文以对屠呦呦获诺奖的报道为例分析

收稿日期:2018-01-02

基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研究项目“媒介性别议题中的‘中国故事’话语研究”(项目编号:2016ZGLH020)

作者简介:张敬婕(1979—),女,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性别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王雪琪(1994—),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性别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

发现,媒体在报道性别议题时,存在着对“成功女性”的刻板化报道模式,有些报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这些报道不仅不利于妇女的媒介呈现与媒介利用,也不利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本文希望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归纳当前媒体对性别议题报道的问题,提出促进性别议题报道的相关建议。

表 1 9 家媒体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新闻报道的数量统计表

媒体名称	人民网	新京报(网)	南方网	凤凰网	中华女性网	腾讯	网易	新浪	搜狐	总计
报道数量(条)	187	14	204	151	49	85	96	150	232	1168

到 1168 条报道文本(见表 1)。

为了更明确地呈现出媒体对性别议题报道的问题,本文对这 9 家媒体报道莫言获诺贝尔奖

表 2 9 家媒体对莫言获诺贝尔奖新闻报道的数量统计表

媒体名称	人民网	新京报(网)	南方网	凤凰网	中华女性网	腾讯	网易	新浪	搜狐	总计
报道数量(条)	942	74	204	497	17	177	126	229	347	2613

屠呦呦和莫言所获奖项属于不同领域,但是二人获奖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非凡的。对比 9 家媒体对屠呦呦和莫言获诺奖的报道可以发现,媒体对莫言的报道总量是对屠呦呦报道总量的两倍多。人民网对莫言的报道达到 942 条,对屠呦呦的报道只有 187 条。凤凰网对莫言的报道量达到 497 条,对屠呦呦的报道只有 151 条。腾讯、网易、新浪、搜狐几家门户网站对两人的报道数量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巨大的数差背后体现的是媒体对这两位获奖者重视度的差异,其中媒体的性别态度和性别意识在背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报道类别与话语分析

各媒体对屠呦呦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于对其研究成果及个人事迹的关注和挖掘,包括对其多年的努力和贡献的回顾,以及其私人生活和成果署名等带来的争议性,对青蒿素研发背景及其成果意义的报道较少。

分析发现,众媒体报道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各网站共一千多条报道中仅标题为“屠呦呦:奖金不够在北京买半个客厅”的新闻就达 101 条之多,不仅是标题的同质化,内容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一篇人物专访被多方截取挪用,

二、媒体报道的议程分析与话语研究

(一)报道数量

本文选取了人民网、新京报网、南方网、凤凰网、中华女性网 5 家有代表性的融媒体和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网站这 9 家媒体,对其 2015 年 10 月 5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间有关屠呦呦获诺奖的报道作为样本进行分析^①,共收集

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性统计。9 家媒体在 2012 年 10 月 5 日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间对莫言获诺奖的报道^②,共有 2613 条报道文本(见表 2)。

有的甚至没有注明原报道的出处。

从总体上看,媒体对屠呦呦获诺奖的报道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八类:第一类是关于屠呦呦获奖的事实性报道及专访(包括社会各界对其的祝贺、屠呦呦的研究历程、获奖经过、获奖演讲内容、赴瑞典的领奖行程安排等);第二类是关注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的关系(围绕“屠呦呦获奖是否是中医的胜利”的论争);第三类是关于屠呦呦的“低调”所引起的争议(包括其获奖与黄晓明大婚所引起的关注度差异的争议,屠呦呦乘机避走 VIP 候机通道、避开领导所引起的争议);第四类是围绕屠呦呦“三无科学家”身份的论争及其落选最高科技奖的争议;第五类是关于屠呦呦获奖的个人与集体之争(围绕“青蒿素的研发是国家集体项目,而诺贝尔奖颁发给屠呦呦个人是否公平”的论争);第六类是有关屠呦呦私人生活(包括其家庭成员、旧居等)的相关话题;第七类是与屠呦呦外貌与衣着等相关的话题;第八类集中在对屠呦呦女性身份的关注。

第一和第二类报道总体上符合媒体对这类报道内容进行议程设置的普遍模式,即围绕屠呦呦获奖的相关信息以及该奖对中医和中国的意义而展开。第三至第五类是各种争议性报道。

第六至第八类报道集中在对屠呦呦个人生活、家庭、衣着和性别身份的关注。

1. 对屠呦呦获奖的事实性报道及专访。对屠呦呦获奖的第一波报道高峰出现在2015年10月5号至10月15号,内容主要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其给予的祝贺与关注,从国家层面对科学进步的关怀、支持等正面评价,表明我国对于科学突破的关注与重视,对于优秀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媒体一致表现出正面积极态度。同时也有大量报道呈现了屠呦呦艰苦卓绝的研究历程,描述了青蒿素这一研究成果被诺奖评委会接受和认可的过程。此外,屠呦呦在获奖后接受了部分媒体的访问,也有大量报道来源于这些访问材料,对其研究经历、成果与获奖感受进行了报道,在访谈中屠呦呦表示“看电视才知道自己获奖”,对获奖“抱以平常心,认为得诺奖是意外也不意外”;并称奖项属于集体。第二波报道高峰出现在2015年12月屠呦呦启程赴瑞典领奖时期,大量媒体报道了屠呦呦一行的行程安排和获奖演说等内容。

2. 屠呦呦获奖与传统中医药的关系。绝大部分报道认为屠呦呦获诺奖是中医药对于现代医学和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并以此反思应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极少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青蒿素的提取纯粹是依靠现代科学的成功。屠呦呦本人表示提取青蒿素的方法灵感来源于中药古籍,并说“中医药是个宝库,但古典中医药不是拿来就能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也表示:“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显然,全盘否认中医药对屠呦呦获奖起到的作用并不客观。在所选样本的全部1168条新闻中136条涉及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的关系,其中仅有3条认为青蒿素的提取纯粹是依靠现代科学的成功,全面否定了中医药的作用。

3. 屠呦呦的“低调”所引起的争议。涉及这一议题的新闻报道数量不多,但引起的网络讨论较多,在所选样本的全1168条新闻中涉及这一议题的共有26条。主要包括屠呦呦获奖与黄晓明大婚所引起的关注度差异的争议和屠呦呦避走

VIP候机通道、避开领导这一举动所引起的争议。媒体对这类争议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于科学家尤其是女科学家难以被媒体聚焦的深层次思考,认为不论报道对象的性格是否低调,媒体都不应该忽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4. 屠呦呦“三无科学家”身份的论争与其落选最高科技奖的争议。所有报道中有79篇与这一话题相关,报道集中于对屠呦呦以“三无科学家”(无院士头衔、无留洋背景、无博士学位)身份获诺奖以及她落选201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该奖被称作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2016年1月8日揭晓的2015年度该奖项获奖人空缺)的事实,并以此展开对中国人才选拔、奖励制度的质疑和反思。媒体报道的舆论焦点是衡量科研的价值应与科学家外在头衔名气无关,与其出身背景无关,与其发表论文的数量无关,最关键的应该是其研究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媒体呼吁国家进一步改善科研机制。

5. 屠呦呦获奖的个人与集体之争。在所有新闻样本中,与这一议题相关的新闻有25条。内容主要是围绕“青蒿素的研发是国家集体项目,诺贝尔奖颁发给屠呦呦个人是否公平”的论争。其中个别声音(4条)认为,这项浩大工程参与人数众多,对于这项成果,需要记住和表彰的人太多了,仅仅奖励一个人有失公允。

6. 屠呦呦私人生活(包括其家庭成员、旧居等)的相关话题。在所有新闻样本中涉及屠呦呦私人生活的报道有256条,数量较多。主要包括对其家人、旧居、日常个性的报道。对其家人的报道主要是围绕其丈夫展开,将其丈夫塑造为一个关怀、贴心、在“成功妻子背后默默付出”的顾家的男性形象;并有部分对其年轻时夫妻两人工作繁忙,因此曾将大女儿寄养在别人家、小女儿送回老家的报道;也有许多深挖屠呦呦家族故事,报道其亲属及故居的新闻。

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丈夫塑造为屠呦呦的“生活秘书”,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强调这一点的反常及“可贵”,这样的报道模式落入了“成功女性”报道的惯用套路。与媒体对莫言获诺奖的报道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巨大的差异。

虽然媒体也有涉及莫言私人生活的报道,如《诺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我是有批判性的》中提及“昨晚,莫言和家人一起在家包饺子庆祝。‘他最喜欢吃饺子了,今晚打算给他包牛肉葫芦馅。’莫言的大嫂王梅棣说。”但整体数量非常少,并没有针对其妻子儿女作大量的报道,并且在报道其获奖的事实性报道中几乎没有对其家人和私人生活状况的描述。媒体在报道成功人士时的差异性的议程设置模式值得深思。

7. 屠呦呦外貌与衣着等相关话题。媒体普遍会报道屠呦呦的外貌、衣着等外在形象。在1168条新闻中涉及这一方面的新闻有128条,超过全部报道的1/10。很多媒体报道其获奖的事实时都会“不经意地”提及屠呦呦年轻时“长相清秀,梳麻花辫”。媒体还热衷于使用屠呦呦年轻时的照片用于报道配图,这体现了媒体对女性报道对象外在形象的一种“凝视”,带有明显的性别刻板意识和性别歧视色彩。

反观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报道,虽然也有部分关注其发表演说及领奖时的服饰,如提及莫言在发表获奖演讲时着中山装,参加颁奖典礼时着西式燕尾服等。但媒体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莫言的中山装服饰是否代表了“民族形象”,而其穿燕尾服是否不伦不类等。在其他对莫言的个人专访中极少出现对其外貌的评价。

8. 对屠呦呦女性身份的关注。1168条新闻中的50条报道的关注点是屠呦呦的女性身份。报道立场主要是屠呦呦作为一个女性科学家在性别不平等的环境下取得成就的不易和对女性能力并不弱于男性的充分肯定。在各类媒体中,中华女性网从这一角度的报道较多较全面,并倡导全社会对女性发展给予关注与鼓励。

三、简要结论与建议

量化分析的结果显示,9家代表性媒体对屠呦呦获诺奖的新闻报道同质化程度较高,新闻报道的内容可以大体分为事实性报道、女性私人生活报道、争议性报道三大类,报道的模式和偏向呈现出一定的性别盲点和性别歧视。

首先,在事实性报道中,对屠呦呦获奖的报道数量远少于对莫言的报道,数量上的差异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男轻女”观念的体现,即男性的成就更易受到媒体的认可与关注。同时,在对屠呦呦的事实性报道中夹杂了许多对其相貌及家人的报道内容,这些内容体现了社会对女性外表和私人生活的“凝视”和物化,即使是已年逾古稀的“成功女性”屠呦呦也不能例外,无论其成功与否、年轻与否,被报道女性对象始终难逃媒体的性别凝视与性别审视。其次,在关注屠呦呦私人生活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的模式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新闻报道将其丈夫塑造为一个为工作繁忙的妻子“补位”,细心体贴、担负起家庭责任、为家庭牺牲的“居家好男人”形象;有大量报道提及我曾寄养女儿、因工作原因与女儿关系不好,塑造甚至歌颂了屠呦呦作为一个“女强人”献身工作、疏忽家庭的形象。当然,男性对家庭的贡献固然值得鼓励与肯定,但是这种“居家好男人”报道模式凸显的却是对屠呦呦没有承担好妻职、母职的责备,强化的依然是女性应该为家庭牺牲的价值观;也复现了女性只有家庭与事业并重才是真正成功的观念。最后,在对屠呦呦获诺奖的报道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争议性的报道,这些争议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对女性作为知识生产者、价值生产者的质疑。诺贝尔奖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声誉极佳、运作成熟的世界级奖项,在选择和颁发奖项时已经对候选人及其研究成果作了大量的调查,奖项的颁发即是对获奖人的充分肯定。而屠呦呦获奖之后的争议性报道或许恰恰反映了社会基于其女性身份而对其能力的质疑。这些具有性别歧视倾向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点,弱化了屠呦呦获诺奖本应产生的积极影响。

从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的角度本研究发现:第一,媒体对性别议题的表达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方式。既有从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角度出发设置的议程报道(即具有性别敏感的报道),也有从一般性的新闻报道程式进行的议程设置(即性别不敏感的报道),也有从歧视性和差别性的视角出发设置的议程(即性别歧视性报道)。第二,无论融媒体还是新媒体,对性别议题的报道均存在着性别不敏感的问题,暴露了媒体普遍对性别

议题缺乏专门设置议程的意识和操作模式。第三,对被报道女性对象的性别凝视常常被演绎为对其外貌、衣着、家庭关系等的过度关注,这种现象正暴露出媒体对性别议题报道时比较缺乏性别观念和性别议程设置能力。

本文建议应加强对媒体的深度研究和有效监管,倡导传媒的性别监测与批评,构建正确的性别意识。具体包括:第一,媒体从业者应在媒体文本制作与传播过程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传播妇女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凸显妇女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调动各方力量推动建立促进妇女发展的立法与公共政策;第二,媒体从业者要培养自身的社会性别意识,在进行新闻报道、编辑和转载新闻时都带着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性别敏感,拒绝使用具有歧视性的新闻内容;第三,媒体机构应建立对性别议题的报道规则,将“性别平等”作为与“新闻真实”同等重要的报道准则加以落实,停止对女性私生活的“凝视”;

避免突出女性单一的角色身份,避免对女性因工作而“牺牲”家庭的赞扬或责备,警惕对“超人妈妈”兼顾家庭与工作进行歌颂的话语。第四,持续不断提高新闻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充分发挥女性传媒工作者制作好性别议题、传播好性别故事的潜力。相关部门要给女性传媒工作者提供更广大的平台,使其能够更好地发出性别观察的声音,推动建立和谐美好的媒介生态和文化舆论环境。

注释:

- ① 屠呦呦在2015年10月5日获得诺贝尔奖,12月7日正式在瑞典发表获奖演说,12月10日参加颁奖典礼,媒体对其的相关报道主要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内。
- ② 莫言在2012年10月5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11日正式在瑞典领取该奖项,媒体报道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内。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Issues: A Case Study of Nine Chinese News Agencies' Reports on Tu Youyou as Nobel Prize Laureate

ZHANG Jingjie, WANG Xueq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online news reports on Tu Youyou's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from nine media (including People.cn, the Beijing News, News Guangdong, Ifeng.com, Women of China, Sina, NetEase, Sohu, Tencent) using content analysi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ender studies. 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although these media did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u Youyou won the Nobel Prize, few of them have covered the story and set the agend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In general, the media set the agenda of gender issues in a diversified way. Some of them covered the story from a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gender justice (news reports with gender sensitivity) while some of them covered the story following a normal journalism way (news reports without gender sensitivity). Moreover, some of the media set the agenda in a way of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news reports with gender discrimin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out that all media except Women of China covered Tu Youyou's story without gender sensitivity. Media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u Youyou's appearance, clothing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gender "gazing" towards women. This mode of 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show that the media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agenda-setting of gender or "sexualization" of gender issues.

Key words: gender issues; media representation; gender sensitivity

(责任编辑 赵莉萍)

网络时代女性掌握信息权力的优势与困境

张玉婷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互联网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全局性、根本性的变革,非物质化、去中心化、低成本化的信息权力将成为网络时代的核心权力,两性权力关系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女性在网络时代获得信息权力的机会不断增多,运用信息权力的途径更加多样,也得到来自多方的网络助力。然而,女性想要在男性话语权优势仍然鲜明、男性主导的价值标准仍然流行的网络空间中争取更多的信息权力,就还需提升自身的信息权力意识和信息素养。

关键词:网络时代;女性;信息权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67-05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与发展,互联网时代已然到来,网络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协作模式,还深入人类的头脑与生活,为社会观念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总体性、根本性变革。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7.51亿,男女比例为52.4:47.6,同期全国人口男女比例为51.2:48.8,网民性别结构进一步与人口性别比例接近^①。中国男女网民人数的接近是否代表着两性信息权力正在均等化?女性在争取和掌握信息权力方面是否具有性别的优势,又面临哪些困境呢?

一、信息权力将成为网络社会的核心权力

“信息权力”概念在1996年由约瑟夫·奈和威廉·奥多斯提出,他们认为,“信息权力,是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方面实力的总和”^[1]。信息权力是伴随着信息时代而出现的权力形式,它既需要依托于现代信息技

术的发展,又将“物质化”为新的信息技术媒介,它承载着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典型的非物质特征。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从国际竞争和国家治理角度,把信息权看成一种“软权力”,信息权力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控制权。

王冬梅在其《信息权力:形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一文中指出,信息权力“是指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或组织的力量,是个人或组织通过信息的有效传递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对他人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力”^[2],她关注了信息权力对“微观层面”的深刻影响,并总结了信息权力的四个基本特征:权力主体大众化、权力对象弥散化、权力行使自主化、权力效应即时化。另外,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把信息权力概括为精神的权力、心灵的权力,他描述的信息权力,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的观念的力量”^[3],这种力量是通过各种象征符号表现出来的,其基础在于人们

收稿日期:2018-01-11

基金项目: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校级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女大学生参政意识的培养”(项目编号:050502080017)

作者简介:张玉婷(1983—),女,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女性权利与发展研究。

在价值层面的认同和接受。

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信息权利”与“信息素养”。“信息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信息特定相关人的信息获取权、信息公开权、信息自主权等与信息相关的利益权利,以及控制信息排除他人使用或获取该信息的权利。“信息权利”虽然与“信息权力”研究对象基本一致,但两种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目的不同。“信息权利”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视角,对于权利与义务两方面进行讨论,关注的是现代信息时代公民因信息问题而产生的利益保护或行为控制问题,而信息权力更关注信息发展中权力的产生、运用和制约,关注“谁掌握了信息权,做了什么”,主要是对现代如何获得和运用信息“力量”的讨论。“信息素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尔·左尔考茨基在1974年提出来,由图书馆检索技能发展和演变而来。这一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体在信息时代的适应与转变,也影响着个体处理和运用信息时方式转变的速度与自身成长的程度。“信息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信息权力”的获得和应用,与“信息权力”密切相关,但这方面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信息时代中一种关键素养的具体表现和提升发展问题,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其带来的社会权力不均问题。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权力,不仅是国家的权力更是民众的权力,它是一个包含了信息制造、获取、发布、加工和汇总等多项内容的权力系统,是基于信息带来的社会影响或凝聚的社会共识而进行价值评判的权力场,是重塑社会权力结构的关键力量。

二、网络时代信息权力的变化

(一)信息权力基础的非物质化

信息权力并非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才有的,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都有信息权力,但在这些社会,信息权力与实体权力息息相关,是基于经济、政治或军事的实体优势,有权力的信息只掌握在少数权威手中,信息的制造、公开和运用主要服务于统治目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权力往往与拥有某种资源相关”,在农业和工业社会,权力与人口、领土、自然资

源、军队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在信息社会,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信息将成为赋权的最大依据。网络社会的权力衍生逻辑正在从“实体权力——信息权力”变为“信息权力——实体权力”。信息权力不再取决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存量,而更多地依赖人们心灵中观念的力量,“它的基础并不在于某种实体机构,而在于人们的价值认同和意义接受”^[3]。

(二)信息权力主体的去中心化

既然信息的力量不再取决于外在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而回归到信息本身,那就意味着信息权力不再是由一个社会角色掌握,而最终回归到人本身。互联网本身就是基于“去中心化”的目的来设计的,其发展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加强技术分化、不断扩大信息、不断创造和湮没“领袖”的过程。网络时代的信息权力不再专属与神职人员、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而是被赋予每一个可以连接网络、在网络上自由表达的靈魂,曾经只能洗耳恭听的信息受众,拥有了信息权力,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2016年以来,微博平台原有“意见领袖”的活跃度下降,男性高知群体流失,当年热捧时政新闻类的“大V”年代已经远去。即便是互联网早期发展中诞生的网络权威的信息权力也被网络无情碾碎,分散八方。互联网构建了“铁打的信息空间”,却只有“流水的信息掌权者”,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生成权力的过程日趋公开透明,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可能握有极大的信息权力。

(三)信息权力行使的低成本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普及,制造、获取、传播和交流信息都变得超常便捷,其产生的信息量也呈爆炸式增长。网络时代一天的信息产生量足以匹敌之前的几年甚至几十年。TECHWEB网在2012年3月发布的《互联网一天》中显示,互联网一天产生的内容足够刻满1.68亿张碟;一天发出2940亿封邮件,相当于美国两年纸质信件的数量;一天的社区论坛上发出200万个帖子,相当于《时代》杂志770年的文字量;在YouTube上传86.4万小时视频,如果不间断全部

播放完需要 98 年。这样的信息生成量不仅意味着信息储存和传播技术的突破,更展现出行使信息权力的便捷与廉价。传统信息传播的途径,如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公共媒体,不光准入门槛高,而且制作和刊印的成本都不菲,不是普通大众可以随时使用的,而成本较低的信件,不论其成本、传播速度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一封可以群发的电子邮件相媲美。互联网让大众信息的发布成本降低到几乎趋于零,这为信息权力的行使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推动力。

三、网络时代女性掌握信息权力的优势

(一) 女性获得信息权力的机会增多

在传统社会中,通常只有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社会组织才能决定大众传播的信息内容,而这些社会组织不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主要由男性掌控,女性诉求被边缘化,如果不寻找男性代言,就很难进入大众视野。然而,现今互联网传播和储存着的大量信息,是可以自由提取和分享的。早在 1993 年《纽约客》杂志就发布了一幅漫画,其配文是“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空间中人的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可以完全分离,从理论上讲,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是由所有人创造并由所有人共享的,信息权力并不会因性别而异。虽然现实的权力层级、物化资本等仍然在网络空间中有着投射和影响,但相较于在传统社会稳定的层级权力系统中“拼杀”分权,女性在互联网中更容易获得更加广泛的信息权力。另外,网络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传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或者说将这两个领域都“去空间化”了,在网络空间中,现实社会的身份特征对建立弱关系纽带、进行平等互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让女性可以越出现实“强联系”的圈子,进入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提升其信息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网络平台中,女性更容易找到女性意见领袖,女性视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女性可以重新审视传媒提供的各类信息,解码大众传媒传递的各种信息,寻找女性独特的言说方式,通过便捷的网络交流与讨论,形成各类关怀互助的社群,使“女性特质”的信息形成与传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女性运用信息权力的途径多样

网络时代的信息权力不同于传统的实体权力,其并不是依托于权威的控制性权力,而是基于信息本身引起的价值趋同感而获得吸引力、感召力和传播力,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信息权力不是一种政治权力,而是信息时代的人权,它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开放的网站、论坛、朋友圈里活跃着各个阶层、各类职业女性,她们正在运用信息权力去扩大就业、积极创业、维护人身安全、进行文艺批判……去全面影响和改造原本的社会权力结构。2016 年阿里巴巴发布的《互联网+她时代:女性创业者报告》指出:目前在淘宝创业生态中,男女电商创业比重已基本各半^[4],早在 2014 年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度会议的女性论坛上,马云就曾说过,“互联网给了自立自爱自强自信的新女性机会,让她们可以与男性一起追寻自己的梦想”。知名母婴电商蜜芽的创始人兼 CEO 刘楠,就是从分享自己为宝宝采购用品的经验,成为妈妈圈里的意见领袖,再到做淘宝店、最后吸引到投资创办蜜芽的。大量女性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感受将传统私人领域无意义的言说转换成信息凝聚力、影响力,进而形成了创造力和生产力。另外,在 2016 年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南方日报》女实习生遭男记者性侵案件以及民生银行女临时工遭男上司微信性骚扰事件中,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为事件得以合法公正的调查处理提供了巨大的助力。2017 年从指控好莱坞大亨哈维·温斯坦性骚扰,到在社交网络上使用“我也是”(Me Too)标签分享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女性们,更是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的群体肖像成为 2017 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这些事件中的女性已经在维权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运用了信息权力,事件的相关信息最初发布在网络上只是个人行为,然而一旦获得民众的关注与传播就能发酵出惊人的号召力,凝聚各类资源,甚至震动传统的权力结构。因此,想在传统权力系统中搏出新天地的女性应当重点关注网络时代的信息权力,将其运用于争取权力、维护权益的广泛领域。

(三) 女性掌控信息权力的助力加大

近年来,不论是官方组织还是网络新媒体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增强男女两性平等观念在网络舆论场中的影响力。2014年2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的新浪官方微博“女性之声”上线,截止到2017年11月,该账号已发微博14000多条,粉丝已经达到了近184万,为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提供了便捷的网络平台。除了全国妇联,各省市的妇联组织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自由微博账号,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服务和教育女性的工作。除了这些官方妇女组织的网络助力,大量非官方的妇女组织、网络传媒也加入女性网络信息制造和传播的阵营,积极倡导和促进女性权益,推动性别平等。早在2004年11月,新媒体女性网络就在广州成立,还有“女权之声”、《婚姻与家庭杂志》《中国妇女》《中国妇女报》等的微博和微信平台,这些民间组织、女性媒体和各类女权主义者通过网络平台倡导性别平等,致力于改变文化偏见,承担媒体性别监测工作,把社会性别纳入传播主流。这些网络平台的建立与发展为当代中国女性获得和运用信息权力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有助于女性运用信息权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网络时代女性争取信息权力的困境

(一) 男性话语权优势的网络植入

互联网不光给予了女性开放的信息空间和获取信息权力的机会,也提供给男性以同样甚至更多的可能。男性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一直是显而易见的。《2016年中国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在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低30%以上的4个行业中,就有影视媒体和移动互联网行业,在这两个行业中,高薪技术岗位主要由男性占据,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加长,工作经验带给男性的薪酬回报率远高于女性。这意味着长期运营和支持网络的控制技术和管理系统都是由男性主导的,虽然他们为了赢得女性消费者的好感会把网页设计成粉红色或鼓吹“男色”消费,但也会在支付宝开发的“圈子”里把“校园日记”“白领日记”这种充满性幻想的社交可能,特供给信用积

分750以上的男性用户,甚至在借贷宝里发明针对女大学生的“裸贷”业务,让女性直接成为消费文化中的创意商品。同时,网络传媒中,从来也不缺乏对“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两性规则的怀念和推崇,甚至存在大量自由的“厌女情结”的表达。传统社会中男性的话语权优势伴随着男性的科技优势一起,在网络空间中复制着男性主导的信息模式,影响着成长于网络中的新一代。

(二) 男性主导的价值标准对信息价值的误导

网络空间中大量符合男性审美的信息不仅提升了男性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话语优势,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网络信息价值的判断。“如果科学知识在其发展方向上,甚至在意义上是依赖于社会与政治力量的,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性别’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扮演着如此重要角色的力量,肯定在科学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5]虽然在网络传媒中女性改变了被“观看”的处境,有了“是否被观看”和选择什么被观看的自主权,但是很多“看点”的审美仍是男性化的,不论是“网红脸”的流行,还是对“魔鬼身材”的炫耀,不论是“纯情萝莉”“贤德淑女”,还是“诱惑熟女”,无一不是迎合男性审美和消费需求的信息制造。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众多的网络主播在各类网络直播平台中制造着五花八门的声像信息。中国新闻网2017年1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网络直播的主播中73%是女性,而观众中53%是男性,占44%的直播内容是“泛娱乐”化的^[6]。可见,即便是在网络中,仍然有大量女性是按照男性的标准在塑造和展示自己,其发布和传播信息的目的还是“吸引男人”。大量此种类型的信息的广泛传播将会引导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顺从这一趋势,基于利益或情感的需要去按照“传统”改造自己,她们传播的看似是个人选择、独立观点,实质上只是一种“伪觉醒”,只会进一步强化男性在网络空间中信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女性想要真正获得信息权力,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女性的真实诉求,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符号,寻找自主表达的内容和方法,自尊自

爱,而不是一味地渴求男性的肯定与观赏。

(三) 女性信息权力意识和信息素养的不足

在信息赋权的问题中,很多学者都会提到“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问题,它代表着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和障碍,这一鸿沟不仅出现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和阶层之间,还出现在性别之间。在这个信息权力意识觉醒的时代,只有首先唤起女性对信息权力的认识和重视,才能提升女性信息素养,使其充分获得和合理运用信息权力。但是目前来看,在信息权力问题上,很多女性可能还处在不自知的状态,这本身也是其信息素养不足的表现。2013年福克斯关于男性和女性使用 Facebook 情况的调查中指出:虽然拥有 Facebook 的女性网络用户占 72%,而男性只占 62%,但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时事和政治信息,而女性更关注消费和美容等信息,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加频繁地转发别人的信息,总转发人数中女性用户占比高达 62%^[7]。这表明女性仍然更关注私人兴趣和传统女性话题,对网络开放的公共领域关注有限,而且更习惯于接纳别人的观点,并不乐于制造话题、发布有创建的信息。信息素养的提升取决于对信息的鉴别和批判能力,而女性在这方面的“温和”表现,说明众多女性都在无视争取信息权力的重要性,这极不利于女性掌控和运用信息权力。在网络

时代,女性要把握发展机遇,关注女性信息权力问题,一方面使女性充分利用享有信息技术的福利,促进信息时代女性力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推动互联网时代两性关系更加平等与和谐。

注释:

- ① 数据源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7年8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参考文献:

- [1] 李川川. 国际政治中权力变移与信息权力内涵分析[J]. 改革与开放, 2014, (4): 45.
- [2] 王冬梅. 信息权力: 形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 (4): 57.
- [3] 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J]. 江淮论坛, 2011, (5): 17.
- [4] 袁梦佳. 互联网激发女性力量[N]. 中国妇女报, 2016-09-03.
- [5] 刘介民. 科技与性别: 哈拉维赛博理论与女性主义[J]. 东方丛刊, 2009, (4): 145.
- [6] 一张图了解“全民直播时代”[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1-06/8115461.shtml>, 2017-01-16.
- [7] 杨晶, 吴文艳. 论网络舆论中的女性话语传播地位——“从成都女司机事件”谈起[J]. 新闻知识, 2015, (9): 16.

Women's Strengths and Dilemma in Mastering Information Power in the Internet Era

ZHANG Yuting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about overall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to human society. Non-materialized, decentralized, low-cost information power will become the core power of the Internet era. There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get information power in the Internet era are increasing, and the ways of using information power are more diverse, and they also could get help from multiple networks. However, Internet is still a male dominated and male value orientated space. If women want to gain more information power, they need to improve their own information power awarenes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Key words: the Internet era; female; information power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文学研究 ·

性别与家族历史书写

——以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为中心

马春花, 于安琪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家族历史书写是199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之一,诸多女作家也汇流其中,她们对女性边缘历史与历史边缘之族群的关注,为历史书写提供了别一性别的样貌。以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与《伤心太平洋》为中心进行分析发现,这两部作品对其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的历史书写具有独特意义。通过追寻母系家族脉络,考证边缘父系历史,王安忆在填充女性历史“空白之页”的同时,也瓦解了大一统的父系主流历史叙事,使女性和边缘族群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王安忆;母系历史;边缘父系历史;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72-05

历史叙事一直由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所构建,男性被表述成历史真理的起源和主体,而女性则被放逐于历史之外,成为历史中缺席的他者,女性历史也呈现为“空白之页”的状态。但是女性历史所呈现出的“空白”并不能够得出女性无历史的结论,而是一种被历史叙事主体/男权社会有意忽略、边缘化的结果^[1]。男权历史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意识的沉淀已成为标准,女性基本被排斥在男性文化的视野之外。

1990年代以来,在大历史书写中表现个人生命存在、体验及其意义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特别是对于一批崛起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来说,这个时期社会转型的完成、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引入以及重写历史的冲动,使其个体的自

我经验在历史书写中重新获得了意义,新家族历史小说或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即是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与男作家解构革命宏大历史以重构新的(男性)个人主体历史有所不同,女作家则更多的是“探索妇女的角色、身份的复杂性,探索由种族、性别、阶级所决定的妇女角色和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2],自觉地从性别角度思考历史,对于“地表”之下的女性历史与边缘族群历史的叙述显示出迥然不同于主流男性历史叙述的性别和价值立场。

王安忆是这一家族历史写作的代表性人物,在她笔下,“个人不再只是纯粹的现实的物体,而是交融着历史体验与历史记忆的生命个体”^[3]。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伤心太平洋》与《纪实与虚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马春花(1972—),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于安琪(1994—),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构》，前者追寻来自“太平洋”的边缘父系家族历史，后者则将母系家族历史上溯至柔然边疆，将中心与边缘、个人与历史、女性与国族间的认同与冲突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并建构起历史边缘与边缘历史的别一历史叙事。

一、此消彼长：“父”的去势与“母”的提升

在历史进程中，男性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现实法则及其合理性，他们所表现出的力量与智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而居于从属边缘的女性则以软弱无力、浅薄无知的形象缺席了历史的创造。“她是附庸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4]而王安忆的历史书写则明显地颠覆了传统男强女弱的历史角色的既定模式，《纪实与虚构》中的外公抛弃家庭，置年迈的曾外祖母和年幼丧母的母亲于不顾，是不负责任的浪子，“外公弃家而走，是中断我们家历史、割裂我们家社会关系的关键一着，从此，旧的一页翻过去，新的一页展开”，而展开这“新一页”的是极尽各种办法抚育母亲的曾外祖母，“她是努力使我们家历史堂堂正正往下写的一人”；《伤心太平洋》中父亲家族中的男性形象也不再是强有力的历史开拓者，甚至几乎都不是正面人物，“我们家的男性全无宗教始终如一的素质，他们随心所欲，意志脆弱，还有那么一点儿莫名其妙，使我们家陷入混乱”，爷爷的猜忌暴戾、父亲的漂泊不定、叔叔的浪荡软弱为家族和女性带来的只是无尽的苦难。而作为女性的曾祖母则“是我家功臣一般的人物，她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此后奶奶、婶婶、堂姐三代女性又相继支撑起家族延续的重任。

在王安忆书写的父亲家族史中，女性不再是喑哑无声的男性历史附属物，而是开创和推动家族历史发展的关键性角色。女性形象的坚韧顽强、果敢有力与男性形象的软弱怯懦、粗暴无常形成鲜明对比，置换了男性作家所塑造的两性镜像关系。伍尔夫曾用镜子来隐喻女性的他者位置：“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是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使男人在与女人的比照中获得优越感和自信心。”^[5]男性将自我向女性投射，是

一种通过作为女性的他者想象理想实现的心理机制，由此而知，女性他者的性别位置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强制给定的，而在王安忆处这种两性间的位置发生对调位移，女性不再只是映衬男性形象的工具，反而由男性承担了镜子的角色，成为一个凝缩了存在意义的镜像，软弱怯懦的男性映照出的是女性的坚韧顽强，在将男性界定为他者的同时树立起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

除了两性角色既定特质的对调外，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还采取了使父亲“缺席”的叙事策略来弱化男性、强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历史地位。在叙述“我”作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史的部分，母亲作为权威的家长形象出现，对“我”成长过程中的言行给予规定和指导，“我的恶作剧对象总是父亲，母亲对我是教育的化身”，家庭中与外界的社交也都是基于母亲的人际关系，而传统意义上家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父亲，仅仅作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概念式角色，在提及“父母”时象征性地与母亲并列出场。在这个成长故事中，更多的是展现母亲对于“我”成长的影响，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中的重要伦理角色，父亲具有管理、教育、保护家庭成员的权力，而且作为权威的化身，上升为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代言人。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父亲之名”是象征秩序的核心，“作为纯粹的能指是一切约束性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对主体来说，是既定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服从的一种标志”^[6]。

“无父文本”的策略消解父权等级制对女性成长过程产生的影响，在完成对父权制的驱逐后，女性通过写作获得铭写自己成长的权利。作为生育工具或欲望对象的母亲角色则更多的是在父亲的背后，与儿女一起服从管训或作为父亲的“助手”传达着他的旨意。王安忆颠覆性地将至高无上的家长身份置换为母亲，排除了父权在家庭和社会中所代表的至高的秩序体系，瓦解父亲的权威性和绝对性，而使作为母亲的女性承担起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象征权力，家庭的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被移至

母亲身上。在父亲“缺席”的叙述中,被解放的不只是女儿,处在边缘附庸位置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影响也同样得到强化。

无论是贬抑还是缺席,这种对男性“去势化”的书写模式无疑都破坏了正统宗法父权文化下男性主体的完满和理想化特征,在他者关系中生成的女性主体在男性的传统权威和历史地位被否定后,才能在此消彼长的两性位置动态变化中获得更大的文本空间建构主体意识,并进一步从压抑中的历史边缘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和书写权力的中心。

二、破而后立:男权神话废墟上的历史重建

与男性寻根作家进行家族史书写时尽力挖掘家族的辉煌历史,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树立起家族、民族的自信的策略不同,王安忆呈现的父亲家族历史则是一个衰落难振的过程,显示出她对于那种不容置疑的父权中心历史的审视。小说题目《伤心太平洋》中的“伤心”二字就显现出了与其他强有力的家族史书写迥异的哀愁、无力的氛围,这样的表述完全悖离了以往家族史负荷着启蒙及道义的权力感。而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父亲家族所处地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仅为东南亚一隅,时刻面临着沉没与冲击的小小岛屿也无法与创造了强大而稳定的历史文明的民族相联系。小说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战争环境中家族的衰落与民族的苦难一脉相承,祖父由被委以重任到黯然离职,家族成员由人丁兴旺到漂泊四散,曾经兴盛殷实的家族随着日本军队的入侵而尽显颓势。小说由父亲流浪的线索架构起来,父亲作为父系家族的象征,他的漂泊不定也象征着父系家族的衰败难兴,男性作为历史主宰者的权力话语在由盛转衰的过程中逐渐失效。王安忆在这里粉碎的不仅是“父”的象征秩序,同时也是中心之“父”的历史,那种基于男性自身想象而建构的强力的男性历史镜像在女性视域的写作中碎裂,其不再呈现出牢不可破的权威面貌,王安忆在破除了男性经典叙事的历史神话的同时,“历史”之下的女性得以“浮出地表”。

“对于母系社会的‘历史记载’只存在于尚有宇宙观而无历史观的洪荒时期,女性所面临的历

史尴尬是:既有的历史文本遮蔽、涂改并消解着女性历史的‘本体性’。”^[7]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将镜头对准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的女性,企望展现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围困下不被纳入观察视野的历史本相。在父权制的历史语境下,孩子被冠以父姓以象征血脉和身份从父亲处继承而来,家族历史由父亲处向上追溯的路径也无可非议。而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不是对父系/王氏家族追寻,相反是对母系/茹氏家族的溯源,对于母系家族的情感态度表现在小说中,是对母系家族历史的认同和皈依。而“父亲来自很远的地方,早已与他的家断了消息。对于他的身世,他是一问三不知,他就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直到遇到我母亲,有了我,他才开始有了历史。”不仅是“我”,就连父亲的历史也是由母亲、由母亲的家族所赋予的,王安忆对于母系家族历史的记录不是将父母家族历史并置的笼统把握,而是抽离出与父亲相关所有内容,专注于搜寻散落在“父”的历史宏章中的“母”的意义。

《纪实与虚构》在奇数章节母亲家族历史的追溯中嵌入偶数章节的个体女性成长经历,个体女性琐屑细微的成长经历与严肃恢弘的家族史彼此交织,自我成长和家族历史演进不分高下地一同连接起王安忆的寻根愿望。王安忆使典型的女性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高的历史写作并置,是对于女性和女性写作亚文化地位的提升。在奇数章节中,王安忆对茹氏家族历史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长线追踪,从北魏一直写到当下,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呈现战争、夺权、流亡、迁徙等多种历史话题,与其说这是茹氏家族的历史故事,毋宁称之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变迁,显示了王安忆誓要为母亲家族铭刻历史的决心。她将家族的起源追溯至北魏时期的柔然部落,这是一个来自北方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即使被贬为堕民也显示出其不肯屈服的强硬品格,以此作为构建茹氏家族强大有力历史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虚构给了王安忆为家族历史注入强力的空间,她私心地使柔然部落与蒙古部族合二为一,认成吉思汗为宗,分享其征服中原的功

绩;明知追寻的线索可能出现了偏差,还是“将茹棻编进我母亲家的历史,其中所有的矛盾我都将努力地解决”,强行将状元拉入母亲家的历史以光耀门楣,以此虚构出一段强大的茹氏历史。

王安忆用虚构的形式尽力装点着母亲家族的历史,有意识地将其提升到与传统男性中心历史同等的高度,在破除了男性历史神话的基础上,建立起女性的巨型历史。父系历史的衰落与母系历史的强大,在一破一立中,终结了男权历史作为“元历史”的唯一合法性,压抑和掩盖在看似天经地义的男性中心下的女性终于作为主角登上历史的舞台,女性历史的“空白之页”也开始被填上文字。正如王德威所言:“王安忆不仅写作品如何再生历史,还写历史如何滋生抽象意念。由此类推,她滔滔不绝的议论,就算无甚高见,确实要以丰沛的字质意象,填补男家史作家留下的空虚匮乏。”^[8]

三、女性边缘发现下的双向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女性历史的“空白之页”,然而这种填补确乎是存在着限度的问题的。《纪实与虚构》中大笔挥写出的茹氏历史的确是为母亲的家族作历史正名,然而再向上追溯,母亲的姓氏也是从她的父亲处继承而来的,用尽心力追寻的“她”的历史本质上还是“他”的历史。同时,王安忆将个人家族史提升到气势如虹的民族史的宏大状态,而女性在这种宏大历史中只能委身于缝隙之中,“对于女性的寻根,一旦超离了生者的记忆,超离了口头的流传,而必须进入文字的历史,它便只能演化成经典的男性与权力的历史。”^{[9](p233)}在历史传统与男权语境下,女性主体的历史意识是女性历史建构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这个层面来说,母系历史的书写意识和实践行为比具体的书写过程和成果更具意义。

建构母系历史或许并非王安忆写作所追求的终极意义,在早期的女性历史写作传统中,通常会强调女性作为政治化的公民主体或阶级主体介入历史,从丁玲到杨沫,参与到宏大历史场景中以收获主体感的史述方式一直在延续着。1990年代性别成为审度历史的一个向度,女性的

历史书写与崇尚入史入仕的叙事传统有了很大差异,表现为女作家对她们曾参与构造的宏大叙事的反思和重述,王安忆的这种反思重述主要通过边缘发现得以实现。除却为处于历史边缘的女性正名,她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中,无论是父亲家族迁徙而去的东南亚岛屿还是母亲家族溯源而至的北方游牧民族,均非传统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正统血脉,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她书写的历史都是边缘地带的历史,这样的边缘发现绝非偶然,而是刻意拒绝进入汉文化的宏大体系中,这种拒绝“萌生出自我解构的力量,一种极为内在而有力的边缘化倾向,一种新的话语建构与话语空间”^{[9](p234)}。她试图从两个向度对历史真相进行揭示,将镜头对准处在历史边缘的女性,是对父权制下男性主体历史书写空白的填补;而所处边缘地带的异邦异族的历史,则作为另一种资源在大写历史的内部进行着修正,挑战的是大一统历史的中心主义,历史的边缘和边缘的历史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两个向度上冲破了父权制大一统的民族/国族历史的藩篱,宏大的历史整体被裂解祛魅,崩落成无数个零散的“他”和“她”的历史,组成宏大历史图景却曾经淹没在公共叙述中的零碎的历史片段浮出,呈现出建立在个体日常基础上具有精神向度的另一种历史真实。

王安忆之所以能够成为边缘的发现者,固然与她实际的家庭背景相关,但更多的则是得益于她女性作家的身份。男性作家基于性别所产生的男性视域,与传统历史书写所谓的公共视域不谋而合,在获得了支配、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的他们看来,现有历史的“本文”对应的就是历史的“存在”,作为男性中心主义历史话语现实秩序内部的参与者、当局者,男性作家是无法体察到这种看似是天经地义的历史书写方式中边缘的缄默;而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作为历史中的“他异因素”对边缘存在着切身体悟,身处男权历史的连续性的空白和断裂之处,女性作家才能以“旁观者清”的经验结构发现和揭露在历史叙述中被虚构和修辞所藏匿的性别政治和中心主义。

王德威曾将在中国大陆边缘地区的华语写

作和华语写作中边缘地区的视点投射现象以“华夷风”来概括,他提醒华语写作中的话语想象:“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中国,但不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国。”^[10]如果说王德威强调的“华夷风”是在空间意义上的地域角度消解汉族/中国中心主义,王安忆对其的消解则体现在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层面,剥除优位性和在地向心性统摄的历史话语后,历史书写中的“遗”和“夷”作为可与男权历史等量齐观的历史线索,在她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获得了重新定义,而她通过历史写作实践传达的是:看似以整体性状态存在的历史并不是致密不可分的,大一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书写历史的唯一通道,更不是历史真相的唯一面貌。

参考文献:

- [1] [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1-187.

- [2] [美]朱迪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05.
- [3] 周新民.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王安忆近期小说中的“个人”[J].小说评论,2003,(3):40-45.
-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 [5]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41-42.
- [6] [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419.
- [7] 王侃.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
- [8] 王德威.中国小说二十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6.17.
- [9]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0] 王德威.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1):5-17.

Gender and Family History Writing: A Study of Wang Anyi's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and *The Sad Pacific*

MA Chunhua, YU Anqi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family history writing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noticeable literary trends. Many women writers participated in describing women's marginal history and marginalized ethnic groups, which provides a different gender perspective for history writ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Wang Anyi's novels *Documentary and Fiction* and *The Sad Pacific*, exploring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her writing in seeking the maternal family and the paternal family history. Through her writing, while filling out the blank in women's history writing, Wang Anyi disintegrates the grand and unified paternal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 making women and marginalized ethnic groups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s of history writing.

Key words: Wang Anyi; maternal history; marginalize paternal history; gender

(责任编辑 赵莉萍)

女性主义的“突围”与自由抉择之可能

——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的女性意识

刘维春

(西安文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在传统的礼教中,女性一直是被男性对象化、奴役化的工具。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作为先秦女子不畏封建礼教束缚,大胆追求婚恋自由和性解放,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制度,走出了女性被动的境地。芈月与黄歇、秦惠文王和义渠王的三次婚恋极大地挑战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必须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而其与义渠王的自由同居与晚年和男宠魏丑夫的公然欢愉则彻底颠覆了“性道德”“性禁区”的礼教观念。

关键词:女性主义;芈月;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77-05

女性意识作为女性主义的关键词,“是指女性独立自由、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助的平权意识”^[1]。《芈月传》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的电视剧,讲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一位在楚国受歧视的公主如何变成秦国八子,继而成为秦国太后的故事。《芈月传》着墨于先秦,以战国末期(前4世纪~前265年)为时代背景,通过对芈月这一特殊角色的塑造和解读,阐述了一个不甘人后的女性,在大争之世寻找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天下位置的大历史故事。芈月作为电视剧中的核心人物,不仅有着独立的女性意识,打破了封建传统的束缚,而且成功实现了女性主义的“突围”和婚恋的自由抉择。尽管《芈月传》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但真正敢于向男性权威挑战的只有芈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芈月所实现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突围”在本质上

是个体的“突围”,婚恋的自由抉择也是个体的自由。

一、“突围”与自由抉择之历史背景

《芈月传》中女性主义式的突围和自由选择可能是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妇权制逐渐进入到父权制,而妇女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经历了一个由崇高的母权制逐步沦落为男权附庸的世界性失败。处于人类社会初期的先秦社会的妇女地位也不可挽回地在历史的大趋势下一落千丈。

先秦时期女性的地位呈总体性下降。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劳动产品没有剩余的时代,由于男子的狩猎工具落后,狩猎活动极不稳定,而妇女所从事的原始农业劳动收入较为可靠。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维系整个氏族生产的同时,

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劳动,女性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尊敬。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逐渐显现其优势,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而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则降到第二位。正如恩格斯所说:“‘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富,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2]虽然女性的家务劳动仍不可或缺,并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同之前相比这种劳动已经不再是社会的支配性劳动,而变成一种辅助男子劳动的私人事务。劳动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妇女不再占据崇高的地位,并开始沦为男子的附庸。妇女地位的下降,除了劳动中地位的变化,还包括生殖优越感的丧失。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作用。在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类生命的脆弱使得人自身生产的妇女生殖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殖不仅是女人单方面的行为,也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行为,甚至主要是男人的行为。否定女性生育权的优势,是男性从根本上降低女性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样一来,男性不仅在物质资料的劳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人类自身的生产中也成为了主要角色。此外,宗法制度的成熟和周礼对性别关系的不断强化,使先秦妇女逐渐被对象化、工具化。

封建礼教的初成。西周政权为了从政治上维护宗周的分封制,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建立了囊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的周礼。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夺取统治地位,又提出加强专制统治的要求,对女子的要求也进一步严苛。韩非子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的宗法思想,这一思想后经儒家整理进一步发展束缚女性精神锁链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从而把妇女以伦理道德的名义禁锢于家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

娃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尽管先秦时期加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制约,但这一时期毕竟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还保持着母系氏族制的残余,礼教宗法也尚处于初成阶段。也就是说,虽然男子已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但妇女尚未被完全排斥。换句话说,女性没有完全沦为男性的依附工具,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尽管女性参政的程度、范围远不及殷商时期的妇女那么深入和广泛,但先秦女子对国家政治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社会经济活动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而且经营有方发家致富的商贾。此外,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禁网也较为疏阔,正如《诗经》中经常描述的男女自由相恋的事例一样,女性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得到表达的。

二、冲破礼教的爱情观:婚恋自主

受时代背景影响,尽管先秦的女子无婚姻自主权,女性不允许擅自婚嫁,婚姻需遵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但由于当时礼教初成,相对松弛的婚姻制度以及妇女还未完全被禁锢于礼教的事实给男女婚恋提供了自由之风。正因为此,半月才能冲破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幸福。《半月传》中半月在婚恋观上的“突围”与自由抉择主要是通过她的三段爱情经历表现出来的:与黄歇青梅竹马的笃定;与秦王嬴驷志趣相投的举案齐眉;与翟骊荡气回肠的敢爱敢恨。

同温润如玉、彬彬有礼的楚国公子黄歇的恋爱是半月人生的第一段爱情。黄歇出身名门世家,学问精深,才华横溢,从小就是屈原的弟子,是太子的伴读。半月同黄歇相识于半月厨房偷糕,相恋于波折的楚宫生活。半月每次进退两难或生命攸关时刻的黄歇出手相救使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浓。当他们的爱情遭到威后的强权反对后,半月并没有妥协,而是不惜作为陪嫁的媵侍同黄歇一起私奔。从这里可以看出,半月作为王室女子并没有在当时所谓的“礼”面前屈服,而是大胆追求着自由的爱情,为爱而不顾一切。半月对传统爱情观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对爱情的自主

上,也体现在对爱的忠贞上。当误以为黄歇身亡后,她并没有匆匆了结这段恋情而开始新的爱情,而是把这份感情深深埋藏于心中。半月尽管为救弟弟魏冉不得已想委身秦王,但她对黄歇的感情却没有减少。在秦王嬴驷的关心和爱护下,半月慢慢打开关闭的心扉,开始述说同黄歇恋情的过往。最后在秦王的帮助下,重新埋葬了黄歇的物品,同时也把自己的这段感情埋进了坟墓。

半月的第二段情感开始于秦国。与青梅竹马的第一段恋爱不同,秦王嬴驷是半月婚姻中的夫君。尽管这场婚姻本身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但半月并没有就此认命,而是打破了传统婚姻中的男女权利不对等,毅然从后宫走向前台参与到秦惠文王的政治决策中。在同秦惠文王的这段婚姻生活中,半月展现了不同于同时代女性的一面,她建言献策,并协助秦王批阅奏折。在同秦王讨论诗书、时政和江山社稷中取得了相对平等的夫妻关系。从两人同宿,一起在宣室殿看奏章,到两人同行,四方馆内取各派之精华,半月获得了成熟稳重、明察善断的秦王的尊重。作为丈夫,夫秦王不仅尊重半月的第一段感情,而且尊重她的一切选择。当黄歇再次出现时,秦王并没有用手中的强权对两人的相见甚至私奔进行阻止,而是一切让半月自主选择。这是秦王与半月相爱的体现,但更体现了半月冲破传统婚姻束缚,争取夫妻权利平等的成功。秦王待半月如父如兄,正如半月自己所言,“若没有秦王,半月始终是个见识普通的小女子”。在秦王经年累月的熏陶培养下,半月眼界不断开阔,知识日渐积累,这为半月女性意识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基础。

半月的第三段感情更将其女性意识的特质体现到了极点。半月与义渠王翟骊相识于劫持王后的车队,可谓不打不相识,秦王死后,翟骊又多次救半月于水火之中,最后,在长生天的见证下,义渠王以臣子的身份与半月相结合,而半月则以秦王遗孀和国母的身份再嫁。翟骊作为大秦的臣子常年为秦国领土的扩张而征战,作为半月的爱人则与其相伴长达数十载。在这段婚恋中,半月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取得了婚恋的自主权,也突破了女性的贞操观念,从

而赢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如果说与义渠王的敢爱体现了半月对婚恋把控的女性主义意识,那么面对义渠王瓜分秦国要求时的敢恨则体现了她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而大殿厮杀之后,义渠王死前的那句“月儿,你说过要取我性命,我得帮你啊。”让半月和义渠王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在这段婚姻中,义渠王用自己的死成全了半月,用他自己的方式守护了他们的爱情。

三、绝异当代的贞操观：自由的性解放

先秦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成熟,周礼对女性的贞操观也不断强化,使先秦妇女逐渐被对象化、工具化,恭敬顺从地从夫、从礼,不敢越雷池半步。半月在贞操观念上的“突围”不仅在于她敢于冲破传统的再婚再嫁,更在于她绝异于同时代女性的性解放。半月自主自由的性解放既体现在大秦朝堂之上与义渠王的同居,又体现在晚年和男宠魏丑夫的公然欢愉。

从燕国回到秦国,成为宣太后的半月在秦宫公开与义渠王同榻而眠。面对大臣和宫人的质疑,半月毫不避讳地回答道,“他嫖我寡,天经地义”。面对儿子嬴稷的不理解和逼迫,半月毫不让步并命嬴稷面壁思过。义渠王受伤后,半月放下自己太后的身份在寝宫里服侍他。在得知自己怀有义渠王的孩子后,半月并没有畏惧朝堂上下的闲话和臣子们的反对,而是在庸芮的帮助下,在朝堂之上公开宣布自己怀孕之事。为了让大家默认她和义渠王的事实,给孩子合理的名分,半月在朝堂上竟然坦然宣布是数月前梦见先王,梦里与先王交媾孕育子嗣。应该说,此时的半月不仅完全冲破了传统礼教对女性贞操的束缚,而且实现了性解放。在传统礼教中,女性根本没有性自由,女性的性权利只被限制在婚姻之内,非婚性行为和非婚生育都被禁止,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半月和义渠王的婚姻虽然有长生天的见证,为义渠草原人所接受,但这样的结婚模式却不被秦人认可。他们在秦朝宫殿长期同居的事实本身就是对当时传统观念的极大挑战,更不用说半月把怀孕之事公布于公堂。在男权社会里,半月不畏当时的宗法制而大胆追求性自由的行为,不仅为她赢得了做人应

有的尊严,而且颠覆了当时的“性道德”“性禁区”,走出了被动的境地。

半月的女性解放,在她与魏丑夫的关系中更加可见一斑。魏丑夫是庸芮为公子柱挑选的伴读,因其长相酷似初恋爱人黄歇,半月把他留在了自己的椒房殿。丑夫一方面作为黄歇的替代品缓解了半月的孤独和相思愁,另一方面,他实则是半月的男宠和性工具。当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半月作为秦宣太后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性行为中,女性只能以“性的对象”出现在性行为中,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正如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所说,“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4](P92)}。在宗法礼教中,女性从小就被告知,性带给女人的只有痛苦,对性感兴趣则是邪念。半月和魏丑夫的关系完全颠覆了传统秩序,半月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等待播种”的状态,而是以主体的身份享受性生活的快乐,拥有了魏丑夫的身体和性,而作为男性的魏丑夫则成为性关系中被玩赏的对象和工具。拥有性自由的半月不仅向剥夺女人性权利,束缚女人性自由的传统贞操观提出了挑战,更彰显了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享受性的权利。

四、个体的“突围”与大众的屈从

尽管《半月传》中的半月有着现代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当下社会人们追求男女平等的诉求,但与众多同时代的女性相比,这种意识和诉求只限于半月的个体表现和行为。相对于个体的“突围”而言,当时众多女性则更多地选择认命和屈从。且不说葵姑、玳瑁等任劳任怨的女性形象为礼教制度下的女性树立了很高的标准,单是半姝、孟嬴等女性对男性的无条件遵从就体现了女性大众的屈从性。

个体的“突围”。虽然半月成功挣脱了女人的命运只能由男人决定的牢笼,但这种挣脱之力相对于整个时代的黑暗而言显得太微弱。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男权社会为女性构建的标准以及“合理”的道德行为规范使

女性始终处于“第二性”的被动地位。的确,半月的个性和从小的经历使她形成了独特的女性特质,走出了波伏娃意义上的“第二性”的被动地位,但半姝、孟昭氏、唐夫人、魏夫人、樊长使等众多女性虽然努力抗争,但现实中对男性的屈从,从大众的层面说明了半月的“突围”如流星闪现,是个体的“突围”和自由。这种个人的女性主义式的“突围”和自由抉择既不能将女性意识保持和传递下去,也不能摆脱女性被男权统治的状态。换句话说,半月女性主义式的个体“突围”的表象背后深藏着众多女性自由选择的不可能和对男权社会现实的无奈屈从。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女性主义的突围是女性群体对男性群体统治的摆脱和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进而实现男女两性的彻底平等。在《半月传》中只有半月始终秉持自己的初衷并意识到身为时代女性的人生价值,成为了最终赢家,半姝等其他女性则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话语权,终其一生都囿于“他者”的处境,落得子亡亲离,成为新的男权守护者。

大众的屈从。《半月传》不仅突显了半月的女性意识和个体的“突围”,而且展示了众多女性因“去势”并缺乏女性意识而对男权社会的绝对屈从。《半月传》中女性角色虽多,但大多女性在生活中都如履薄冰,即便是处事心狠手辣、霸权独断的楚威后,面对丈夫也小心翼翼,恭敬顺从地从夫、从礼。女性主义作家杰梅茵·格里尔在《女太监》一书中说到,“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便获得女性气质”^{[4](P28)}。可以说,《半月传》中的大部分女性是被“去势”并被男权所建构的。当然,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既有男性对女性的建构,也有女性对女性的建构。如:葵姑和玳瑁以侍女的身份被男权社会建构推崇为甘愿牺牲自己的母性形象。葵姑作为半月的守护者弥补了半月缺失的母爱,最终为救半月的儿子嬴稷而亡。玳瑁作为楚威后的托付者,一直以母亲的责任悉心照顾陪伴着半姝,最后为保住半姝的王后地位不惜以身试法。半姝作为楚国的嫡公主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具备当时女性所应具备的一切良好品质,虽然同

秦王嬴驷自由恋爱并走向婚姻,但婚姻本身是秦楚政治的结果。婚后她事事以秦王为尊,揣度秦王的喜好,想尽办法地讨好秦王,但又不了解秦王心思。半姝被男性建构为贤惠知礼的妻子形象的同时,也被女性建构为身份地位尊贵的夫人形象,从而把自己感情的不如意归咎于其他女性的争夺和破坏。半姝完全丧失了女性意识,不但对封建礼教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毫无觉察,反而维护了男权地位。当半月难产秦王欲拨开众人去看半月时,却被半姝阻拦说女人难产,大阴大秽,不得进入。半姝处处依靠别人,不善于学习,不会审时度势,不懂得对男权社会进行反抗,最终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同半姝的自由恋爱相比,赢夫人和孟嬴的运气则更差。她们虽是一国公主,但都成了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为了与魏国修好,赢夫人被嫁给了自己并不中意的魏王,秦魏开战,她又按秦国要求把魏国所有的作战意图和兵马调动情况传递给秦国,自己却终身背负背叛国君和夫君的罪名。孟嬴作为秦惠文王最疼爱的女儿,被嫁给年近五十且有残疾的燕王,保住了秦国一方的安危,却牺牲了她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可以随意被交换和舍弃,其个人的幸福与否是从

来不被考虑的因素。

半月女性主义式的个性突围实现了对男权制建构的性别秩序的僭越,体现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在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局面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改观,陈旧男权文化仍然是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中的痼疾”^[5]。《半月传》虽然是作为一部古装电视剧出现在荧屏上的,但它也让现实中的当代女性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半月的胜利符合当下人们追求男女平等的诉求,对现代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和女性意识的自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力. 近几年电视剧中女性意识管窥[J]. 中国电视,1999,(11):6.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8.
-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09.
- [4]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5] 刘维春. 从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人物情感谈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3):59-60.

The Breakthrough Femin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omen's Free Choice: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TV drama *The Biography of Mi Yue*

LIU Weichun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tiquettes, women had been some tools which were objectified and enslaved by men. As a woman in the pre-Qin period, Mi Yue defied feudal shackles, bravely pursued freedom of marriage and sexual liberation, broke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and got out of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women. Her three marriages—to Huang Xie, King of Qin and King Yi Qu—challenge the ethical idea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women could only marry once. Her living together with Yi Qu without wedlock and her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oy-boy overthrew the etiquettes of “sexual morals” and “sexual forbidden areas”.

Key words: feminism; Mi Yue; female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赵莉萍)

· 女性文学研究 ·

论性别意识在郑小琼诗歌中的表现

吴 春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 要:诗人郑小琼的性别意识的变迁可从《女工记》《纯种植物》到《玫瑰庄园》中梳理出一定的脉络。诗人从关注个体女工到关注女性群体,从关注女性当下生存状态到探寻女性精神家园,其女性意识在三部作品中的显现完成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郑小琼从粗粝的在场式、实录式的诗歌创作,到寻根式、理性式的咏叹,完成了“根性”追索与女性主义者身份的确认。

关键词:性别意识;女工;女性主义;男权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82-0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在诗歌领域,女诗人们在隐秘的身心经验、性行为欲望和死亡意识三个向度中进行身体叙述,形成了性别意识的艰难蝉蜕和确证,从而建构了“躯体诗学”。

中国诗坛的发展呼唤超越“躯体诗学”,表达更加广阔的领域的作品出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小琼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黑暗气质”粗粝地冲入诗坛。“她用在场的书写,以一个曾经的女工身份见证了这些作品,使它们焕发出了真实而确定的力量。而这些,在别的诗人那里则是不具备的。”^[1]

一、《女工记》:为无名者立传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言:“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2],这个观点今天仍然成立。如果没有《女工记》,对于大部分诗歌读者来说,她

们就只是一群来自异乡、游离于城市边缘的打工族,被本地人称其为“捞妹”。郑小琼用八年的时间,把女工们从群像中一个个抽离出来,还原其生命个体的价值,呈现其在打工过程中所承受的苦难和伤痛。“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3](P267)}

《女工记》以关注民生、弱势群体、女工生存状态为表现主题,集中刻画了底层女工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命运。郑小琼将自己的性别体验,以在场者的身份,将女工们的命运凝结成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强烈冲击性的文字。这部不厚的诗集中,郑小琼“分享了生活的苦,并在这种有疼痛感的书写中,出示了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收稿日期:2018-01-09

基金项目: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羊城青年学人”研究项目“新时期以来广东女作家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取向”(项目编号:16QNXR29)

作者简介:吴春(1980—),女,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商务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对生活本身的体认、辨析、讲述、承担、反抗和悲悯。”^[4]由于“在场”的身份,郑小琼获得了不仅男性,即使城市女性也无法获取的经验,并述之于笔端。在诗集中,女性的性欲、月经、怀孕、生育、堕胎、出轨、出卖肉体、婚姻生活等生活经验,毫不掩饰地展示于纸面。作者并由此去思考女工们在工业生产中的位置,去关注和体察她们作为个体人而非工业生产工具的价值。

她哭泣的肩胛骨在男人们的欲望下
颤抖/幼小而纯洁的身体无法抵挡病毒
的入侵/性病折磨着她明亮的眼神

痒与红肿/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无法
摆脱的暗喻/堕胎手术者冰凉的器具伸
入她温暖的躯体/痛 成为她对现实唯
一的敏感/十八岁 她满身疾病 奄奄
一息

——《杨红》

杨红是这个群体里典型的个案之一。她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暗喻。她在背负着男权文化施加的压迫的同时,还因处在社会的底层而被无情地挤压。强大的男人们在她身上满足欲望,留下的只有性病和堕胎的摧残,她奄奄一息,却无力反抗。郑小琼对此抱着深切的悲悯。

2001年 你已堕了四次胎 腹部
有些疼痛/三次是跟你所谓的男友 另
外一次不知是谁/留下的 那团模糊的
血块从你的身体里/掏出 你像丢掉了
一个负担 你曾目睹/乡间流与刮的计
生运动 它们只是一次很正常的/手
术? 2003年私处的疾病 2004年在湖
南长沙/107国道边某个小饭店向来往
的司机出售/肉体 2005年你想返回正
常的轨道 八年的/风尘生活 你有些
疲惫 也有些厌倦

——《周红》

由于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对生育知识所知甚少,她们来自农村相对保守,对性行为的防护措施相当少,因而更容易怀

孕。她们处理怀孕的方式,就是生下孩子来送人,或是在小黑诊所打胎。这样的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在女工们当中却是稀松平常的。

她们说:“路总会有的”她们/安慰
你 尽管你不耻于她们的职业/但是现
实的危机像腹中的生命/日益长大 你
出厂 住进她们的房子/没有理发工具
的发廊 等候十月分娩/这个孤零零的
小生命最终没有跟随你/他 一个七斤
多重的婴儿换来一万块钱

——《阿艳》

女性主义认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在一个社会里,权力无处不在。“在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私有的领域不是政治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最终与个人有关的。”^[5]不同阶层的女性面临不同的生活境况,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存体验,忽视这种多元性,也是一种男权主义。郑小琼的书写,给了这些被压迫的边际群体发声的机会。她们不仅面临着男权社会的挤压,同时还面临着更加沉重的阶层挤压。她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是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女工们不仅要和男性周旋,还要在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以及同性、不同的阶层中挣扎。虽然今天作为女性的女工们获得了自己选择生活的自由,但她们又在强大生存压力和错误生活观念的挤压下,在命运的拨弄下遭遇新的困惑^[6]。

郑小琼的诗歌揭示着那些浅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于历史阐述之外的女性经验,发露出历史记忆中的空白、边缘和缝隙。郑小琼的诗作将女工还原成一个个生动的个体,回归于历史之中。她用书写抵抗遗忘,用文字铭记苦难,去帮助底层女性打工者发声。郑小琼在再现底层打工真实场景、立足新的时代背景下,将对打工群体承受苦难根源的探讨与反思的写作模式,升华为对工业时代中异化的人与物之关系的批判与重构。

不得不说,郑小琼创作之初的性别路线并不

清晰坚定。谈及创作,她说,“写作最初是想找点事情打发内心的自卑与孤独”^[1]。这种自卑和孤独并非来源于性别,更多来源于社会的阶层。郑小琼似乎天生就具有某些反抗精神,当然,起初,她反抗的是工厂制度、周遭环境、青春与命运。这时候的郑小琼,虽然没有清晰的性别意识和个体意识,但她饱有着反抗的勇气和热情。

郑小琼认为:“写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会更真实,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是不一样的,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在井上想象是不一样的,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1]所以,她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阐释“底层诗歌”真正的内涵。郑小琼以一种“在场”的姿态,深切感受着生活的苦难与不幸,起初这并非有意为之,是一种诗人内在的自觉性。在《女工记》的后记中,郑小琼谈到了创作《田建英》的初衷:“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女工记》,只是觉得她和她家人的命运很悲惨”^[7]。这种在悲悯中激发起来的反抗,让郑小琼不仅去关注女工的生活及命运,并进一步控诉和反抗以父权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机制。面对当下底层生活及其尖锐的苦难与冲突,郑小琼表现出理性、关怀、温暖和节制,她身上有天然的性别立场,这种性别立场使她的写作更为深刻而敏锐,一种对性别关系的复杂认知正在郑小琼的文本中形成。

二、《纯种植物》:从女工到思想者

《纯种植物》出版于2011年,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郑小琼刻意地扭转了创作风格,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写作从“女工场景”置换到广大的“时代场景”。郑小琼本人多次表态,“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在《女工记》里她已经清晰表达过她对脸谱化的拒绝。因而之后,她努力摆脱着“打工诗人”的标签。此时,郑小琼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拓展,词语的自觉变得更加成熟和清晰。同时,她站在女性的角度,从关注打工群体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公共领域。

在《纯种植物》中,郑小琼努力向知识分子靠

拢,着意表达对公共性事件的思考,诗作中的用词和立意也积极地拥抱宏大历史叙述。以知识分子身份去描写着“历史”“国家”“思想”“人民”“悲剧”一系列抽象概念,从青春感伤的抒情风格向着理智沉思的哲理风格转变。对于这一转变,评论家们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类是给予首肯,认为她“显示了初步的成熟,成功地、令人喜悦地延续了她写作的身份,完成了从单一到复合身份、从在场的劳动者主题到人文性思想主题的转变,这是劳动者的胜利,也是诗人的胜利”^[3](P354)]。也有评论家认为:“她过于直露的对历史、革命、真理、信仰、人民这些抽象概念的思考和观点表达,她知识分子的批判激情与道义立场,无形中压过了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关注,让诗歌近乎成了表达观念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诗歌的艺术之美。”谢有顺曾言,真正的写作,永远是个别的,无法归类的。郑小琼积极对历史、真相、国家进行思考,将女性放置在历史大背景中去审视,也仍然关切着女性的命运和痛苦。

肺中呼吸出轻微的疾病/她的血液
里藏着恶与恨/啊 青砖灰瓦般的命/
饱尝人间幻觉的疼痛

雪埋没你的一生/三尺寒冷伤透
心/受够了人间的游戏/幻想做春风样
的人

——《雪》

石头以不妥协的方式还原/女性的
尊严 身体里的月食遮蔽着脆弱 愤
怒似泉水般/清澈与薄弱 身体里的野
性/像星辰将黑暗灼伤 她的影子/藏
着瓦砾于废墟 从泥泞中/抠出黎明 无
法缺席的生活/在宴会上她反思自己

——《女性》

诗中谈及女性尊严、悲痛、痛楚,虽然指向模糊,但却是在更大的场域中去思考着女性的命运。与1990年代诗人相比,郑小琼写作的张力恰恰体现于此,她用悲悯的态度,描写女工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深刻地记录这一被遮蔽的群体的历

史面貌。除此之外,郑小琼的哲思还投射于公共领域,对于文化、历史、政治、女性生存空间等公领域进行审视和剖析。如在描写知识分子时,这样写道:

白鹅样的信仰洄渡中国式的湖泊/
细长的脖子犹如知识分子的双膝/不断
朝着权力弯曲 再弯曲/沿着去长安的
路上不断地叩首/瘦毛驴驮着无骨的八
股文远行/信仰金色的蹒跚于水间

它划过/令人沮丧的河流 被静夜
与画布/收养 我脑子仿佛有一只白
鹅/在解冻的春水浮游 白色羽毛/成
为不可思议的象征 它看上去/更像一个
隐士 无声地漫谈着/悲伤的语言穿
过浑浊的河流/缄默的波纹由远方漂至
更远

——《鹅》

诗歌从水面上的白鹅,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信仰,展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三种生存状态:朝权力弯曲,向信仰叩首,抑或当名隐士,以此批判讽喻、针砭时弊。这种思考在当下女诗人当中是不多见的。可见,郑小琼除了进行底层经验的叙述外,同时也对公共领域以及知识分子的当下和命运进行思考。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过多地运用大词和宏大叙述,一些诗歌的表现力和冲击力并不是太过清晰和强烈,甚至伤害了诗歌的表达质感。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抹杀郑小琼在诗歌领域的探索和进步。随着“写作域”的扩大、写作对象的延伸,以及写作风格向精敏细腻的不断转变,郑小琼确立了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同时也彰显了她作为独立的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三、《玫瑰庄园》:寻找女性归属与失落的庄园

布罗茨基曾说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1990年代,女性诗人放弃激烈的两性对抗后,在回忆中寻找自我,成为许多女性诗歌中经常触及的素材。她们或是通过回忆、或是通过梦境寻找自我,并以此揭示隐秘的个人经验。郑小

琼在多年之后,也将笔触伸向了这个领域。《玫瑰庄园》是带有很强的“根性”追寻的作品,她通过80首诗去尝试寻找自我身份,寻找精神家园。与此同时,郑小琼的女性意识也越发显现,除了一如既往地坚持关照现实意义和生命意识之外,其女性意识也逐渐觉醒,女性的立场更加坚定。她把女性放置于时代之中,关注女性生存命运的现实和历史。她在文中多次提到“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这样的词语。这本诗集用五位老祖母为主线,用一座古宅院去见证一个家族乃至中国历史的兴衰演变。如在《饿》中,她关注在饥荒年代中的女性命运:偷粮食的妇人避难他乡;对溺杀女婴的恶行进行批判;祖母们在玫瑰园的暗处悲鸣。

野狗啃死人,逝去的大祖母深埋地
中/火把点亮新坟,驱逐恶狗跑出亡人/
偷粮妇人避难他乡,传闻乐山大佛不忍
看/人间惨景,曾闭上眼睛,嘉陵江水

——《饿》

在《女婴》中,郑小琼展现出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女婴悲惨的命运。她们的生命如草菅般被肆意无情地剥夺,而恶行多年来被遮蔽于男权文化下,女性无力反驳,形成其不可磨灭的性别痛。

被水呛住的嘴,渐渐无力的身体像
白菜/漂浮上来,多年后,我背脊一阵清
凉/我感受她渐凉的身体与心灵,无力的
性别/种下荒凉,年幼的生命被暴力与无
知扼杀/我想象她被溺毙的过程,使她丧
命的漏见/在庄园里,挂在树枝上的女
婴,抛弃墙边的/女婴,窒息的女婴,勒死
的女婴,冻坏的女婴/溺毙的表妹收藏我
对性别的记忆与疼痛

——《女婴》

在《消失》中她作了一次历史意境中的旅行,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根性”追索,一次自我身份的确认,包括“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之间的演变和坚持:

啊 我将返回我的命运,在祖居的
庄园间/我用诗句来道别情人,用祖母
的小圆镜/收藏亲人的灵魂,秋风送来
诗句旧日的韵味/我低头,那口瘦小的
井沿,哪里有小时的亲人

——《消失》

女性的命运被裹挟在历史的浪潮中,沉沉浮浮。在中国历史的每个节点,女性成了承载记忆和痛苦的载体。宅子里的女性,她们或是心灵手巧的祖母,或是逃避饥荒的饿妇人,或是溺毙的女婴,每一个女性的命运,都是历史命运的缩影。至此,郑小琼的性别意识和女性立场变得清晰可辨,矛头直指封建的男权文化,自觉地为女性卑微的性别身份进行反抗和言说。在父权文化主宰的男性文化价值观下,女性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语焉不详,充满中断、阻隔、反复的断简残篇,它如无根浮萍,随处飘荡。如果说在《女工记》中,郑小琼是用笔墨为无名者立传,书写她们的艰辛和磨难,为她们发声和抗议的话。那么经过了多年的沉淀和思考,郑小琼开始去思考,这些外来务工的女性,她们命运的根源何在?《女工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描画出一个个

清晰的面孔,而在这些面孔的背后,她们都有着共同的困境,那便是精神世界的迷失。在广东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区域,不仅是外乡人,就连本土的居民也无暇关照灵魂。郑小琼是寄希望于在这个记忆深处的玫瑰庄园中,去寻找答案,去寻找灵魂和精神的“根”。

参考文献:

- [1] 张清华. 语词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纯种植物》[A]. 郑小琼. 纯种植物[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2.
- [2]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妇女与小说[M]. 瞿世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0.
- [3] 郑小琼. 女工记[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 [4] 谢有顺. 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J]. 南方文坛·批评论坛,2007,(4):25-28.
- [5] 何念. 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42.
- [6] 俞春玲. 迟滞与觉醒——论当代女工形象的性别书写[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2):65-68.
- [7] 舒晋瑜. 郑小琼:我更愿意成为我自己[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a57d30010-2vu46.html,2015-09-29.

On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Zheng Xiaoqiong's Poetry

WU Chun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Zheng Xiaoqiong's change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can be summarized from *The Female Workers*, *The Pure Plants* and *The Rose Manor*. From focusing on individual female workers to focusing on female groups, the poet focus on women's living status and explores their spiritual home.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three works emerges from unconscious to conscious. From the rough presence and imitating poetry creation, to the root-seeking and rational singing, the poet has completed her "root" pursui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her feminist identity.

Key words: gender consciousness; women workers; feminism; male-dominated culture

(责任编辑 赵莉萍)

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发展路径探析

王 琴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 要:大学生领导力培养是素质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对于推动女大学生成为未来的女性领袖和女性精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领导力教育是高等教育女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女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分析女性领导力教育的内涵、发展和现实意义,为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发展路径提出建议: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要重视性别意识的培养,加强普及性和针对性,要重视校内外的实践,加强女大学生的职业规划。领导力教育是未来女性领导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储备,要有鲜明的前瞻性,着眼于未来,挖掘女大学生的领导力发展潜质。要重点培育女大学生的领导意识和领导思维,增强其自信心,为她们在未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打下基础。

关键词: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女性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87-05

高等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构筑了我们时代的人才结构,引领了时代的前进方向。时代的飞速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要求,快速变化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使得未来人才培养不断面临挑战。大学则承担着为社会培养未来领袖的重要使命,承担着开发和储备领导人才资源的前瞻性任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不同社会领域的变革都对大学生的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适应这些社会变革,甚至引领这些社会变革,迫切需要提升大学生的领导力。

从性别视角看,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和男性都应该享有公平均衡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大学要针对不同性别的人群,实施具有针对性、个性化

的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多年发展,高校中的女学生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女学生已经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了半壁江山。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的比例为52.1%,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51.6%和36%^[1]。女学生数量的增长,女性人才的涌现,对高等教育女性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女大学生需要提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针对她们进行的领导力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推进青年女性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一、女性领导力教育的内涵与发展

女性领导力是指女性领导者率领并引导团队在组织中发挥潜能,做出成就并实现组织目标的能

收稿日期:2018-01-16

项目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媒体融合时代菁英女性培养与领导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5JZDW002)

作者简介:王琴(1976—),女,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性别与传播、女性领导力研究。

力^[2]。女性领导力包括形成组织远景的能力,定义宗旨的能力,制定战略和目标的能力,建立组织文化的能力,建立制度和系统的能力等^[3]。

领导力是可以培育的。通过专门的领导力教育,可以使学生潜在的领导特质发展成为现实的领导能力。领导力的培育主要包括3种不同的教育模式,领导力培训(leadership training)、领导力教育(leadership education)、领导力开发(leadership development),这3种通常被称为TED模式^[4]。这些模式是服务于不同人群和不同需求的领导力培育。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系统的领导能力培养,包括那些广泛适用的领导力理论、领导力方法和领导力模式的教育^[5]。

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就是对女大学生开展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素质教育,以提升女大学生的领导意识,激发学生的领导潜能。这一教育包含了与领导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形成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大局观的领导思维。女大学生作为占据一半高校学生数量的人群,她们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女大学生的领导力培养要针对女性的性别气质特点和社会文化现实,涵养女大学生的个人领导能力。女性领导力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女性的领导意识和领导素质,强调女性有能力打破传统男权为主体的权力关系,形成独特领导力,提升青年女大学生的性别自信。

美国是较早开展女性领导力教育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女子学院开始重视女性领导力教育。1978年,威尔斯学院(Wells College)发起成立了公共领导力教育网PLEN,共同拓展女性领导力教育。该项目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女性领导力培育项目,旨在从大学校园的领导力教育出发,为女性在公共领域担任领导角色做准备^①。到目前,公共领导力教育网有18个成员高校,开展了多种类型的女性领导力培育活动。另外,美国一些高校还有专门的女性领导力研究机构,如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奥尔布莱特研究所,巴纳德女子学院的雅典娜女性领导中心等。

中国的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起步较晚,2005年

之后才开始出现关于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学术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开始发展女性领导力教育,如中华女子学院从2013年开始,每年举行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训班;浙江大学从2014年开始举行女大学生领导力提升培训班,目前已经办了7期;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在多年举办“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的基础上,成立了现代女性领导力研究院,致力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和培养。这些研究和实践成为中国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重要基础。

二、女性领导力教育的现实意义

女大学生领导能力培养不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青年女性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对于推动女大学生成为未来的女性领袖和女性精英,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升女大学生领导力对提高全社会女性人才素质及整体国民素质的贡献不容小觑,甚至影响着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

(一)领导力教育是高等教育女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领袖的重要责任,这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识。1936年,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在新生入学典礼上指出,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要求学生“学成以后将来能为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6]

领导人才是稀缺的人力资源,领导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持续的规划和前瞻性的设计。大学是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基地,需要为社会培养具有高素质的青年人才。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就是对未来领导人才的培养和资源开发,这是青年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

女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女性精英人才。在当前社会中,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日益增多。女性人才的大量涌现,使得女性教育和培养也日趋专门化和精细化。高等教育中的女大学生培养,不仅要

让她们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更要提升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女性的能力和自信,激发女性的成才意识和创新意识,将她们培养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领导人才。激励女性自我认同是发展女性领导力的前提,即激励其认同女性特质,并认同自己作为女性可以胜任领导角色和任务^[7]。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女性领导人才的培养要从青年抓起,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纳入领导力培养的内容,从国家人才建设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大学的领导力教育。

(二)领导力教育是女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现实需求

在高校开展大学生领导力教育,不仅是国家倡导的素质教育的内容,同时也符合大学生自身发展要求。无论是否担任领导岗位,领导力都是个人综合素养的重要部分。从女大学生个体发展来看,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大学生不断提升个人素养和能力,适应环境需求,应对社会挑战。女大学生普遍关注个人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领导力培育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的个体发展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女大学生只有不断提升综合素养,锤炼领导能力,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实现自我价值,引领时代发展。

领导力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还能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并突破个人发展的小视野,超越个人的局限,以团队意识和领导能力带领周围人实现创新性发展。实践表明,接受过领导力教育的学生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沟通能力突出,创新意识明显。这样的学生无疑会在职业发展中具有更好的竞争力。

三、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重点发展路径

领导力教育需要系统开展领导力的基础课程和实践教育。针对女大学生领导力的培育要切合女性领导力的发展特点。女性领导力教育首先要有性别视角,同时也要加强学生领导知识和领导技能的积累,培养其领导意识和领导思维。

女性领导力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有领导力的女性精英人才。一般而言,领导力包含了“道、学、技”三层次结构,这和大学生的人才素质目标中的社会责任、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三维结构相一致。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维度,即价值观维度、知识维度和行为维度^[8]。从这些维度出发,女性领导力教育的内容包括性别意识教育、管理能力教育、国际化教育,创新思维、领导艺术、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培养等内容,是一种领导素质和领导意识的综合提升。

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机制等各方面加以完善,协同推进。领导力教育不是靠几门课或者几项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这种领导力教育应贯穿于整个教学和教育活动中。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途径主要包括课程学习、校内外实践活动和专门的领导力培育项目等途径。

(一)女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要重视性别意识教育

性别意识教育在中国高校还没有完全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教育,对于女大学生性别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大学生性别意识的重要时期。缺乏性别意识的女大学生在面对生活中的性别偏见,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发展中的性别障碍等人生发展问题的时候,容易缺乏判断能力,失去明确立场,产生自卑情绪。

性别意识教育应注重消除男女两性成长中的文化障碍,促进两性平等发展,使人正视性别差异,克服性别偏见和束缚,充分发展个人潜能,培育完整人格。性别意识教育,有利于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消除性别认知中的误区和盲点,增强性别敏感,树立独立、理性的性别价值观念。这种教育有助于引导女大学生把握自我角色,肯定自我能力,实现自我价值,有效提升自身的领导力。

高校普及性别意识教育,有利于形成多元和包容的文化氛围,创造性别平等的校园文化。同时,可以为高等教育中女性领导力的提升和女性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环境,有力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

(二)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育要加强普及性和针对性

领导力培育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组织结构的日趋成熟,对各种女性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女大学生作为优秀的青年人才,应该具备基本的领导力素养和领导意识,以便在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应对社会组织中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要求。女性领导力应该是女大学生基本素质的一部分,是女大学生提升个人能力、开拓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女性领导力教育不仅仅是针对女学生干部,而应该覆盖绝大多数的普通女大学生。在多元变化的社会中,我们不仅需要少数的精英领袖,还需要更多具有领导力的公民和个体。社会需要更多的女性人才贡献自己的价值,发挥能动作用,产生积极影响。针对当下社会对女性人才的需求,领导力教育要提升大学生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

另外,领导力的通识教育要和精英教育相结合。遴选那些有良好领导能力和领导潜质的女大学生进行针对性教育,重点培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职业发展兴趣,有目的地加以引导,提供机会,创造条件,积极培育女性青年领袖,为国家和社会打造一批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人才。

(三)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育要重视校内外实践

领导力发展需要在实践锻炼中提升经验值。大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实践活动是提升领导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实践的锻炼能够培养女大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去积极掌控自己的生活和作品,有利于女大学生在组织活动、人际沟通、资源利用等各方面积累经验、承担责任。

社团组织是高校领导力培养的重要实验场。高校有各种丰富多样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是学生基于自愿原则组织的学生团体。社团一般有固定的成员、固定的活动内容,社团成员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结合成团体。对于很多学生而言,社团活动能够积累活动组织的经验,并形成一定的领导经验和经历。高校要积极鼓励成立一些与女性相关的

社团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社团,通过专门的社团组织推进女大学生对于女性发展的关注。各种社团活动能够让女大学生有机会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了解社会现实,开拓宏观视野,有效锻炼和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

同时,高校要鼓励女大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特长参加校外的社会实践,主动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实践自己的领导技能。目前,很多高校的高年级学生都要到各类企事业单位参与实习工作,将专业知识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工作的磨砺中快速成长,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很多女大学生在工作实习中展现了突出的个人才能,得到了实习单位的认可,这为女大学生进一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渠道。

(四)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育要加强女性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对于女大学生领导力培养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女性职业生涯发展既与其自身的能力兴趣有关,也与外在的社会组织环境有密切联系,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女性承担生育责任的特殊社会要求。女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需要其对自身兴趣、特长、能力、资源进行清楚的评估,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生涯路线。她们要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环境有清醒的认知,了解社会文化中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克服性别角色冲突,平衡家庭和事业发展。

一方面,女大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谋划,认真准备,尽早确定自己职业发展的目标,作为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女大学生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如“生育困境”影响了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玻璃天花板”阻挡女性的职业上升空间。正确认识这些矛盾,并在职业规划中尽可能地做好应对的准备,有助于女大学生更好地实现职业发展,发挥女性的自我潜能和资源,以性别平等的意识,独立自主的姿态,充分肯定自我价值,积极为社会作贡献。高校要帮助女大学生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将女性领导力培养与女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和

职业发展有效结合起来,确保女性领导力培育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和目标性。

女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是对未来女性领导人才资源的开发,要有鲜明的前瞻性,着眼于未来,挖掘女大学生的领导力发展潜质。领导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一些领导人才需要经过充分发掘才能够逐渐成长。高等教育领域女性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断进行人才挖掘的过程。学校要重视女大学生的个人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培养,激发女大学生的成才意识和创新意识,培育女大学生的领导意识和领导思维,增强女大学生的自信心和个人认同,为她们在未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打下基础。

注释:

- ① PLEN(The Public Leadership Education Network)是威尔斯学院院长弗朗西丝(Frances Tarpon)在1978年发起成立的。目前PLEN有16个正式成员高校,2个协作成员高校。见History of PLEN, <http://plen.org/about-us/history/>。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12.
- [2] 杜芳琴. 女性主义领导力:中国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7, (1): 27-34.
- [3] 陈方. 也谈女性领导能力建设[N]. 中国妇女报, 2005-04-06.
- [4] Dennis Roberts Ph. D , Craig Ullom, Ed. D. *Student Leadership Program Model*[J]. *Naspa Journal*, 1989, 27(1): 67-74.
- [5] 崔文霞. 中美大学生领导力培养比较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13-14.
- [6] 杨卫. 竺可桢教育思想烛照一流大学建设[EB/OL].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235575.html>, 2010-03-26.
- [7] 张珊明, 唐立英, 李 婷. 社会认知视角下女性领导力发展困境研究综述[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7, (4): 29-33.
- [8] 奚洁人. 中国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战略思考[J]. 当代青年研究, 2012, (5): 23-28.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WANG Q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quality education. 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has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m to future female leaders and female elite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female leadership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gender awareness,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ertinence, pay attention to practice inside and outside campus, and strengthen the career planning. Leadership education will provide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female talents. We must have a future prospect, focus on the future, and tap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leadership awareness and leadership thinking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enhancing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make them good lead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women's leadership

(责任编辑 王 灵)

· 女性教育研究 ·

性别敏感：新时期高校德育体系的新要求

张小宝^{1,2}, 闫玉¹

(1.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32; 2.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以人为本”是新时期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存在着性别差异,他们面临的诸多性别困惑影响其健康成长。因此,性别敏感是当前我国以人为本德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应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德育全过程,将性别敏感作为新时期高校德育体系的新理念。这将有助于解决大学生成长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困惑,更好地实现高校德育的育人功能,从而回应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本主义价值诉求。新时期高校应将性别敏感的教育理念融入德育实践中,从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载体等层面探索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

关键词:性别敏感;高校德育体系;新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8)02-0092-05

新时期,我国政府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大学生德育工作,在高校德育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是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必然趋势。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德育逐渐由抽象的宏观视角转向具体的微观视角,因此,德育的教育主体也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到“具体个人”的转换^[1]。性别是“具体个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教育对象的基本属性。大学阶段是性别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性别角色选择和准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面临诸多性别困惑,当代高校德育需要重审其中的性别因素。然而,我国德育传统几乎是性别无涉的,普遍将人看作宏观的、整体的,尚缺乏对微观层面个体的人的性别关怀。因此,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是新时期“以人为本”德

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旨在以性别敏感教育理念探索性别敏感高校德育体系的建构。

一、何谓性别敏感教育

(一)性别敏感教育的提出

“性别敏感”(gender sensitivity)基于对性别差异的敏锐洞察力,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第二次浪潮从强调“性别平等”转向对“性别差异”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两性不同的性别行为模式并非主要由生理层面的性别差异决定,而是由社会历史文化后天塑造的社会层面的性别差异决定的。既然两性之间性别差异的根源主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对于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期待和刻板印象就可以通过教育来解构。此后,欧美各国

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大学生完整人格教育内容的性别向度研究”(项目编号:GH16454);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高校德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ZD14096)

作者简介:张小宝(1983—),女,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性别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性别教育、中共党史与妇女研究;闫玉(1968—),女,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性别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性别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开始关注教育中的社会性别差异,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教育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问题。美国当代女性主义教育哲学家简·罗兰·马丁开始反思西方教育中存在着的柏拉图的“性别中立教育”和卢梭的“性别化教育”两种教育传统,马丁认为这两种教育都不可取,前者采取“性别无涉”或“性别中立”的立场,旨在按照同一种模式培养不同性别的人;后者倡导为两性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旨在将男女两性培养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两种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不完整的人”,马丁认为教育应该看见两性的性别差异,同时又要避免陷入生理性别决定论,基于此,马丁提出“性别敏感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性别敏感教育意味着,在教育活动中,要敏于关注性别的自然差异以及社会意义,把握既定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根源和后果,并采取在性别上更具包容性的措施,从而实现性别的公正”^[2]。我国学者周小李将“性别敏感教育”主张概括为以下几点^[3]:第一,重视差异而不囿于差异。即对性别差异予以动态、灵活及适度的把握,既不夸大性别差异,也不对其进行刻板化理解。第二,赋予女性发声的权力。即通过在课程和教材中纳入性别因素,在知识的建构中融入女性经验,打破学科领域的性别隔离,创设性别友好的教学环境等,以此打破女性在教育中的沉默。第三,采取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由于两性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因此,教育应以性别混合教育为主,以单一性别教育为辅。同时,教育者应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化差距,并采取积极的办法,避免其导致对某一性别的发展不利,此外,也要引导这些性别化的能力、品质、经验向相互融合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第四,引导男女两性成长为“完整的人”。性别敏感教育旨在赋予男女社会性别同等的价值判断,并在两种社会性别之间建构一种宽阔友善的、性别等级消失的空间,培养学生吸纳异性的价值而超越传统的陈规陋习,引导学生成长为兼具男女两性优秀品质与内涵的“完整的人”。

(二)性别敏感德育的意涵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同样存在“性别化的教育”与“性别中立的教育”两种传统。随着’95世

妇会对“社会性别”的引入,教育领域开始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反思我国的教育传统。特别是“以人为本”德育理念的提出,使中国高校的德育目标逐渐转向培养完整人格及全面发展的人,让受教育者成长为“完整的人”。所谓具体的“完整的人”是指“有生命的有特色的完整的个人,是正在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人的生命个体”^[4]。树立性别敏感的德育理念正契合培养“完整的人”的教育目标。将性别敏感有机地融入德育中,发现德育中的性别盲点,突破德育全过程的性别盲视,通过德育各个环节的教育促使受教育者社会性别意识的生成,采取灵活多样的适性的教育模式,满足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多样化需求,以激发其潜在能力优势,从而培养完整人格、全面发展的人。可见,性别敏感德育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而传统德育侧重强调社会需要、工具价值,忽略了人是个性化的存在这一现实,而性别敏感德育重视德育中的性别差异,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走出工具理性的思维局限,从“理想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性别敏感德育是德育人本范式下的重要内涵,是对传统德育的超越。

二、性别敏感何以成为新时期高校德育的新要求

(一)大学生成长的现实需求

“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教育就是要把大学生作为德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其看作是具有独立思想意识的主体。在德育过程中,一方面要关注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规律、成就动机、自主意识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要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性别困惑。对大学生性别意识的塑造,影响着他们未来的性别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一时期他们面临着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性别困惑,但又缺乏科学的社会性别知识,缺乏从性别视角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将导致他们很难了解性别制度对个体成长的结构性的影响,从而作出问题的个体化归因,容易造成行为懈怠,不利于身心发展。此外,研究发现,传统性别观念及规范严重束缚大学生的发展,使大学生存在性别角色的两难困境,从

而影响学生在就业领域的选择,学科、专业方面的性别隔离成为两性平等参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影响两性的自由全面发展^[5]。以上问题需要德育给予适性教育,但国内高校德育还受限于原有框架,没有与时俱进纳入社会性别的相关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适应当代大学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因此,我国德育过程中应秉持性别敏感,使德育趋于科学化、人性化,这样才有助于高校德育实现其育人目标,才能满足大学生成长的现实需求。

(二)在高校德育场域实践性别主流化的需要

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是世界性的议题,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提出《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建议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主要策略,强调性别观点应融入所有主流政策的决策过程。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我国政府目前已颁布3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其中《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规定:在教育理念层面,要确保“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面,要“充分体现社会性别理念,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在师资方面,要“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6]。可见,中国高度关注教育领域的性别主流化,教育领域已成为实践性别主流化的重要场所。高校应将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高校德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在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性别敏感,在教育方法中体现社会性别理念,培养具有性别意识的教育队伍,从而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以实现高校德育领域的性别主流化。

三、如何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

(一)以性别敏感理念完善高校德育目标

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目标是培养受教育者成长为完整人格的人。传统德育将其功能过多地定位于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强调德育目标的统一性,用一元标准来培养受教育者,而忽略了人的个体价值,忽视了受教育者的性别差异及由

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没有体现对受教育者个体性别因素的关注,这就需以性别敏感的理念完善高校德育目标。

性别人格是完整人格的重要内涵,完整人格教育需要重视学生性别人格的形成。传统的性别观念在男女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性别沟壑:(勇敢、刚强、独立的)男性气质或(细心、温柔、顺从的)女性气质,属“公”(社会领域)或属“私”(家庭领域)的活动领域等。这样的性别类型化不利于学生形成完整人格,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完整的人要跳脱“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是生活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完整生活实践中的人,是兼具两性性别气质特征和角色责任、整合两性优秀人格于一身的超越传统性别分类的人。因此,性别敏感的德育目标应该打破性别角色的模式化,将大学生从传统的性别陈规中解放出来,在尊重其原有人格优势的基础上激发他们潜在的异性人格优势,使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形成集两性人格优势于一体的“双性化人格”。性别敏感的德育能更好地关注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及其个性需求,建立起在尊重生理性别基础上的不受性别限制的个人发展观念。据此进一步完善德育目标体系,使其从片面强调一元性向多样性转换,增加性别人格选择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以符合学生人格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以性别平等的内涵创新高校德育内容

长期以来,德育内容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重点突出政治教育的内容,忽视了受教育者作为个体的人的现实需要,从而导致德育的“解题低效”。性别敏感的德育内容应从“人”及“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清理传统德育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的内容,这就需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德育内容,以性别平等理念创新德育内容。

高校德育的内容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婚恋观、法制观等。传统的德育内容是去性别化的,建构性别敏感的德育内容应对现有德育内容进行性别视角的拓展,秉持性别平等理念创新德育的内容。在三观教育方面,帮助学生了解性别陈规对自身发展的束缚,帮助大学生

摆脱三观方面的性别偏颇,引导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道德观教育方面,帮助学生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性别规范,启发学生用现代性别意识思考两性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破除“男强女弱”“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性别观念,走出传统道德文化的束缚,实现两性自由和谐发展;在婚姻观教育方面,针对大学生婚恋观的现实状况和特点,引导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跳出婚姻的框框,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具体分析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两性角色模式对两性发展的限制,倡导建立两性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新型婚姻关系;在法制观教育方面,将男女平等纳入法制观的教育,让学生了解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体现的是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会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行法律体系和社会上存在的法律问题,培养学生敢于追求机会与权利的性别平等,提升其维护自我权利的意识。

(三)以女性主义教学法丰富高校德育方法

传统高校德育方法将德育视为向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过程,强调教育者的传授和受教育者的接受和服从,这种方法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主观能动性,与新时期高校德育实际相脱离,不利于调动大学生接受德育的积极性。因此,应以性别视角审视整个德育过程,借鉴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多元化,建立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及尊重个体体验的德育课堂环境。

女性主义教学法中有代表性的是差异教学法、批评与思考教学法、情境与体验教学法及故事与对话教学法^[7]。首先,在德育课中借鉴差异教学法,肯定学生的多元性,针对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习特点、课堂反应、互动方式展开教学。根据男女学生不同的能力与需要,采纳灵活的教育组织形式,以激发学生的潜力,引导学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次,借鉴批评与思考教学法。教学应对传统知识持有反思并提出质疑,教师应把学生看成是具有不同认识方式的认识者,帮助学生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突破传

统分析问题的二分法,从而形成以多元的视角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再次,借鉴情境与体验教学法。在德育中注重具体教学情境的营造,重视受教育者的经验和感受,让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经验成为建构课堂知识的关键,使得受教育者通过平等分享和交流,实现个体化和个性化知识或经验的生成。最后,借鉴故事与对话教学法。德育过程中可以通过故事来阐释德育的主题或内容,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故事的讲述启发学生悟出其中的道理,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从而提高德育的效果。

(四)以性别融入的方式优化高校德育载体

高校德育载体一般包括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就要将性别敏感理念融入高校德育载体中,从而实现高校德育载体建设的以人为本。

首先,在德育课中融入性别议题。德育课是传递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学生从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习得性别意识与价值观。因此,需要在德育课中融入性别议题。譬如,当前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全球应对性别不平等的重要策略,为响应这一策略,我国政府在'95世妇会上宣布“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背离这一国际大背景。因此,德育课程中向大学生介绍社会性别主流化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相关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德育课程的性别敏感度。其次,增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性别敏感。校园文化以其独有的潜在力量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举办与性别有关的展览、讲座来宣传两性平等理念,以提升学生的性别敏感度。再次,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中。从社会性别视角帮助学生分析其心理困扰产生的社会原因,让学生意识到自身心理困惑的根源可能是受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引导学生科学评价自我,积极悦纳自我,冲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最后,在就业指导中为学生提供性别关怀的德育。加强对就业指导者的性别意识培训,针对就业中的性别

现象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服务。对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性别困惑进行适当引导,消除大学生中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陈旧性别观念,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四、结论

本文认为,性别敏感德育是当前我国以人为本德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有助于解决大学生成长中的实际问题及普遍存在的性别困惑;有助于实现高校德育的育人功能,促进两性全面发展;有助于转变德育教育理念、应对德育在现实中的“解题低效”,从而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这符合我国德育的基本规律,回应了当代高等教育和德育的人本主义价值诉求,更是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际趋势在高校德育领域的推广。因此,应在德育实践中探索,将性别敏感的教育理念融入其中,以性别敏感理念完善高校德育目标,以性别平等的内涵创新高校德育内容,以女性主义教学法丰富高校德育方法,以性别融入的方式优化高校德育载体,

从这4个方面初步探索建构性别敏感的高校德育体系。

参考文献:

- [1] 叶澜.教育创新呼唤“具体个人”意识[J].素质教育大参考,2003,(4):6.
- [2] 丁学玲.走向性别敏感教育——简·罗兰·马丁的教育哲学思想述评[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29.
- [3] 周小李.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教育传统及其超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73-178.
- [4] 陈秉公.“人格结构与选择”图型理论及其价值[J].理论探讨,2011,(5):40-46.
- [5] 闫玉.高职院校学生性别意识现状调查及性别教育措施[J].职业技术教育,2011,(29):84-88.
- [6] 宋秀岩.《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7-10.
- [7] 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0.

Gender Sensitivity: New Requir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ZHANG Xiaobao^{1,2}, YAN Yu¹

(1.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2.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Human orientated” is the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of education in new era.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growth so that they face much confusion, which influences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gender sensitivity is due content in Chinese human orientated moral education at pres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survey the whol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from social gender perspective and make gender sensitivity the new idea in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new era. This contributes to solving the universal gender perplex du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growth and better realizing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humanism value appeal in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education of gender sensitivity into the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n construct gender sensitivity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levels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 education content, education method and education carrier.

Key words: gender sensitivity; mor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requirement

(责任编辑 王 灵)